

追忆与思考

江华回忆录

追忆与思考

作

目 录

前 言

童年时代

家乡（1） 童年（5） 启蒙（7）

走上革命道路

考入第三师范（12） 湘南革命摇篮（16） 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7） 驱逐反动校长（20） 游斗军阀爪牙（21） 参加北伐宣传活动（22） 职业革命者生涯的开始（24）

大革命失败

白色恐怖笼罩衡阳（26） 两进长沙（30） 在安源（34）

上下井冈山

九陇山区打游击（42） 宁冈分田（47） 一天疾越两省三县城（50） 住进红光医院（53） 柏露会议前后（55） 大余城失败（58）

转战赣南闽西

圳下遭敌袭击（62） 激战大柏地（65） 东固会师（68） 挺进闽西（71） 红四、五军会师（75） 袁文才、王佐被错杀（77） 赣南分兵游击（80） 三下龙岩城（83）

关于红军建设的一场争论

在胡雷开始了争论（86） 争论的主要问题（90）

到闽西特委（94）

离开红四军

留在福建省委（98） 去上海学习（100）

赣水苍茫闽山碧

重返红军（101） 两打长沙（103） 富田事变（108）
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111）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118） 攻打赣州和第四次反“围剿”（121） 福建事变
（126）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31）

漫漫长征路

别了，中央苏区（138） 重新工作（139） 毛主席用
兵真如神（142） 万水千山只等闲（144）

战斗在陕甘边区

关中游击（149） 统一战线的新局面（151） 打土围
子（154）

“七·七事变”前后

接收延安（156） 在“抗大”（160） 学哲学终身受益
（164） 洛川会议（166） 红军改编（169） 挺进敌后
（173）

山东敌后抗战

组建山东纵队（177） 转战苏皖边区（183） 鲁村自
卫战（188） 粉碎日寇“扫荡”（191） 四年的回顾（197）

入中央党校

毛主席教我察言观色（203） 学习《两条路线》（205）

创建辽东根据地

挺进东北（210） 接收伪满政权（214） 反奸清算
（218） 深入农村（223） 坚持辽东（227） 放手土地
改革（231） 迎接全东北的解放（236）

童年时代

家乡

公元1907年8月1日，我出生于湖南省江华县大石桥乡鹤鹄塘村的一个瑶族农民家庭。我的乳名叫香麟，读书时的学名虞上聪。相传我家祖上是广西钟山县大虞村人，在元朝大德年间，随着民族迁徙来到湖南江华县，至今已有500多年了。

江华县地处湘粤桂三省交界处，南通北粤，北接湘衡，是古代楚地咽喉，有悠久的建县历史。早在西汉年间，这里就设置了冯乘县，唐高祖武德四年，以冯乘置贺州，又析贺州之半置江华。江华之名即由此开始，至今已1300余年。江华县是湖南省瑶族聚居的地区，按照瑶族人民的愿望，于1955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建立江华瑶族自治县。

县境内山多林密，层峦叠嶂，萌渚岭蜿蜒于西南，九嶷山横贯于东北，人们常把坐落在江华境内的这两座大山的支脉统称为瑶山。萌渚岭山脉的勾挂岭把全县分为岭东和岭西两个地区，岭东是大山区，岭西是丘陵地带。江华多水，溪流密布全县，有大大小小千多条，源小溪短，冯水和沱水是两条主要河流。冯水又名东河，东西流向，水量相当充沛，

常年通航。沱水又名西河，南北流向，水浅滩多，不通航运，但它灌溉着沿岸十数万亩良田。许多河溪穿流山谷，落差大，大部分可以开发建设小水电站，而且有丰富的水产资源，还出产极为珍贵的娃娃鱼。这种鱼有四肢，体无鳞，生活在水流较急、水质清凉、石岩缝多的溪流中，为国家保护的稀有动物。

这里气候温和，雨水丰沛，土地肥沃，自然资源丰富，尤以森林资源为最。山上林木繁茂，修竹遍野，素有“绿色宝库”、“杉木之乡”之称。乔木主要有杉、松、樟、楠等，还有山苍子、油茶、油桐、柑桔、罗汉果、蜜核桃、梨等经济林木，并盛产茶叶；竹类有楠竹、苦竹、紫竹、斑竹、方竹、观音竹、凤尾竹等，品种繁多。江华县是一个“聚宝盆”，现已发现的矿产有金、钨、锡、铜、铁、磷、水晶等十多种。由于境内山多，田地较少，耕地面积只占全县总面积的6.5%，人均耕地不到一亩，人称“九山半水半分田”。农作物以水稻为主，比较有名的品种是香禾米，属粳稻类，饭熟时香溢满屋。但一年只种一季，产量较低，每亩约300—400斤。

大石桥处在县境西南的丘陵地带，起初这里是湘桂官道上一个传递文件的驿站，后来发展成一个有半条街、几个铺面的集镇。民国初年，江华县划51“团”，“团”相当于现在的乡，“团”的领导人称“团总”。当时大石桥一带称“斗光团”，“团总”即驻在大石桥。现在大石桥乡政府也驻在此。

鸬鹚塘村在大石桥北，依傍湘桂官道。笔架山和一字山紧锁住进村小道，一条人工修建的渠水从村中缓缓流过。村子背后，屹立着拔地而起的奇峰，如笋如柱，蔚为壮观。山

中密布大大小小的溶洞，大的可容纳数百人。洞内地下河常年水流不断，怪石林立，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山上林木繁茂，风景异常秀丽。村子由李、虞、郭、彭四姓组成，李姓、郭姓也是由南面广西迁来的。到我出生时，全村有50来户，都是瑶族。鹧鸪塘村现在已是百户人家的大村庄了。

我们这一带的生产、生活与岭东高山区相比都较好些，生产方式、耕作制度与汉族没有多少区别，以种水稻为主，辅之以经济作物；生活上却仍然保持着一些古朴的民族习惯、乡风。瑶族有民族语言，但多能讲汉语，文字也使用汉字，没有民族文字。瑶人至今仍保持着一种朴素的集体观念和民族感情，一家有难，四面八方相助；一家来客，同寨人争相看望问好，主人尽其所有热情招待。民族服饰式样很多，不同地区的瑶人有其不同特色的服饰，大山区较丘陵区民族特色更浓一些。我们丘陵地区的瑶族服饰，无论男女多以青蓝布为衣，对襟齐领，喜庆之日，妇女常加妆饰，头戴小花冠，发髻盘于脑后，横插银钗，两耳垂环，手戴玉钏，衣系银扣，镶彩色宽花边，胸系刺花围裙，身佩银链、银牌、银针筒等饰物，足穿绣花尖头鞋，极为绚丽美观。在我们瑶家，女子是不缠足的，没有“男女授受不亲”的旧礼教束缚，也少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男女青年交往相当自由，女可嫁到男家，男也可嫁到女家。每到冬天，男青年就聚在一起练武、玩耍，姑娘们也一起玩，父母不加干涉。男女之间常常通过对歌来表达感情，寻找朋友，订立婚姻。每年的清明、端午节，女方赠送男方鸡蛋、粽子等礼物，中秋节则是男方往女方家赠送月饼，俗曰“哥送月饼妹送鞋”；“九月重阳哥送篮，十月十六妹再还”，表达友谊情义。当姑娘出嫁的前3天，方圆10华里左右的男女青年都可到姑娘家参加

歌堂对唱，输了的背鸡笼。唱词多是感谢父母养育之恩，称赞姑娘聪明伶俐，祝愿新婚快乐等等。瑶家除与汉族人民有共同的节日外，还有些自己的节日，如农历三月初三庙会，吃芝麻糖粘白米糍粑。四月初八是牛生日，每年到这一天，就让牛休息一天，为牛过生日，将牛平常最爱吃的米树叶捣烂浸水，把糯米拌入，煮好饭用芭蕉叶包着喂牛。这一天，牧童吃鸡蛋，农家也吃米树叶水拌糯米做的饭，以表示对牛的感激。

由于自然环境和生产条件的限制，特别是旧社会民族压迫的影响，我们这一带瑶人中还没有大量占有土地、森林的豪富，除各家有少量土地外，各姓还有些祖传的公祭田，租给各户耕种。山上和岭上的树木大多是全村共有的。村里的生活和生产用水主要靠一条渠道，源头是离村3里地的大石桥山边的一口井，我们在井旁建了一座庙，叫白马庙，井就叫白马庙井。过去常为水利引起纠纷，尤其天旱时，别村的人常挖潜流截断水源，只好打官司，甚至两村聚众械斗。

我18岁离开家乡，外出求学，参加革命，几十年没有回去过。记得1958年在杭州时，我陪毛主席去杭州饭店会见周谷城、谈家桢等3人，途中，主席提出了几件事物问我瑶族话怎么说，我一一回答了。他又问我汽车怎么说，我说不上来，20年代初，家乡人还没见过汽车，也可能瑶语中就没有汽车这个词语。老人家听后爽朗地笑了。主席又问我寄钱给家里吗？我说，没有寄。他即很亲切地说，你没有钱吧？他还说，他写了几本书，有些稿费，支援你一点，不必客气。我说，那是你劳动所得，我不能要，谢谢主席。他还问我家里有什么人，我告诉他，父母都已去世，只有80多岁的满叔和我的三哥。他劝我回去看看，一方面见见30多年未见面的

家人，另一方面，了解一下瑶族群众的生活。我当时因为工作太忙，抽不出时间，直到1965年，我送越南人民的领袖胡志明同志从杭州去广西，经毛主席批准，才顺便回乡住了几天，对家乡的生产、生活情况作了一些了解，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了报告。从上述毛主席同我的简短谈话和我多年的工作实践深深体会到，毛主席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全国各族人民的领袖，他对瑶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是非常关心的，他一贯主张，各民族都有长处和短处，应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民族之间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团结起来，共同发展。正是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指导下，我国各族人民空前大团结，有的少数民族从奴隶制度跨越了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共同走上了社会主义大道。

童 年

我的童年是在贫困劳苦的生活度过的。我家以务农为生。父亲虞有葵，为人忠厚，办事公道，在村中有些威望，曾任本村十几户虞姓人家的甲长。母亲唐氏。我自1925年到衡阳上学后，只是在这一年的年底和第二年暑假回过两次家，以后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我离开学校，开始了职业革命生涯，就再未见过我的双亲，他们也一直不知道我的下落。直到全国解放后，同家里有了联系，才听说父母亲已分别于1944年和1936年去世。我每每想到严父慈母辛勤地把我抚养成人，我却未能对他们尽点赡养的义务，心情颇难平静，有时不觉潸然泪下。要是他们能活到全国解放，亲眼看到封建地主被打倒，人民成了土地和国家的主人，而这当中

也有他们子孙的一份绵力，那该多好啊！

我有4个哥哥，大哥上念，二哥上愈，四哥上恩，都早已去世；三哥上愈，1990年90岁高龄而逝。他大我7岁，与我同月同日出生；还有个姐姐叫运秀，在我记事时就出嫁了。

我家经济来源以种田为主，自有几亩薄田，又租种了三叔家和虞姓家族的祭田大约5亩。田里的活主要由大哥、四哥和几个嫂子承担，父亲和三哥则做些豆腐、烧酒出卖，以弥补艰难的生计。二哥由于身体不好，很小就跟二叔信道教，学做道士混口饭吃，有时也帮家里做豆腐、放羊。一家人勤扒苦做，劳累终年，入不敷出，很难维持全家11口人的生活。

从8岁开始，我便参与家中劳作，放牛打柴。我家养了一条公水牛，它性情温顺，很听话，我常把它赶到野外，让它自己找草吃，就和小伙伴们玩耍下棋去了。有时我坐在牛背上睡着了，它会背我回家。同村的孩子总喜欢在一起放牛，有一次把牛赶到村口的塘边，我们在塘边打闹嬉戏，一不小心，我掉进塘里，同牛一起洗了个澡。公牛碰在一起免不了要抵角打架，我家的牛，弯弯的角，争斗不占便宜，我就用烧熟的地瓜套在牛角上，再用镰刀把煨软的角刮尖，以增强它的“战斗力”。父亲知道后，怕我闯祸，把这条牛卖掉了，又买了一条黄牛。为此，我痛哭了一天。放牛，我觉得还有些风趣惬意，上山打柴，就有些吃力了。当时，我力气小，挑柴回家，肩膀压痛了，就把扁担横在肩背上挑。有一次，我堂三叔远远地看到我挑柴过来，便对我说：“原来是你呀，我一看就知道不是里手，我们村没有这样挑担子的。”这些都是70多年前的事了，但儿时的欢娱和伤感，始终没有忘记。

启 蒙

1917年，我10岁了，看到别家小孩去读书，心里很羡慕，但看到几个哥哥都因家庭困难先后辍学，不得不把上学的念头压在心底。这时，一位在县劝学所作事的亲戚杨蔚霞到家里来，劝父亲送我去读书。他是我堂姐的公公，与父亲同年，他们很谈得来。他见我家里实在困难，便送来一对羊，让其繁殖，以供我上学的费用。父亲见此，也就答应了。我们村有一私塾学堂，请外面的先生来教书。我的开蒙老师名毛彩明，以后还有唐家志、张茂。在这里学习的有村上的三四十个孩子，我二叔的儿子上勉与我同学。学生们上课都是自带桌凳，老师轮流到各家吃饭，后来老师自己开伙，我们帮着做饭。当时，我们读的是新书，从“人、刀、尺”学起，学习方法还是同私塾一样，背不上书来就要挨戒尺打。

在村里读了一年多时间，便转学到大石桥观音堂小学，学校就设在观音堂里，面前是个大墟场，那里曾是行刑杀人的地方。这个小学是团办的，经费来源主要靠集上收的款子，聘有三四个教师。我每天中午不回家，带饭在学校里吃。我深知家庭贫穷和入学求读之难，所以读书很用功。蒋可聘校长常在别人面前夸我书读得好。有一次，砾口村一姓唐的大地主听到后，讥讽地说，“书念得再好，他们家也是没有墨盘底的”。意思是说我们家不是“书香世家”，不会有出息的。这话给我很大刺激，我想，我们家祖辈不是念书的人家，那是因为穷。我的同学中确有不少富人家子弟，姓蒋的团总的儿子蒋先拔就与我同学，比钱，我比不过他们，

比读书，我却比他们强。姓唐的这样说，我越要争这口气。从此，我更加发奋用功，对一些国语课文甚至能倒背如流。70多年过去了，许多往事已经淡忘，但那个地主的话，却始终深印在我的心中，它从反面成为我少年时代奋发的动力之一。

1920年夏，张茂老师带我和虞上懃去县城沱江考学，我俩都考上了县立初级国民小学。

初小二年的生活是艰苦的，回一次家得走70多里的山路，在校中吃饭的米菜都要由家里带来。那时，象我们这种贫穷家庭，供养一名小学生也是很困难的，父母兄嫂要节衣缩食，付出更多的辛勤劳动。在前一年的秋天，四哥病故了，他是家里的主要劳力，他的死对父母的打击是很重的，家庭生活又困苦了一些。

1922年夏，我初小毕业，县长给我们成绩优异的学生发了奖状，还奖了带有“奖”字的信纸、信封。同年，我以优良的成绩考取了江华县立高等小学。

县立高小是一座有悠久历史的学校。1895年，江华即办了“沱江书院”，1902年更名为“江华县立高等学堂”，辛亥革命以后，改为县立高等小学。那时，学校规定，每学期考试的前3名都可作为公费生，免交学费和伙食费。在3年高小期间，除有一学期我因病缺课外，一直到毕业都享受公费生待遇。这也是我能够读完高小，而未因家贫辍学的一个重要条件。

在高小，课程增多了，我还被选为班学生会议长，课外活动和接触社会也多了。这时正处在国内大革命的前夜，社会上、学校里民族民主革命思潮活跃，这使我对人生、对社会开始有了新的认识。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历史上风起云涌的时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愈越加剧，并且策动各派系军阀割据，

连年混战，各自为政，争相出卖国家主权，经济严重破坏。工人失业，农民破产，城市小资产阶级挣扎在饥饿线上，民族资产阶级处境十分艰难。各阶层联合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日益高涨。1921年，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代表中国共产党作为一支新生的政治力量登上了中国历史舞台，在中国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了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政治主张。它的诞生给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带来了新的活力，新的生命，新的希望。湖南是全国最早成立共产党组织的地区之一，在毛泽东等先驱的亲自领导下，马列主义在全省各地迅速传播，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湖南又靠近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的基地广东，同时又是直系军阀割据的南大门，革命和反革命的两股势力在这里交织着，争斗着，国民革命的浪潮也涌进到我们这个山区小县。

我们学校是江华县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和推行革命活动的主要阵地，教员和学生中有不少是接受了进步思想的有识之士，其中对我影响较大的是共产党员韦汉同志。他受党派遣，回家乡开展革命工作，担任学校的教导主任，兼授我们的历史课。他教历史不仅讲历史本身，而且还讲对人生、对社会的看法，讲青年的前途和对社会的责任，讲军阀割据混战给老百姓造成的灾难。这些新知识、新思想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1924年，共产党员陈为人为躲避反动派的追捕，从长沙回到沱江，韦汉老师请他召开一个座谈会，我作为学生会的负责人参加了这个会。陈为人曾到苏联留学，那天他穿着西装，拿着皮包，给我们讲了苏联的情况，讲了上海、长沙等地的革命形势，使我知道了不少新的道理。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1945年党的“七大”后召开的中国革命烈士追悼会上，我才知道，在大革命失败后，他曾任中共满洲

省委书记，在杭州被国民党杀害了。

我在学校期间，曾亲身经历了一次匪患，它给家乡人民带来的灾难，使我终生难忘。我们家乡地处三省交界，历来为土匪出没之地。清朝时，为了剿匪，清兵把湘桂官道两旁的大树都砍了。进入民国后，土匪更多了，广西的土匪部队多次窜入江华一带，还占了县城。他们每人身上背一个布袋子，上面绣着碗口大的“胜”字。他们到哪里，就抢粮要款，烧杀掳掠，闹得鸡犬不宁。我们村在广西到县城的路边，更是常遭骚扰，村里为了防匪，在村周围种上成排的刺树，土匪来了，就把入村的口子封住。村外的岩洞也常是避匪之地。1922年，我在县城上学时，一天刚回到家里，村子就被土匪包围了，三哥连夜带着我偷跑出来，到山上找到了先跑出来的父亲，后来我又跑到离村十几里地的一个亲戚家躲了几天。村里派代表与土匪谈判，土匪索要一大笔款子，村里拿不出来，土匪便把村里的牛全拉走了。第二年春耕时，全村都是人拉犁耙耕田。那时，每团都有一个排的武装，任务就是防匪守土保民的，但是实际上成了团总、老财的“家丁”，他们不仅不打匪，而且是出入集市，强敛硬征，盘剥欺压百姓。我记得，一次我父亲和三哥到集上卖豆腐，不知是为摆摊子还是别的什么原因，父亲被团丁抓去打了一顿。这些人简直与土匪一样。这些情景，在我心中一直也抹不掉，这是社会给我上的重要一堂政治课。

1925年5月15日，日本上海纱厂的资本家枪杀了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并伤十余人。30日，上海工人、学生、市民举行了支援纱厂工人的示威游行。英帝国主义租界巡捕开枪镇压，死伤大批游行群众，酿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激起了上海市以至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全上海的工人

举行了总罢工，学生举行了总罢课，商人举行了总罢市，反帝爱国的群众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各省城市。在共产党湖南区委员会的领导下，工人、学生以及各界群众纷纷组织起来，罢工、罢课、罢市，声援上海的工人、学生，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抵制英货、日货。湖南还成立了“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长沙20000名工人、学生举行大游行。全省各地也都组织了“雪耻会”。这场反帝爱国运动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群众的支持，民族资产阶级也加入了斗争行列，地方政府也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同情和支持。我们高小学生也参加了这次反帝爱国运动。江华县雪耻会组织我们应届毕业生下乡宣传，3人一组，拿着县政府的介绍信，带着留声机，每到一个地方，先开留声机，农民不知是什么东西，都围起来观看，等人聚多了，我们就开始讲演，讲述“五卅”事件真相，揭露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号召群众抵制日、英仇货。农民很欢迎我们，热情招待吃住。这次宣传，走了不少地方，增长了社会知识，锻炼了生活能力。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政治活动的实践，把书本上读到的痛恨帝国主义列强自鸦片战争以来对中国的侵略，同现实的反帝爱国斗争结合起来，从而对我的政治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我人生中的一大转折点。我所想的已经不再单单是为个人和家庭的生存、富裕和荣耀，而是想到了社会、国家：外有列强侵略，内有军阀割据，政府腐败，苛捐杂税，抓丁派伕，经济破坏，民不聊生，国不兴，何以有家？又何谈个人的前途？何是救国之道？何以尽匹夫之责？那时，我象一叶小舟，正驶向波涛汹涌的大海，去奋斗，去搏击，去探求和实践人生、社会、国家的改革之路。

走上革命道路

考入第三师范

1925年夏，我高小毕业，由沱江回到家乡。那时候，农村文化很落后，一个高小生如同科举时代中秀才一样，在乡里是很被亲友邻里敬重的。但是，摆在我面前的现实问题却是下一步做什么？升学？求职？还是在家务农？我记得，有一天，我们几个同学聚在一起，有虞上懃、李琼、周继福等，青年人血气方刚，尤其是刚从反帝的“五卅”宣传活动中归来不久，为改造社会、报效国家，大家踌躇满志，热血沸腾，自然地谈起了各自的抱负。虞上懃、李琼、周继福要投笔从戎，去广东入黄埔军校，他们认为，拿起枪来，打倒列强，打倒军阀，中国才有出路。我说了想报考第三师范的想法，并且说，中国社会落后，民生凋敝，被帝国主义欺凌宰割，主要是因为文化教育落后，老百姓大多数是文盲半文盲，蒙昧无知，要想民富国强，必须从发展教育入手。教育普及了，人民有了文化知识，可以掌握科学，振兴实业，抵制“仇货”；又可制造枪炮武器，捍卫国家，抵制侵略。其他几个同学也畅谈了各自的理想和今后打算，大家高兴地会餐了一顿狗肉，互祝进步，各奔前程去了。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之所以想报考师范，除了有教育救国的思想影响，还由于家庭的经济情况。虞上勳、李琼比我富裕，他们可以不为生计担忧。我就不同了，自己既不甘心回家种田，想继续求学，而家庭又不能负担昂贵的学费，所以只能报考公费学校。穷人家的孩子多是读师范的，毕业后当教员，既不至于失业，又可实现我的教育救国的理想。那时，有的教会学校对一部分教徒学生也给予助学金或者免费，但这部分学生一般在毕业后要为教会服务的。我家中无人信教，我更不相信有什么“天堂”、“上帝”，更不愿终生为“天主”尽义务，因而我决心报考第三师范。

我后来知道，虞上勳考上了黄埔军校，毕业后到了国民党军队，曾任傅作义部队的师参谋长，北京解放时起义，后来回了湖南老家。李琼也考上了黄埔，参加了国民党炮兵部队，后去了台湾，今仍在台。

第三师范校址在衡阳，它面向湘南25县招生，每年级招两个班，毕业后一般是回本县任教。入学考试极严格，考生先在本县考两次，录取8人，保送报考三师，到衡阳参加学校复试，也是考两次，从中录取4人。我记得，在县里考试时，有80多名学生，考试课目有国语、算术、历史、地理、英语等。我自认为平时功课较好，对考试很有信心，所以没有怎样用心准备，就去参加考试了，结果初试考了第八名。我有些着急了，再不敢大意，抓紧复习功课，二试发榜，我考在前列。

由于我争得了县里保送报考三师，全家异常高兴，父母兄长都盼望着我将来能够“学而优则仕”，改变家庭的贫困状况。但是，去衡阳的路费，家里却拿不出来。我二哥虞上愈随二叔给人家做道场挣了两个双毫子，全给了我，又有同

学唐诚帮助，才勉强凑到了去衡阳的路费。

我在父母身边生活了18年，从未出过远门，这次远离家乡去衡阳读书，家里人都依依不舍，尤其是母亲，因为我是最小的孩子，更是牵挂不安，她默默地流着眼泪，一直看着我远去。

从家乡到衡阳，有5天的路程，300多里，多半是山路，全靠步行。第一天到沱江，第二天到道县，第三天到双牌，第四天到祁阳，第五天到衡阳。在祁阳也可乘船，沿湘江而下。我们穷学生是坐不起船的，所以这一段路常常是步行的多。

到衡阳后，我住在三师附近一户姓蒋的农家茅棚里，这里房租便宜。经过学校两次复试，8月发榜，我的愿望实现了，我考上了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

当我尚沉浸在顺利升学的欢乐余波中时，不想又陷入困境，而且这一次打击使我终生难忘。学校规定，新生入学要缴纳10元押金，还要缴童子军制服费，否则不能报到入学。我哪能拿出这一笔钱呵！尽管是寒窗刻苦，一心求读，却只因缴不出押金，就要辍学，我的理想、前途、抱负都将成为泡影。我眼睁睁地看着新生陆续进校报到上课了，我却终日在校外徘徊，愁闷焦急，食不下，寝不安。许多同乡同学见我这种情况，非常同情，有些同学多方设法为我帮忙，后来通过同学介绍，向一位叫龙再灵的同学借到30元钱，才得以缴费入学，这时已经开学一个月了。龙也是江华县人，当时他在长沙读书。后来我听大哥说，他家曾到我家去要债，因当时无钱还他，便说要挑我家的谷子抵债，经我父亲再三说明尽快设法归还，始作罢。

10月间，我大哥虞上念来衡阳给我送钱，还带来一对梧

桐木箱子，里面有衣被和三嫂结婚时用的蚊帐，并嘱咐我快把入学时借的钱归还同学。我知道家里是很难拿出这笔钱的，所以我再三问大哥，钱是哪里来的？他支支吾吾，半天也没说出来。我以为可能是家里卖了什么换来的，大哥心痛不愿说，我也就不再问了。可是我心里一直很不安。

1925年寒假回到家里，高兴地见到一家人，却不见二哥二嫂，我心里有些纳闷，便问母亲，二哥哪里去了？一句话又勾起母亲的伤心，她边哭边告诉我，二哥病了好久，无钱医治，已经于农历七月二十四日病死了，二嫂也改嫁了。说到这儿，母亲更加悲痛起来，一再说，二嫂是不愿改嫁的，大哥劝二嫂，弟弟上学借了钱，人家来逼债，拿什么还人家？不嫁不行呵！二嫂才无可奈何地带着不满周岁的孩子哭着离开了家。大哥到衡阳给你送去的钱，就是二嫂改嫁时夫家送来的700毫子彩礼，当时怕你知道了真情伤心，才没让大哥告诉你。我听了之后，顿时木呆了，悲痛得半天说不出话来，颤抖地扒在桌上大哭起来。我的几个嫂嫂都是童养媳，我和她们从小生活在一起，情同手足，尤其是二嫂，为了我入三师读书，骨肉分离，按当时说定的把带走的儿子养至5岁时再送还我家。这件事，对我刺激极深，使我亲身体会到中国亿万农民家庭的艰难困苦，穷孩子们求学也如此难关重重。由此又联想到当前列强侵略，军阀混战，土豪劣绅横行乡里，民不聊生，不改变这种旧社会，穷苦人哪里会有出头之日呵！想到这些，使我更坚定了要奋斗、要革命的意志和决心。现已事隔60余年，但每每想起二嫂改嫁的事，心里总有说不出的难过，感到十分内疚。1982年，我去广西时，听说二嫂还健在，在钟山县城见了一面，她由孙子、孙女陪着。我看到二嫂身体很强健，很有精神，很幸福，我心里十

分高兴。二嫂当年带走的儿子，名大湘，1949年由解放军复员到杭州一机械厂工作，现已退休，当了爷爷，这对二嫂也略可安慰。

湘南革命摇篮

我于1925年秋入第三师范学习，后又搞工会工作，至1927年5月衡阳“沁日事变”，将近两周年。这两年，正是革命形势高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遍及衡阳城乡的时期。在这两年里，我思想上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奋斗，入团，转党，从一个懵懂的青年学生成长为一个坚定的信仰马列主义的职业革命者。在衡阳的这两年的经历，回想起来，始终感到异常兴奋和眷恋。

第三师范位于衡阳市城东北湘江东岸的晒金坪，前临湘江，背依八甲岭，湘江中帆船上下，两岸垂杨，来雁塔耸立西岸，与校门隔江相对，八甲岭上绿树葱茏，野花似锦，风景宜人。校门前通衢木桥上悬有“南学津梁”横匾，校门两侧挂有“吾道南来尽是濂溪子弟，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的木板雕刻对联，其意深远，字迹亦端庄秀丽。校舍是四面环绕的二层方形建筑，有走廊相连，校门内侧还有风雨操场。从当时的学校建设来讲，确可称规模宏大，设施齐全。可惜在抗日战争中，被日机轰炸，校舍成为一片废墟。

尤可称誉的，三师是一个有革命传统的学校。它的前身是湖南省官立南路师范学堂，是在光绪年间推行维新、振兴教育潮流中建立起来的新式学校。1912年改称第三师范学

校。当时，设在衡阳的省立学校，一律冠以“第三”的顺序，除三师外，还有第三中学，第三女子师范学校，第三甲种工业学校，第三甲种商业学校。从三师成立之初，教职员中即有不少革新人士，学生也最早接受新思想的熏陶，“五四”运动以后，师生中的进步力量更不断增长。1921年，三师就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称SY）。这一年10月，毛泽东同志来衡阳，选定三师为湖南建立共产党的据点，并亲自发展三师学生蒋先云等入党。次年10月，正式建立了中共湖南三师支部。在1924年湘南特委建立之前，衡阳地区党的组织领导工作即由三师党支部负责。所以，三师党支部是全国建立较早的党组织之一。学生组织有各种进步团体，党团组织也可在校内自由活动，校内进步空气浓厚，学生思想活跃，探求真理，追求进步，不少学生争读《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唯物史观》、《向导》、《新青年》、《湘江评论》等书刊。在社会上，三师的学生也是革命活动的先导和主力军，在20年代，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三师培养输送出大批革命志士，有许多人为革命英勇献身。三师被誉为“湘南的革命摇篮”。我正是在这个摇篮里得到哺育，开始了革命的实践。

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从我入三师之始，即受到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培养教育。在当时，同学中乡亲观点是比较重的，我常接近的同学大多数是江华县的同乡，同我最要好的少数同学，有高年级的蒋元斋、罗籍（他们是共产党员）和同班的黄文标（共青团

员)。蒋还是三师团支部和学生会的负责人。他们经常向我灌输新思想，介绍我读一些新书刊，带领我参加一些社会活动。这一年10月，蒋、黄二人介绍我加入了青年团。当时，参加团组织是秘密的，我填写了入团申请书，在入团仪式上宣了誓。团经常组织我们团员和进步学生参加社会宣传活动。我刚入校时，在衡阳，声援“五卅”惨案反帝爱国群众运动尚在继续深入发展，在党的湘南特委领导下，通过由工商学各界联合组织的“湘南青沪惨案雪耻会”发动罢工、罢市、罢课，并多次举行游行示威，三师学生带头发动了募捐活动，支援“五卅”惨案中的上海失业工人。我和同学们还组成讲演团、宣传队，常在市井乡镇演讲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惨史，鼓动工农群众起来革命，打倒列强，打倒军阀，对英、日帝国主义实行经济绝交，抵制英、日仇货，关税自主，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等。宣传队还同工人纠察队联合，到码头、商店查禁没收英日仇货，惩罚贩卖仇货的顽固奸商，通衢街巷的英日商业广告也尽行涂抹销毁。我们经常是每星期要去一次农村进行调查，宣传反对封建，反对土豪劣绅，男女平等，动员农友们组织起来，参加农协等等。团组织还分配我们团员多和同学联系，带动同学参加革命活动。团组织印发了统一表格，团员每参加一次社会活动，包括和同学谈一次话，都要填一张表，写明参加活动的情况，作为向团支部的汇报。

大约是1925年12月，在长沙召开全省临时学生代表会议，蒋元斋提出让我作为江华县的学生代表去参加会议。这次会议是秘密召开的，开会没有固定的会场，采取流动的办法，有时在长沙第一中学的教室里，有时在岳云中学，也去过周南女校；会议也不集中安排住处，我们同来的几个人住

在一个小旅馆里 参加这次会议的，我记得起名字的有：女三师的李绶絃，她是同我一起由衡阳来长沙参加会议的；女二师的张维；女一师的肖范，她后来到了苏联学习去了；还有曾三同志，他是长沙长郡中学的学生，是当时省学联的负责人之一。会议开了6天，会议内容，我记得主要是对省学联成立半年来的工作总结和今后工作安排，并修改了学联章程，为了扩大这次会议的影响，会议还发表了《宣言》、《敬告同学书》、《敬告工农民众书》等，明确提出拥护广东国民政府，拥护工农运动，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等的政治主张。会议中间，团组织还开过一次生活会，我因为有一次找不到开会的地点而未到会，受到了批评。

1926年春季开学后，团组织让我参加校学生会的工作，担任读书股股长。读书股的主要活动是组织同学阅读进步书报杂志，还可为同学们代购代订新书刊。在校门口传达室的右边专有一间房子供读书股活动使用，备有一些书刊，可供同学翻看借阅。读书股的前身是“新书贩卖部”，是1920年恽代英同志来三师时帮助建立起来的。从那时起，它就是吸引进步同学、传播革命思想的地方，三师许多学生从理论上认识马列主义，找到救国方针，树立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决心，走上革命道路，皆是由此得到启蒙。这个工作，我是很愿意做的，它符合我想多读点书的志向，而且也确使我更有便利多读到一些新书刊，多吸收一些新知识。《共产党宣言》、布哈林著的《唯物史观》，以及讲阶级斗争的一些书籍，我都是在这里读到的，也正是由此我初步接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思想。但是，这时还不知道革命怎么个革法。

驱逐反动校长

1926年4月，三师同学为反对校长彭德芳、教务主任姚某（名字我记不得了）无理开除蒋元斋等三同学举行了一次罢课。这次罢课活动，在校内得到进步的教职员工的支持，在社会上也得到广大工农民众的同情和支援。罢课的起因是，“五卅”运动后，军阀省长赵恒惕到处用武力镇压工运、学潮，压制爱国群众运动，1925年10月，以传播赤化等罪名，杀害了安源路矿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黄原是三师学生，共产党员，湖南郴县人。黄的遗骨运回原籍路过衡阳耒河口时，以三师学生为先导，联合各校各界数千人，披黑纱，佩白花，祭奠致哀。三师同学还在校内雨操场举行追悼会，会后游行，沿途悲唱追悼歌：“凄凉风雨悼英豪，源君殉难气节高，艰苦劈划几多载，为谋解放舌唇焦”，并愤怒高呼：“打倒赵恒惕”、“偿还血债”等口号。三师校长彭德芳是赵恒惕安插在衡阳的，是“醒狮派”（反动的国家主义派）在衡阳的头号代表。他在校内散布反动言论，反对国民革命，反对共产党，破坏学生爱国运动。所以在悼念黄静源烈士活动后，彭德芳和教务主任姚某乘1926年春开学之际，以所谓去年寒假考试，蒋元斋、胡世俭等三同学或“学业不及格”，或“操行成绩太劣”，责令退学。蒋元斋等三同学及三师大多数学生向校方多次申诉，请求允许蒋等复学，彭、姚二人不仅不准，反而捏造说蒋元斋等蛊惑学生滋闹，从而引起同学们的义愤，一致举行罢课，要求撤换校长和教务主任。彭德芳等更变本加厉，竟电省派衡阳县长带兵来校

弹压。在学生正义斗争中，终于赶走了姚某。在罢课斗争中，同学们还编演了话剧《不堪回首》。1926年6月，唐生智在衡阳宣布起义“驱赵”（恒惕），彭德芳的后台倒了，他也在一片打倒声中离开了第三师范。

同“醒狮派”的斗争中，我印象较深的还有一件事：校内一个音乐教员，不仅思想保守，反对革命，而且五音不全，教学水平很低，只因为他是“醒狮派”的骨干，所以彭德芳拉他来校当上音乐教员。同学们都不愿意上他的课。有一次，各班同学联合起来，我是班代表之一，楼上楼下一齐起哄，又是打鼓，又是高呼，他终因是不受欢迎的人物，被迫辞职离校。

游斗军阀爪牙

在1926年5月间，衡阳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市以至湖南全省的“游斗宾步程”事件，《大公报》还发表了专题新闻。事情的原委是：湖南军阀赵恒惕企图利用宾步程与唐生智是老乡，又是唐的老师的关系，派宾步程来衡，拉唐阻挡国民革命军北伐。宾步程在衡阳作过许多坏事，他积极投靠军阀，在衡阳和水口山组织军阀御用工会，破坏工农运动，双手沾满工农大众的鲜血，衡阳公众早已对其恨之入骨。这次来衡策反，在他到衡阳的当天，即传开此事，在湘南特委的领导下，三师同学联合三中、三女师等校的学生，我是三师学生代表之一，到唐生智公署大院示威游行，发表演说，揭穿宾步程来衡破坏国民革命的阴谋。第二天，宾步程被学生抓住，如同过街老鼠，被饱打一顿，游街示众，赶出衡阳。

这次发生“驱宾”事件，并不是偶然的。当时，唐生智为了巩固自己在湘南以至湖南的地位，壮大自己的实力，对赵恒惕态度暧昧，对广东国民革命政府也派代表暗通关节，在衡阳还表现了一定的进步倾向，不反对共产党，支持学生运动。5月间，中共湘区党委派夏曦等人来衡，争取唐生智尽快归附国民革命。在此之前，广东革命政府已派白崇禧、陈铭枢与唐生智的驻粤代表刘文岛夫妇两人一起来湘，促唐起义易旗。宾步程恰在此时到衡策反，必然为革命学生和工农群众所仇视和反对。宾步程事件后，在吴佩孚支持叶开鑫军（湖南陆军第一师）反唐的压力下，唐生智终于6月2日在衡阳宣布参加国民革命行列，接受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中路前敌总指挥职务，“讨吴（佩孚）驱叶（开鑫）”，并宣布废除赵恒惕的“省宪法”，在衡阳成立了湖南省临时国民革命政府。

参加北伐宣传活动

1926年6月下旬，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济深的陈铭枢、张发奎两师和李宗仁第七军奉命自粤桂出发，会同唐生智第八军北伐。7月初，第七军的先头部队进入衡阳，以三师学生为先导的各界人民群众数千人，手持彩旗，敲锣打鼓，夹道欢迎，七军的一个营驻扎在三师校内的风雨操场上，营长姓张，我们以校内国民党员的名义与他接头，秘密召开了国民党员会议。我是1925年入团后，受团组织之命参加国民党的。开始我不愿参加，因我刚入学不久，想一心读书，顾虑跨党后会议多，活动多，影响学习。最后还是服从了团的决

定。张营长还带着李宗仁给唐生智的一封信，由蒋元斋陪同张去唐处，促其尽快出师。三师同学为欢迎驻军，举行了盛大联欢会，还常举行球赛、棋赛，帮助护理伤病员。

7月5日，唐生智部自衡阳出师北伐，湘南讨吴行动委员会即动员各校学生组织宣传队，随军宣传，担任向导。我也参加了这一宣传活动，联合三、五人为一小组，有的到农村，有的到工厂、商店以至家家户户进行宣传，动员商会、工会、农会和市民群众慰劳军队，组织担架队，支援北伐。

经过这一段活动，联想到自入第三师范以来的生活实践，虽然仅一年的时间，思想上却已发生巨大变化。在此之前，我一直在家乡生活、读书。江华县是湖南边陲的一个山区小县，县城也不过几条短街小巷，没有现代工业，商业也不发达，交通更为落后，各方面都比较闭塞。来到衡阳，偌大一个城市，既是军事重镇，又是湘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我好象到了一个新的世界，新思想、新知识不断地向自己冲击，尤其是在入团、参加社会活动后，接触面广了，视线开阔了，迫使自己对人生、对国家、对世界有了更多的思考。一方面是看到广大群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蓬勃开展，另一方面也到处可见帝国主义经济、文化侵略的迹象。加之连年军阀混战，横征暴敛，经济破坏，工农生活日益困苦，军阀政府有钱养兵，无钱办学，三师同学为恢复书籍费、增加伙食费以求一良好读书环境，不得已而迭次罢课请愿。在这众多事实面前，原来“读书救国”的理想动摇了，在大革命洪流的冲击下，开始认识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这样地落后，被列强侵略瓜分，绝谈不到什么个人的前途，要改变这种种落后的面貌，必须发动工农起来革命，彻底砸烂旧的社会制度。随着思想认识的提高，我进一步坚定了革命的意志。

职业革命者生涯的开始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在国共合作较好的政治环境下，工农革命运动更推向高潮。为了培养国民运动的骨干，衡阳举办了政治讲习所，唐生智兼所长，以第三师范为据点，由校长蒋啸青实际主持，从衡阳各校招收了500多名党团员和进步学生，讲授政治、军事和工运、农运、妇运、学运等基础理论和知识，毕业后即派驻各地开展和领导国民革命运动。同时，蒋啸青还鼓励和支持三师的大批党团员和进步学生走向社会，结合工农，从事革命活动。在这一年的十一、二月间，共青团湘南特委书记周鲁和三师团负责人蒋元斋找我谈话，说拟将我调出学校，专职作学运工作。我没有同意，自认为是穷苦人家出身，性格比较腼腆，不善讲话，又是低年级学生，不适宜也难以搞好这个工作。最后，团组织决定我到衡阳市总工会做青年工人工作，由团特委介绍我到党特委，转为共产党员。由此开始，我离开学校，走向社会，在实践中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了。

衡阳市总工会是在1926年8月正式成立的。早在此之前，我党就在工人中开展了工作，但是，市工会、县农会却为当地豪绅军阀控制。北伐军入衡阳后，御用工会垮台，在新的总工会领导下，工运工作十分活跃。1926年底，全市已组建基层工会35个，有组织的工人4万余人。当时，市总工会的主要干部有，委员长王球，“马日事变”后被敌逮捕，英勇牺牲；顾问唐朝英，“马日事变”前调离衡阳；顾问由胡子厚担任，胡原是安源工人，曾去苏联学习，他来工会不久，同王

其俊结婚；王是女三师的学生，同我一起由学校调到工会的，她分管女工工作。那时，工会活动主要是开展革命宣传活动，支援北伐战争；再一项经常性工作是发展会员，新建和扩建基层工会，举办工人夜校，组织工人学文化、学时事，发展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党组织。工会也支持和领导工人进行一些经济斗争，如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劳动时间，改善劳动条件，以及反对封建性工头和包工制等等。当时正处在大革命的巅峰时期，所以这些斗争大部分都顺利实现了，工人工资普遍有所提高，一般提高20—50%。在工会领导下组织了工人纠察队，维持社会秩序，禁烟禁赌，打击破坏分子，同买办奸商斗争，没收洋货等等。工人纠察队着蓝布制服，扎蓝布裹腿，佩红袖章，还配备有少数枪支。其时，纠察队的主要武器还是梭镖、竹刀，竹刀都涂以桐油，锋利同钢刀差不多。我在市工会工作期间，更多是到杂货店、布店、药店等店员中和人力车工人中活动，同工人们谈话，检查组织情况，发展党员等。1927年春，我兼任湖南汽车路总工会湘南办事处主任。那时，工会工作是公开的，是由我党领导的，我每月工资30元，自己留15元生活费外，其余全部交作党费。

现在回想起来，在工会工作期间，工人群众意气风发，确是轰轰烈烈，一派兴旺气象。但是，好景不长，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7月，宁汉蒋汪合流，反共清党，黑云又笼罩了中国大地。

大革命失败

白色恐怖笼罩衡阳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高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一方面，武装干涉中国革命；另一方面，加紧分化革命阵营，寻找新的代理人。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在孙中山死后，时刻想夺取革命的领导权。他背叛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1926年3月制造了“中山舰事件”，5月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整理党务案”，打击和排挤共产党，攫取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军事大权。当北伐军进至长江下游地区之后，蒋介石立即与帝国主义进行政治交易。在帝国主义和江浙财团的支持下，于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然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指使其反动军队袭击上海工人纠察队，占领总工会，疯狂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上海。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我党领导人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蒋运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一些人士联名发出了“讨蒋通电”，武汉、长沙等地的群众纷纷举行大会，声讨蒋介石。

石的反革命罪行。消息传来衡阳后，广大工农民众十分愤慨，而地主豪绅、反革命分子却趁机大肆活动，到处造谣，反对共产党、反对工农革命运动。正在这个时候，衡阳西乡一个叫刘笠僧的，是白化党（即地主党）头子，在第十六军范石生部当参谋处长，潜来衡阳，勾结土豪劣绅，企图招兵拖枪，进行反革命活动。此事为西乡农协知悉，将其抓获，并从其身上搜出许多“委任状”。4月20日，衡阳上万群众，在中共湘南特委的领导下，于雁峰寺前坪召开公审大会，由特别法庭判决反革命分子刘笠僧死刑。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高呼“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叛徒蒋介石”等口号。这时，衡阳的革命气氛还是很浓厚的，城乡各地逮捕了一批土豪劣绅，工农武装也有些发展。

在蒋介石的反革命策动下，国民党反动军阀接踵发生叛变。5月17日，夏斗寅在宜昌叛变，率独立第十四师进攻武汉，旋被击溃。5月21日，湖南反动军官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即“马日事变”。此后，衡阳的局势急转直下，反革命气焰日益嚣张，土豪劣绅蠢蠢欲动，有的地方公开反扑。5月27日，驻衡阳的湘军团长俞业裕勾结桂军第二教导师师长李抱冰发动叛乱（即“沁日事变”），反动军队进占了总工会、农会、农讲所、特别法庭等各革命团体住地，解散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释放了被扣押的作恶多端的土豪劣绅。党组织被迫离散，工农革命组织失去领导，共产党员、工农革命群众和国民党左派知名人士等共260多人惨遭屠杀，衡阳城乡一片白色恐怖。

形势骤变，我在思想上是从未这样想过的，对当时形势的严重性也是认识不足的。那时，我年纪轻，革命理论和实践经验都极为缺乏，加上对形势的认识有片面性，只看到北

伐的革命形势很好，军事顺利，工农运动轰轰烈烈，翻天覆地，而没有看到在高喊着北伐和国民革命的口号下，革命队伍中的有些人表现了对工农运动的动摇，更没有看到国民政府上层人物有些人实质上是代表资产阶级的，甚至有些人是代表豪绅买办阶级的利益。在国民革命军中，也有不少人虽然赞成北伐，但却是反对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反对工农运动的地地道道的地主豪绅阶级的政治代表。由于对这些重大问题认识不清，所以在革命节节胜利之时，只是对革命胜利充满了乐观和信心，而想不到在革命高潮之时会发生突变，国共两党全面分裂，更想不到在革命内部还有敌人会举起屠刀杀人。

在这种严峻情况下，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包括湘南特委在内，对国民党右派和军阀联合发动反革命政变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必要的应变措施。从湘南特委当时的工作和执行政策上回忆，现在看来，也有问题。据说，湘南特委也讨论过农民武装和土地革命的事，尽管湘南特委是赞同土地革命，也赞同农民建立自卫武装，但是，怎么分土地？怎么组织武装？讨论来，讨论去，却是等待中央和湘区党委指示，而不知自己动手去千方百计积极实施。工农武装、土地革命这两环都没有抓住，有些地方在执行政策上又发生了一些“左”的偏向，因而应变能力很差。这个教训是极为深刻的，这个责任不能过多地责怪湘南特委，从领导上来讲，湘区党委也应负一定责任的。总之，我认为，当时我党还处于幼年，一切没有经验，没有思想准备，遭受挫折，也是难以避免的。

衡阳市事变发生后，即时陷入一片混乱，同志们四散出走转移，我与总工会的同志也失去了联系，原来与我一起住在

总工会内的王球、胡子厚、王其俊等同志都走了，也不知他们去了哪里，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团部占了总工会，我的行李衣物都没来得及拿出。怎么办？到哪里去？当时，首先想到的是先到第三师范去找蒋元斋，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又是特委委员，而且我到总工会工作之后，仍然保留着第三师范的学籍，还不断到学校去的。碰巧我遇到夏明瑜同志，她是夏明翰同志的小妹妹，因她是个女孩子，不惹人注意，所以，我请她混进总工会院内，帮我拿出装有文件的一个皮包，随即离开市区过江。那时，第三师范也是乱哄哄的，学校已不上课，学生大都已四散回家或是暂时躲避起来。我想找蒋元斋联系，也没有找到，只好先到学校附近一个熟识的农民家中暂时住下来，慢慢再找组织联系。

过了几天，我同黄文标同志取得了联系，他和我一起到了濂溪小学钟白华老师那里。钟也是江华人，他在衡阳第三师范毕业后，曾回江华县任教，是我读小学时的图画老师。在钟老师那里，见到了湘南特委秘书长杜家俊同志。杜家俊同志对我说，湘南特委在衡阳四乡组织游击队，准备武装起义，还说，衡阳西乡洪罗庙地区有13条枪散在山里，特委拟派我任区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设法把枪掌握在手中，组织成一支武装力量，搞游击战争。那时，我还不深刻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意义，但是衡阳城内的白色恐怖，面对着拿枪的敌人，我也觉得不发动群众，不拿枪同敌人斗争是不行的。所以，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特委即派一交通员护送我去西乡。这时，衡阳的形势日益紧张，反动派已成立“清共委员会”，开始“清乡”。因为我说话不是衡阳当地口音，为了不致引人注意，我装作哑吧，在交通员的妥善照顾下，一路顺利地到了西乡，住进一户农民家里。交通员和这户农

民的姓名，我都记不得了，至今印象很深的是，我乔装哑吧装得很象，不仅一路上未被人发觉，就是寄居的主人家也没有认出我是一个假哑吧。这家农民对我们很好，还曾特意做了鲜黄花菜炒肉片请我们吃，味道特别香。在这里住了两天，因没有找到关系，只好又返回衡阳。回来的路上，我仍装哑吧，为了避免被人认出，没有再走去西乡时的原路，而改走水路，由蒸水顺流而下，在濂溪小学的前一个码头，我即与交通员分手，独自下船走了。以后，我向杜家俊同志报告了去西乡未联系上的情况，不久，特委分配我担任湘南特委和湖南省委的政治交通员。

两进长沙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国内形势和各种政治力量发生了大动荡、大改组，中国革命由高潮暂时转入低潮，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疯狂镇压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为了挽救革命，在我党的领导下，先后举行了南昌起义和秋收暴动，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以革命武装力量反对反动的武装力量，从而揭开了武装革命斗争新的历史时期的帷幕，针对当时国民党反动派血腥大屠杀的严重形势，我党的一切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党的上下级之间的联系，报告工作，传达指示等等，都只能依靠秘密工作，通过政治交通员来传递。我担任政治交通员的具体任务，即是在湘南特委和湖南省委之间传递文件、信息。这是一项极为机密的重要工作，有严格的工作制度，并且要求每个交通员有高度的警惕性和组织纪律性，要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卫党的机

密和组织。

我担任政治交通员期间，曾两次去长沙。第一次是在1927年6月，我由衡阳乘船，沿江而下。当时，衡阳至长沙还没有铁路，汽车路也尚未完全修通，南北往来主要靠水路，湘江上下，帆船如梭，比现在还繁华些。与我同乘一条船的还有一姓郑的70多岁的老财主，带着他的老伴和一个长工。路上无事，就同他聊天。从他言谈中得知，他是宁远县的大土豪，县里农民暴动，成立了游击队，用他的话说，“世面乱了”，他逃避农民的斗争跑出来，到长沙寓所居住。老头还对我说，他有个儿子在长沙读书，与江华县的黄璟是同学，问我是否认识黄璟？我顺口答，他是我堂兄，我名黄琳。那时为了秘密工作的安全和隐蔽，必须使用假名字，假身份，以作掩护。我虽不认识黄璟，但知他是我县岭东人，已辍学在家。我的名字从虞上聪改称为黄琳，即由此开始。我还对老头说，我是长沙第一师范毕业的，在衡山县教育局工作，衡山也不安定，我辞掉了那里的差事，准备到长沙找老同学看看是否能谋个职业。我又有意识地流露出，我在长沙无亲无旧，住旅馆也要有铺保，如果一时找不到同学，真困难了。老头听说我是他儿子同学的弟弟，加之有一次老头在船上曾绊了一下，恰我在旁边，赶上前扶了他一把，才未跌倒，老头很感激。旧风俗是很重“人情”和同学、同乡这种世谊关系的。所以，船到长沙码头时，老头对我说，黄先生，你在船上等一等，我先上岸去看看。一会，他的长工就回来了，对我说，黄先生，老先生欢迎你去。就这样，我住进了老头的公寓。

在郑家一住就是一个多月，虽然我一到长沙就向省委发出了联系的信息，但一直没有派人来联系。我在郑家与长工同

住在楼下靠近厨房的一间屋子里。平时陪老头谈谈天，有时也同老头到外面走走，逛逛庙宇。老头公寓里还有女儿及小儿子和他同住。在郑家寄住期间，有几件事引起了我的警惕。郑家离明德中学很近，在凉台上就可以看见学校的操场。有一次，我正在看学生打球，老头的女儿也上凉台来了，同我闲谈，突然问我，“共产党好，还是国民党好？”我即时警觉起来，她问这个什么意思？我听说，她原在湖南国民党省党校学习，“马日事变”后，党校被封闭，回家来了。湖南的国民党是我党帮助改组和发展起来的，党校里面有不少共产党员和倾向共产党的进步青年，但是，她的身份和思想情况如何，却不清楚。所以，我推脱说，离开学校很久了，不知道什么共产党、国民党，说不出哪个好，哪个不好。又有一次，她邀我去岳麓山玩，这又使我很为难。从我当时的政治交通员的身份，正在执行党的任务，怎么能随便行动呢？怎么答复好啊？怎样才能不引起她的怀疑呢？我略一沉思，想出了一个办法，于是回问了一句，老先生去不去呵？如果老先生去，我很高兴陪着去。老头说，不去。这正中下怀。我马上接口说，老先生不去，我就在家陪老先生聊天吧。还有一次，她问我“冤枉”二字怎么写。这又引起我许多联想，她真的不会写这两个字？不可能呵！会写，又为什么来问我？我又想到前些日子问我共产党好不不好的问题，我有些震惊了。我自问，她主动同我接触，还提出这样那样问题，是一般青年人的闲谈？对政治思想问题的探讨？还是我有什么不慎，露出马脚，引起她的怀疑？这一连串问题，不得其解。我想，无论如何，要赶快离开这儿，再住下去，难免会出问题。于是，我发出催促联系的紧急信，请求速派人来接头。不几天，组织上派人来了，带我到江边永州码头一个

木匠棚里，我交了给省委的文件，来人告我可以回去了，并给了我回衡阳的路费。我告诉老头，已同朋友见了面，留下伙食费，即刻告辞，回到衡阳。

第二次去长沙约在7月底或8月初，住在衡阳会馆。寄出联系信后，一个星期过去了，也没人来接头。当时，我只带了一件单衣，一把雨伞，再无其他行李，会馆又只能准许住7天，这使我感到很困难。只好恳求再多住三两天。幸亏在第十天上面来人接头，带我到一个香铺的楼上住下。地下工作者是有严格纪律的，非直接关系人是不能询问来历和发生横的关系，所以香铺的掌柜也不问我的来历，我也不打听他的关系。我在这里住了几天，整日关在楼上，楼下就是做香的作坊，往日闻到点燃着的香味，也不觉难闻，这次住在香坊里，却熏得头也疼。我想，做香的工人整年累月不分昼夜地在这种环境里劳动、生活，真是苦呵！

几天后，组织上通知我可以走了，带我到了一个很豪华阔气的大旅社，在那里见到了曾志同志，她是郴州市委派来长沙的。她原是衡阳女三师的学生，过去我们就熟识。组织上向我们交待了任务，让我们以表兄妹身份同行，并交我们带回给湘南特委的文件和有关“八一”南昌起义的宣传品。我同曾志同志即离开长沙，先乘火车到株洲，我把文件捆在大腿上，坐在车厢内靠窗子的位子上，曾志同志坐在我外侧，帮助掩护。在株洲又换乘木船，老板是夫妇二人，我们上船后，他们执意要再多搭乘一客人，真不巧，有一从武汉来的国民党军官搭上了船。本来一条小船，仅数尺之地，我又携带着党的文件，与一国民党军官同船，情况就够复杂了，而这个国民党军官还不断地同我们唠叨，大骂共产党。我们真提心吊胆，怕出问题，真险呵！为了避免这个麻烦，船到衡

阳的耒河口码头时，我假称要去看个朋友，就先下船走了。

我当交通员时，组织上安排我住在陈寅生同志家里，他家在河坊街，靠近衡阳城东门的湘江边上。当时，时局紧张，几乎每日都有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逮捕杀害。陈的母亲很害怕，不愿意留我居住。组织上也考虑，我在工会工作期间是公开身份的，又是外地人，在衡阳很难隐蔽，决定调我去外地工作。1927年10月，我离开衡阳，到了安源，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在 安 源

在1927年9月秋收起义之前，安源的党团组织、革命武装以及工会、农会等群众组织，仍然公开活动，安源党的组织对许克祥在长沙叛变后的整个政治形势，同其他地区党的组织一样尚无清醒认识，不知道积蓄革命力量，也无充分应变准备，5月底，还组织安源工人纠察队和萍乡工农武装1000多人参加围攻长沙战役的准备工作。6月初，许克祥带领反动军队反攻萍乡，捣毁了党部和工会、农会等革命组织，第二天又进犯安源，工人们仓促逃散，部分下井，部分上山。许克祥部怕被安源和周围的工农武装包围，在安源停留几小时，即撤回萍乡。这时，萍乡县的国民党县长傅作霖和土豪劣绅、反革命分子借机大规模反扑，纠集四乡地主武装，并欺骗煽动部分农民围攻安源半个多月。这一连串的事变，使党和工会组织迭遭摧残，一些领导同志也遭杀害。在秋收起义中，安源工人纠察队和矿警队参加了秋收起义部队，离开了安源，市委的主要负责同志也随起义部队走了。因而，

从市委到支部，党的工作曾一度停顿，工会工作也无人领导，矿区生产急剧萧条，资本家又常欠饷不发，工人生活困苦不堪，革命锐气大受挫折。那时，安源的局势相当混乱，党和工会等组织急待恢复和整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省委分配李运钧、袁晓熙等同志来安源，我于10月也到了这里。

安源的联络点在老街，与我接头的是工人郭炳坤同志，他是安源市委负责人之一，平江人。当时，湖南省委已派李运钧同志任安源市委书记，他是湘潭县人。我在安源的公开身份是修理厂的学徒工（学钳工），师傅姓唐，名字记不得了。我在党内任安源市委技术书记，负责管理文件，刻印党的宣传材料等工作。以后，不任技术书记，分工负责联系第九、第十三两个党支部。第九支部是电厂支部，书记余文璧，湖北人；第十三支部是窿内支部，成员都是煤矿地下坑道工人，支部书记刘思明，醴陵人。在安源，我住过几个地方，先是住在郭炳坤同志介绍的姓盛的家里；以后搬到易泽恩同志家，他是洗煤台工人，党员，40多岁，有个老伴，没有子女，他们待我很好，我称呼他们姨父姨妈；后又和三号桥与一姓汤的看守煤炭工人（醴陵人）住在一起；最后同刘思明同志住到一块。

安源是有革命传统的工矿地区，党的工作有较深厚的基础和影响。经过一段深入的积极工作，党组织和群众组织很快恢复起来。恢复党组织工作的主要方式是找党员个别谈话，了解情况，凡是愿意继续参加革命斗争，表现积极的，予以恢复党的组织关系，编入支部；对不同意参加党的活动的，即为退党。在这一期间，曾数次酝酿推选改组安源市委，并曾在省委来人的指导下，在党的积极分子中推选了7

人组成临时市委。12月5日，由扩大执委会选举正式成立了市委，郭炳坤、廖保庭、张碧池、王德甫、谭道云、李运钧、颜南山、邓贞谦等9人为委员，王瑞德、袁晓熙、罗桂生等为候补委员，李运钧为市委书记。原来全市共有党员900来人，秋收起义中在醴陵、浏阳一带死伤百把人，失散的也有百把人，现尚留在矿山的有700多人；原有3个党的区委，已恢复2个，紫家冲区委未恢复；原直辖17个支部，除第四支部未恢复外，其他支部均已恢复，为了便于活动，更多地采取小组活动的方式。市委成立以后，即决定成立萍矿总工会。经过艰苦工作，1928年4月，总工会正式成立，在山土召开了成立大会，以各工会小组为基础，加上各地、处、窿、段工人代表，共200多人参加了大会，省总工会和安源市委、安源农民协会都有代表出席讲话。大会高呼“拥护中国共产党”，“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口号，大放鞭炮，气氛十分炽烈。

在恢复组织的同时，在党的领导下，曾接连举行过多次罢工和暴动。在近半年来的时间里，主要有以下几次：

一次是1927年11月间举行的经济罢工。由于“马日事变”之后，矿局即未按月发饷，尤其是在9、10两月，每人领饷不过6元，平均每人每日仅有伙食费1角，而且还常开除工人。工人们不堪经济上的剥削和政治上的压迫，在9月间，一部分工人曾自发进行了罢工。由于没有党和工会的领导，没有形成一支有组织的力量，斗争没有结果，但工人的斗争情绪仍是十分高涨。市委根据这种情况，为了解决工人群众生活的困苦，决定积极开展工人经济斗争，于11月18日实行全体总罢工。市委召集各支部书记和活动分子大会，做了动员，发出通告，号召“全体党员应奋发精神，一致动员，即

刻跑到工人群众中去活动，鼓动罢工”，并对这次罢工的鼓动方法和罢工技术都作了具体布置。

这次罢工以按月发现饷和清理欠饷为主要斗争目标提出了13条要求：(1) 每月按期发饷；(2) 发清以前欠饷；(3) 恢复失业工人工作；(4) 开除工人须得到多数工人同意；(5) 实行矿局经济公开；(6) 不得逮捕工人；(7) 发清工人病死欠饷及因公毙命的抚恤金和公饷；(8) 言论集会结社罢工绝对自由；(9) 逢星期日休假一天，照发工资；(10) 按期发给，年终加薪一月；(11) 矿局实行工人乘车免票；(12) 工人婚丧病假照给工资；(13) 工人与职员待遇平等。千余工人包围了总公事房，扣押了矿长谢子敬及部分重要职员。军队即开来镇压。萍乡县知事也来安源，召集工人开会，企图软化工人，均被工人反对；以后又利用工贼欺骗拉拢工人，组成所谓管理委员会，名义上是工人管理，实际上是控制在一些工贼手里。罢工持续了五、六日，矿局答应每人发饷8角，以卖焦煤款发清欠饷，并同意由工人推选代表组织监督委员会，监督矿局生产及经济开支。在斗争取得部分胜利的情况下，部分党员和工人想就此和平了事，不愿再斗争下去，而且有些工人已进矿上班，遂即被迫复工。

罢工结束以后，矿局仍继续以改良手段欺骗群众，并派工贼混入工人监督委员会当上了委员长，采用各种阴谋手段挑拨窿内外工人的矛盾，分裂工人。根据上述情况，市委又接到省委关于夺取全省政权的指示，于是，在12月初，又组织进行了一次暴动，即发动“萍安总暴动”，以促成全省总暴动。市委将所辖区域划分成安源、萍乡、湘东老关、上栗市等5个暴动区，要求各区“尽可能夺取政权，建立工农政府”。12月10日，宣布安源工人总罢工，提出：“要饭吃，

要发饷”等鼓动口号，同时宣布暴动目标：（1）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兵苏维埃；（2）没收萍矿，归工人管理；（3）恢复萍矿总工会。11日上午，2000多工人包围了总公事房，抓住矿警局长等职员30余人，送进矿井关押。安源驻军即出动，抢回被捕职员，并大肆逮捕工人。街市白日戒严，敌军枪声不断，也时有工人掷炸弹的爆炸声。12日，郭炳坤同志及其他几位党员被捕，其他几个暴动区因准备不足，而未能及时响应，暴动即失败而停止。郭炳坤等4同志于14日为敌人杀害，1000余工人被开除，党的组织和工作受到极大损失。

市委执行上级党委指示，认为这时期“仍然是总暴动夺取政权，以促成全省继续的总暴动”。在阴历年关，又发动了年关闹饷及失业工人要求复工的运动。这次行动，由于准备工作更不充分，又有上次暴动失败的影响，工人群众参加者不多，事实上成为单纯的共产党员的盲目行动，所以获得成效甚微。

1928年1月，正值阴历过小年之时，萍乡北部上栗市农民暴动，解除团防武装50余支枪，上了斑竹山。在这次暴动中，没收了钱庄的一部分银票，我记得有好几百元。这些银票不好在当地使用，因为在当地使用易于暴露谁是“暴动分子”。所以，市委决定派人去上栗市取回这部分银票。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化装成哑吧，从醴陵北乡绕道到上栗市附近，记不得是什么村庄了，在一农民家中取出银票，回了安源。途中在农民家中吃饭时，主人家曾说我不象哑吧。我听了这话，有点紧张，不敢多停，急忙吃完饭离开了。银票取回，还要去长沙兑换，市委讨论，谁去啊？我主动承担了这一任务。我熟识株萍铁路的一乘务员，姓张，名字记不起了，是位湘西老表，平时我常到他家去玩，就在他当班的一

天，我把银票装在一个麻袋里，交他照顾，乘车到了长沙。这时，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程潜的部队打下长沙，新编第三师正招兵，许多失业流亡的共产党员都进了这个部队。省委介绍我到第三师找了几个同志帮忙，钱庄老板看到是穿“二尺半”军装的大兵，不敢怠慢，把银票统统给兑换出来。以后，我听说，这个部队的同志还给了湖南岳麓山西区的游击队和湘西贺龙部队一部分枪支弹药。

现在回忆，在安源工作期间，罢工斗争胜利的少，失败或者无结果的多，党和群众组织刚有一些恢复和发展，由于罢工斗争失败和领导人暴露，负责同志被敌杀害，党和群众组织又被严重破坏。国民党军队进驻厂矿，工人稍有反抗，即被武力镇压，白色恐怖越趋严重。本来在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已是低潮，急需转变斗争策略，隐蔽积蓄革命力量，为新的革命高潮作好准备。但是，在批判了陈独秀右倾错误之后，党内又产生了“左倾”盲动情绪，对大革命失败后的低潮趋势缺乏正确的估计，把自己的力量看得过大，敌人的力量看得过小，不仅不承认革命已处于低潮，反而认为革命形势“无疑是在高涨”，一味主张实行盲目进攻，迭连搞暴动，并且提出了“夺取一省政权”的口号。对豪绅地主、国民党政府官吏以及路矿长等人，不分具体情况，不加区别对待，一律采取打杀以及焚烧其房屋等极端手段，并认为用这些手段“可以搅动群众很快起来参加夺取政权的暴动”。当时，对敌人采取“以恐怖对恐怖”的严厉手段，从主观上讲，在大革命失败以后，不少人有一种简单的报仇雪恨的思想倾向，主张实行“赤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以敌人之道还治敌人之身，这也是难免的。我记得，在12月暴动失败后，我住在三号桥，一天夜里，捉来一个工贼，工人们把他

捅了一刀，装入麻袋，丢在三号桥河里。那时，这样做，从客观上讲，也是被敌人所逼。在安源恢复工作期间，党曾动员各方面力量营救在秋收起义时被俘的工人和家属，他们在被关押中，几乎无一不被毒打，有的当场被打死，不少家属被奸污侮辱，有的被迫当了他人的妻妾，情况凄惨得很。所以，在那时有这种报复思想的突出表现，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从党的政策和政治工作来讲，应当教育党员纠正这种错误行为。总之，在这一时期，我们党确实处于幼年时代，无知识、无经验，革命同志多是青年，血气方刚，基于革命理想，凭一股子革命热情，为真理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探索革命胜利之路，敢闯敢干精神有余，斗争策略、灵活应变不够。当时，国际上可提供社会主义革命经验的，也只有苏俄式的工人暴动，武装起义。所以，在革命历史时代的具体条件下，只知道不断地搞游行示威，起义暴动等等，不知道充分利用合法斗争等多种形式，与敌进行长期斗争。那时，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无政治水平，无工作经验，懵懵懂懂，只是在经过井冈山斗争的实践，又在厦门搞军委工作亲自组织参加游行示威等活动，了解到一些基本群众对“飞行集会”等活动不积极，不热情，不靠近我们，我才体会到“左倾”盲动行为导致革命损失的危害性。以往的历史已经定格，今天的人们对它的认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深化的，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是我们党最宝贵的财富。

1928年初，湘东特委决定成立萍乡县委，调我任萍乡县委书记。县委书记王瑞德，萍乡西乡人，安源工人。县委机关设在萍乡县城。我还未正式开始工作，只是来萍乡城内看过一次房子，湘东特委又调我到茶陵任县委书记。同时，还任命谭道云（安源工人）为攸县县委书记。1928年4月底或

5月初，我俩同行，谭到莲花后即到攸县去了，我则由交通员带领，经莲花到宁冈茅坪，上了井冈山，向湘赣特委报到。

这里插述一事：1980年5月，中央组织部将其向中央书记处的一份报告抄送给我，其中讲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人反映，1927年“马日事变”后，我回到江华县，于1927年8月或1928年3、4月在江华县被捕。这真是笑话。从1926年暑假以后至1965年将近40年，我从未回过江华县，何有在江华县被敌逮捕之事。关于这段历史，中央组织部经过调查核实，做出了书面结论：“江华同志1927年‘马日事变’后，至1928年秋冬，在衡阳、长沙、安源、茶陵等地，以及井冈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工作，一直没有回过家。没有在江华县被捕之事。”被捕问题“均属不实，应予否定。江华同志的历史是清楚的，没有问题。”一件荒唐事，附记于此。

上下井冈山

九陇山区打游击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中央于这一年的8月7日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依据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军阀割据的中国社会特点，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大屠杀、以武装革命反对武装反革命的总方针，决定实行土地革命和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独立领导中国民主革命。毛泽东同志出席了“八七会议”，他特别强调，这次组织秋收起义，非军事不可；并说，大革命的失败，完全是由于陈独秀不抓军队，放弃武装斗争；他还用孙中山先生重视军事运动的历史事实，阐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革命思想。“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同志根据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长沙，改组了湖南省委，组织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由于敌强我弱，加之起义军缺乏经验，分散行动，各路先后遭受挫折。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社会的特点，认为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是敌人重兵把守的地方等情况下，在城市已无取得胜利的可能，从而果断地放弃原定进攻长沙的军事行

动，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湘赣边界的农村进军。在毛泽东同志的率领下，起义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于10月10日到了罗霄山脉中段的宁冈，开始了创建以宁冈县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28年4月，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的一部分和湘南起义的农军也转移到了井冈山，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在宁冈砦市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共同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5月20日，在宁冈茅坪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会议，成立了湘赣特委，毛泽东同志任特委书记，陈毅同志任军委书记。与此同时，成立了湘赣边界苏维埃政府，袁文才任主席。我就是在这时到了茅坪。

当时，湘赣边界有两个根据地，一个是永新、酃县、宁冈、遂川四县交界的大小五井山区，另一个是永新、宁冈、茶陵、莲花四县交界的九陇山区。大小五井山区和九陇山区都属于罗霄山脉中段，两区中间相隔50多公里，都是丘陵地带，一天的路程，就可过去了。大小五井山区山高树密，地形极为险要；九陇山区山高树少茅草多，不如大小五井山区险峻。茶陵属九陇山区，原来有党的工作委员会，书记谭思聪，我到之后，成立了县委会。县委无一定的住地，都是同县游击大队一起活动，大队长姓杨，谭家述是游击大队副大队长。由于茶陵县白色势力强大，我常住在宁冈县境内一个叫浆山的村子里，多在九陇山区的宁冈高陇到永新小江边一带活动。我们在茶陵与宁冈、酃县交界的地方还有一小块游击区，并在两个乡建立了基层苏维埃政权，一在县南的湖口区内，主席谭余保，一在县东南的尧口区内，李俭珠为主席。

在茅坪，我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同志。过去在三师读书时，就听说过毛泽东同志是湖南久负盛名的领导人，但那时总无机会得见，这次见了面，很兴奋。毛泽东同志知道我是由安源来的，特找我谈话，询问有关安源、萍乡的情况。我汇报了当地农民暴动和安源恢复党和革命群众组织的一些事情。我讲到湘东醴陵、攸县、萍乡等地农村游击斗争形势很紧张，醴陵南区农民集体围攻湘江东岸渌口镇的几次战斗都失败了；还说到，醴陵南四区的农民暴动后，生产、生活都“集体化”了，实行“共同耕种，共同消费”政策，打破私有制度，没收一切田地，猪、牛、犁具、肥料一概公用，并统一规定了休息时间，吃饭打梆子，全村集中一起吃“大锅饭”，不做工的不得吃饭。分配土地，群众不敢要，把地契烧了，有的群众还是不敢要，许多地方把地埂铲平了。认为这样就分不清那块土地原是谁的，群众就会要了，谁知，地搞得高低不平，后来地主反攻倒算，反而霸占了更多的土地。暴动中，不少地方还发生了乱烧乱杀现象。我来宁冈的路上，看到宁冈、永新、莲花一带情况就不一样，好得多了。当时，我在谈这些情况时，并不完全认为这些做法是错误的，只是对乱烧乱杀有不同的看法，认为是不得人心的。今天回想起来，可见那时我是如何幼稚无知，没有经验，理论政治水平之低。在整个谈话中，毛泽东同志总是面带笑容，很认真地听我讲，使我无任何拘束之感。毛泽东同志的谦虚、平易近人的态度和注重调查研究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后，毛泽东同志对我说，你先到部队去看看，再到县委去吧。于是，我就到红军的几个团队转了几天，看看熟人、同学、同乡。

当时，红军编三个师：第十师，师长朱德，党代表毛泽

东，辖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党代表何长工，主要由南昌起义余部组成；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后叛变），主要是宜章起义的农民队伍；第十一师，师长毛泽东，党代表何挺颖，辖三十一团，团长朱云卿，党代表何挺颖，主要是秋收起义部队和武汉警卫团等部编成；三十二团，团长袁文才，党代表陈东日，由原袁文才和王佐的部队编成；第十二师，师长陈毅，党代表邓允庭，辖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团，主要是湘南耒阳、永兴、资兴等县跟上山来的农民队伍几千人编成的，人们笑称为“梭镖师”，陈毅同志也戏称自己为“梭镖师长”。这个师还带着许多家属，有老年人，也有妇女、娃娃，我看到他们行军时，两兄弟抬着老父亲，妇女抱着娃娃，混杂在队伍中间，五颜六色，坛坛罐罐，真如同苏联十月革命时夏伯阳的队伍一样。后来，领导上考虑拖着湘南这支人数众多的梭镖队伍和家属，战斗力受影响，同时，供给也成问题，所以除留下少数干部外，一律返回湘南原籍，坚持原地斗争。

在部队里，有不少是衡阳三师的同学，我见到了陈东日、彭祐、胡世俭，还见到彭儒、曾志、吴仲廉等几个女同志，这些同学都是大革命失败后一直没有音讯，一年多未见面，在这里相见，格外亲切、高兴。在茅坪住了不几天，茶陵县委就派人来把我接到浆山。

6月中旬，湘赣两省敌军向井冈山发动了大规模的“联合会剿”，湘敌第八军吴尚部，由茶陵、酃县向宁冈推进，赣敌杨池生第九师、杨如轩第二十七师由吉安向永新侵犯。红四军前委分析了当时的敌我态势，决定对力量较强的湘敌取守势，对力量较弱的赣敌取攻势，采取声东击西，佯攻酃县，牵制湘敌，迷惑赣敌之计。红军主力主动退出永新，迅

速攻击了酃县县城，然后返回宁冈，准备迎击赣敌。赣敌占领永新后，听说红军占领酃县，以为红军远出湖南，根据地必然空虚，于是从永新分兵两路，向新老七溪岭进攻，妄图攻占宁冈新城，进逼井冈山。

新老七溪岭相距10余华里，紧靠在龙源口村拔地而起，横在永新、宁冈两县之间，山上树高林密，溪急谷深，地势十分险要。6月23日，战斗打响了，从清晨一直激战到下午4点，接连打垮了敌人向新老七溪岭的几次集团冲锋。我们茶陵游击大队也参加了这次战役，同宁冈、永新的赤卫队、暴动队，还动员了许多群众，配合红军主力的一部，预伏在龙源口地区。当红军主力部队从新老七溪岭冲杀下来，直抄龙源口，向敌人全面反攻时，我们地方部队在山上也摇起红旗，杀声震天，从四面八方向敌人包围过来，敌人腹背受敌，全线崩溃，大部缴枪被俘，部分残敌向永新逃窜。红军乘胜追击，第三次占领了永新县城。这次龙源口大捷歼敌两个团，击溃敌三个团，缴枪千把枝，击伤赣敌前线指挥杨如轩，俘虏官兵甚多，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第一次“联合围剿”，“红军不费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杨），真好，真好，快畅，快畅”的歌谣，传遍井冈山根据地。

红四军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促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形成了根据地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苏维埃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壮大的新局面，根据地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遂川、酃县、茶陵等县各一部分，面积7220平方公里，人口50多万，为边界斗争的全盛时期。

宁冈分田

1928年6月23日，红四军粉碎湘赣两敌第一次“围剿”，第三次占领永新县城。这时，由于根据地刚刚建立，土地还掌握在地主豪绅手里。据当时统计，边区的地主豪绅阶级只占总人口的5%，却占有土地总面积的60%以上，永新县的70%的土地被地主豪绅占有。工农群众仍然受着封建势力的残酷剥削。加上长年受兵匪之害，人民对红军也没有真正的认识 and 了解。为了进一步扩大革命影响，更广泛地发动群众，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紧密地结合起来，造成坚实基础，巩固革命根据地，由毛泽东同志主持，在永新禾川中学（现永新中学）召开了红军连以上干部大会，决定分兵前往边界各地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二十八团往安福边境，二十九团往莲花，三十一团一部往吉安边界，毛泽东亲率三十一团一营往永新西乡一带，我带着茶陵游击队协助宁冈古城地区插牌分田。

由于当时处在战争环境，所以要争取时间，突击分田。分配土地一般要做好三件事：一是写标语，宣讲革命道理，发动群众。标语有用纸写的，贴在墙上，有的用石灰水直接写在墙上，内容大都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打倒土豪劣绅”，“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等。宣讲主要是讲为何要打倒土豪劣绅和分田分地的道理等等。二是做社会调查，一般是开调查会，深入各阶层摸底了解，掌握当地的土地、人口、地主剥削程度、工商业等各种情况；同时，也因势利导地进一步向群众进行土地革命的宣传。这样

做，情况有底了，群众也提高了觉悟。三是分田地。通过调查摸清情况后，即组织群众打土豪斗劣绅，分田分粮分财物。分田地都要插上牌子，牌上写着分到该田地的人名和土地亩数，牌子一插，农民心里就踏实了，并且当众把地主的田契及贫苦农民欠下的债据投入火中烧掉，广大农民群众无不扬眉吐气，拍手称快。当时的土地分配办法，是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打乱平分给农民耕种。一般是以乡或区为单位，按人口，不分男女老幼平均分田地，也有不按人口，而是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的比不能劳动者多分土地一倍。田地分配后，禁止买卖。

1928年12月，毛泽东同志总结了井冈山土地斗争经验，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内容基本上如同上述。后来，毛泽东同志讲，“这个土地法有几个错误：（一）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二）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是属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三）禁止土地买卖。”在当时进行土地分配，没有任何经验，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是难免的，而最主要的是，这个《土地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法律形式规定了农民“耕者有其田”的神圣权利，有力地推动了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对于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29年1月柏露会议下井冈山时，《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和4月间毛泽东同志主持制定的《兴国土地法》，根据党的“六大”精神和井冈山分田的经验教训，对土地政策作了重要的更改，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到1930、1931年，毛泽东同志又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土地政策，土地所有权归农民私有；分得的田地允许买卖；分配办法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抽肥补

瘦，并纠正了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的错误作法，对工商业也强调保护政策，地主经商的，只没收其田地封建剥削部分，对其工商业部分，予以保留不动。但是，在1929年12月，在对待富农政策上发生一很大变动，党中央发出《通告》，提出：“富农领导已经成为阻碍斗争之极严重的危险，必须坚决执行反富农的斗争，肃清富农在斗争中的影响”。在此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党的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所谓反对富农的文章，推行了过“左”的反对富农的政策。当时，也有些人说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搞了富农路线等等。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关于土地政策和保护工商业的意见是正确的，我是赞成他的意见的。他在土地革命的实践中，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逐步解决了土地革命中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在正确路线和政策的指导下，土地革命获得蓬勃发展，而且为此后全国解放前后普遍开展土地改革准备了丰富的政策和思想基础。

那时，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毛泽东同志召集会议，总结交流土地革命的情况和经验，各县县委书记都参加了。当时，毛泽东同志曾要求我们除口头汇报外还要写出书面报告。在这次会上，遂川县委书记毛泽覃同志没有交出书面报告，毛泽东同志问他为什么不交？他说没有时间写。两人互相说了几句，毛泽覃年少气盛，吵了起来，毛泽东同志发火了，斥责说：“父不在，长兄为父，我有责任教训你！”毛泽覃不服气地回顶说：“党章上没这一条。”毛泽东同志也感到这句话说得不适宜，不再说话了。事后，毛泽东同志向毛泽覃承认了错误，并且多次同别人讲过此事，以此说明，党内要有民主，不能搞家长制。我对此感受很深。

一天疾越两省三县城

1928年6月，湘赣敌军不甘心失败，调兵遣将，准备对根据地再次发动“围剿”。6月29日，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杨开明来边界，杨开明直接去了边界特委所在地茅坪，杜修经带着湖南省委6月26日给边界的指示信到了永新。湖南省委的信中，对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说湖南敌军“十分动摇”，“恐慌万状”，要红四军立即向湘南发展，还硬性指示，“泽东同志须随军出发”，另“派杨开明为特委书记”，并说，这是绝对正确的方针，要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毫不犹疑地执行。面对湖南省委这样硬性的指示，“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在这直接关系到红军和根据地存亡的关键时刻，于6月30日晚，毛泽东同志在永新县城主持召开了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讨论湖南省委意见。会上，杜修经口头传达了湖南省委指示，并且极力主张红军前往湘南；毛泽东同志论述了当时的形势和向湘南发展的危险，指出省委的指示是错误的，红军不宜分兵冒进。宛希先和其他一些同志也摆事实，讲道理，不同意红军前往湘南。最后，绝大多数与会者支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认为红军前往湘南是危险的，应当留在湘赣边界，坚持工农武装割据，巩固和扩大井冈山根据地。那时，我也不赞成红军去湘南，尤其我是茶陵县委书记，当然更希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以巩固和扩大。

7月，湘敌吴尚第八军自酃县向宁冈侵犯，赣敌三军、六军11个团从吉安、安福向永新进犯，企图在永新会合。为

了阻止湘赣两敌会合，解决敌人对根据地的威胁，红军决定集中兵力先打退进犯宁冈的湘敌，再对付赣敌。于是分兵两路，一路由朱德同志率领红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从莲花进取湘敌巢穴酃县、茶陵，迫使湘敌回救；一路由毛泽东同志率领红三十一团，去永新城附近，用麻雀战术打击干扰侵入之赣敌，切断湘赣两敌的交通，不给他们会合的机会。7月12日，红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一路攻克酃县，湘敌闻讯，仓惶退往茶陵。赣军不知湘军已退，仍向永新进逼。毛泽东同志毅然将三十一团分散，广泛发动群众，依靠地方武装，用四面游击的方法，围困住10倍于红军的11个团的敌人。

本来，按原定计划，红二十八团、二十九团打下酃县后，应乘胜进攻茶陵，再回师永新，与三十一团协力攻打永新之敌。那么，敌人的第二次“围剿”，不但可被粉碎，而且根据地可乘机扩大。但是，在攻克酃县之后，二十九团官兵却要回湘南，而且情绪非常激动，甚至高呼口号：“打回老家去”。杜修经本来就是主张部队去湘南的，他不顾永新联席会议的决定，利用二十九团官兵的乡土观念，煽动诱惑部队离开酃县，向湘南进发。毛泽东同志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着急，即通知我赶来永新。毛泽东同志向我介绍了紧迫的形势，让我送信给朱德、陈毅同志，要他们按原计划打茶陵，还说，这件事，只有让我去，因为我是茶陵县委书记，名正言顺，可以当向导，带着部队攻茶陵，或者佯攻茶陵，转回永新来；并再三叮嘱我，湘南是去不得的，敌人太强大，去了必然失败。7月17日，我拿着毛泽东同志的信，带着县游击大队，即从永新出发。一天一夜，我们不停脚地由江西的永新城经宁冈城到湖南酃县城，越两省三县，跑了130多里。这时，红军大队在酃县城附近。18日晚，我赶到县城，在一

个大庙里见到朱德、陈毅同志，他们正在开干部会，殿堂里挂着马灯，烟雾腾腾。我把毛泽东同志的信交给了他们，并口头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话，朱德同志让我去休息，他们接着开会，讨论毛泽东同志的信。第二天，部队出发往回走，当走到湘赣交界的沔渡时，二十九团的官兵硬是不过河，而且全撂了枪，声言不回湘南就不干了，逼迫红军大队回头向湘南进军。经过再三说服动员，就是不听，在此情况下，二十八团也被迫跟着南下。我见此情景，就向陈毅同志讲，你们要南去，要报告毛党代表。我即同游击大队过河回宁冈砦市。

后来，红军大队与范石生部战于郴州，先胜后败，二十九团即自由行动，散回宜章家乡，结果一部分被土匪胡凤璋消灭，一部散落于乡村，也多被敌人捕捉杀害了。这一次错误行动使红军遭受了严重损失。

在永新，红军三十一团与敌周旋，终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最后只好退出战斗。边界各县的县城及平原地区皆被敌人占领，只有各县山区仍掌握在工农手中。根据地被杀之人，被焚之屋，不计其数。边界割据区域较全盛时期面积缩小了2/3，只有2400余平方公里，人口减少十之八九，只有76000余人。这次反“会剿”斗争失败，即史称的“八月失败”。

1958年，毛泽东同志在杭州时，我同谭震林同志去看他，谈起井冈山斗争的一些事，当说到“八月失败”时，毛泽东同志说，“八月失败”怪不得陈老总，他事先有报告，事后有检查，主要责任在湖南省委，军队内部主要是龚楚，还有些人附和他，结果导致了“八月失败”。

住进红光医院

我由酃县回来不久，即病倒了，打摆子，发高烧。其时，正值敌人攻打黄洋界，我离开游击大队，打埋伏住在永新西区山上一农户家的草棚里。房东老太太对我很热情，一天，她给我煮了一只鸭吃，那时我确实病得厉害，胃口也不好，吃了几口鸭子，接连反胃，吐了一天，自此吃伤以后，至今见到鸭子菜就不想吃。

“八月失败”后，朱德、陈毅率二十八团到了桂东沙田。毛泽东同志听到在郴州失利的消息后，立即率领三十一团三营去桂东迎大队回归。9月间，朱德同志率领部队由湘南回来，进驻宁冈砦市。他知道茶陵县委在离宁冈不远的浆山有一小块根据地，我就住在那里。有一次开会，他见我未到，就问起来，有人说我病了，住在群众家里打埋伏。朱德同志马上说，快派担架接他来。县委的刘汝明同志即陪送着把我抬上了井冈山。刘是个大个子，至今我还记得他的样子。一直等我病好，到了茨坪，他才回茶陵。

我到山上后，住进了红光医院中医部。原来，毛泽东同志带领工农革命军到茅坪后，成立了一个医务所，后来在大井又设立了医务所。随着红军不断扩大，战斗频繁，伤病员逐渐增多，1928年5、6月间，毛泽东同志决定扩大医务所成立了红光医院。医院筹建时，动员大家捐献，我也捐了2角小洋。医院分几部分，分设在大井、中井、小井几个村子里。院部在中井，门口有用纸写的“红光医院”的牌子；外科在小井、内科和中医部设在大井的一个破庙里，伤病员分

散住在老百姓家里。我每天吃中药，休养了两个多月，病愈出院。

山上设有后方留守处，红光医院归后方留守处领导。留守处设在大井，主任是邓允庭，资兴人。红光医院是一姓刘的同志负责筹建的，他原是浏阳工会委员长。医院院长曹铤，党代表肖光球，还有铁玉，作党的工作。肖是我在三师的同学，郴州人，他爱人名刘涵秋，是衡阳女三师的，我同他们都很熟悉。有一外科医生名段执中，云南人，抽烟用一大竹筒子，听说他现还在。后方留守处还管军械处、农业处、被服厂、造币厂，红军家属也归留守处管。湘南农军来的家属组织起来种粮、种菜、养猪。伙食单位也是由留守处管的，每人每天2分伙食钱。造币厂设在茨坪，铸造银元，由王佐保护。在茨坪还有一石印机，由一姓刘的大个子负责，红军的文件、布告、宣传品都是石印。在那时，有这样的印刷条件就算不错了。

10月底，我还住大井医院时，毛泽东同志来看我，他看到我的病已好多了，很高兴，嘱咐我好好休养，并关切地对我说，你出院后，就不要回县委了，到前委工作吧。后来，我从医院出来即直接到了茨坪，任前委秘书，跟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

我在茶陵县委工作总共不满5个月，主要是了解情况，发动群众，派出工作人员等，作一些开辟工作；打土豪，筹款项也还没来得及做。“八月失败”后，前时永新、宁冈农民分得的土地，还没得到一点实惠，地主回来又夺走了，结果是农民分田，地主割禾，空忙一场。后来，因病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我病后，谭思聪同志任茶陵县委书记。

柏露会议前后

我到前委工作不久，1928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同志率平江起义的红五军5个大队近五六百人到达井冈山新城、茅坪等地区。12月11日，在宁冈新城举行了红四军、红五军胜利会师庆祝大会。红四军、红五军会师后，井冈山根据地的革命声势更加浩大。

1929年1月，“六大”文件传到井冈山，是党中央由上海经吉安特委的交通送来的。我和宋任穷同志，还有刘、俞两同志一起把密写的文件边显影边抄下来，然后印成小册子，分发给连队和各县委传达。

1928年冬天，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屡次“会剿”失败，又调动湘赣两省敌军25个团约2万余人，以湘军何健为总指挥、赣军金汉鼎为副总指挥，分兵5路，扑向井冈山。这时，井冈山除面临湘赣敌军大兵压境的严重局势外，还存在着极大的经济困难。在敌人的严密经济封锁下，作战物资和军民日常吃穿用品的必要供应都极为困难，时届寒冬，红军官兵仍着单衣，日食红米南瓜。在这样严峻形势下，1929年1月4日，毛泽东同志在宁冈柏露村主持召开了前委、红四军、红五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边界各县委联席会议，红四军、红五军团以上干部也参加了会议。到会者共60余人。会议传达了中共“六大”决议，讨论了当前敌我形势和如何粉碎敌人的第三次“会剿”。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有的主张凭借有利地形，全力据险死守，就地退敌，以免敌人攻进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遭受摧残；有的则强调敌人力量强

大，红军又面临经济给养困难，主张红军全部转移；在主张放弃井冈山根据地的意见中，有的主张到湘鄂赣，有的主张到湘南，有的主张到赣南。毛泽东同志分析了各种意见，提出：井冈山根据地一定要守，不能轻易放弃，但也不能死守，必须采取积极行动，以一部分红军守山，坚持内线防御，大部分红军主力出击，钻敌人的空子，迂回敌后，到外围作战，使敌人穷于应付，并求得在外线寻机消灭敌人，打破敌人的“会剿”，即所谓实行“围魏救赵”的计划，以解井冈山之危。会议经过热烈讨论，与会者多数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决定：红五军的5个大队编入红四军为三十团，彭德怀任红四军副军长兼三十团团长，滕代远任红四军副党代表兼三十团党代表，统一指挥三十团和袁文才、王佐部的三十二团防御井冈山；红四军主力，包括二十八团、三十一团、特务营、独立营以及前委和红四军军部，由毛泽东、朱德同志率领下山出击，到敌人后方去打，迫使敌人撤退。会上经过分析认为湘鄂赣距大城市较近，且地区狭小，敌人运动方便，而我不宜回旋；湘南敌人兵力强大，群众斗争基础尚未恢复，故此两地皆不宜前去。会议还决定，为了加强留守井冈山根据地的工作和守山部队的领导，将熟悉井冈山情况又有丰富斗争经验的何长工、张子清、陈毅安、徐彦刚、陈伯钧、游雪程、李克如等同志留下担任部队和地方的领导工作；并鉴于边界土客籍矛盾，决定调袁文才同志任红四军参谋处长，宁冈县委书记刘辉霄任前委秘书长，三十二团党代表何长工兼任宁冈县委书记。会议共进行了4天。会后，毛泽东同志代表前委给中央写了报告，此次会议即史称的“柏露会议”。

柏露会议后，彭德怀经与滕代远磋商，又召集红五军军

委会议，研究守山问题，会上有人提出，红五军是到井冈山取联络的，任务已经完成，应立即回湘鄂赣边区；也有人发牢骚，说守山如何危险，为何红四军不守山等等。彭德怀、滕代远同志以大局为重，照顾全体利益，说服了想返回湘鄂赣边区的同志，坚决挑起防守井冈山的重担。

红四军主力下山之前，对井冈山的5大哨口，红光医院中的伤病员，山上的粮食给养等等都作了必要的准备和安排。为了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和各项政策，宣传红军的宗旨、任务、纪律，在出发之前，准备好《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和《共产党宣言》。《布告》是四言体，由陈毅同志和前委、军部的几个人集体拟作，经毛泽东同志亲自修改，以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署名发布的。《布告》用通俗、形象的语言宣讲了：“红军宗旨，民权革命”，“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统一中华”；讲了党的一系列政策：“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对工人，“增加工钱”，“八时工作”；保护城市商人，实行“累进税法”、“苛捐杂税，扫除干净”；对敌人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还宣讲了工农群众受反动政府、国民党、土豪劣绅的压迫之苦和帝国主义侵略的罪恶，号召“全国工农，风发雷奋，夺取政权”。《宣言》是以中共红四军党部署名，根据“六大”精神，宣布了十大政纲：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没收外国资本；统一中国；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田地，分给无田及少田的农民，等等，号召“工人们、农民们、士兵们、一切贫苦群众、一切受压迫的小资产阶级，快快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团结起来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国民党新军阀奋斗

啊！”1月14日，红四军主力部队三千三四百人，3200多支枪，在毛泽东、朱德同志率领下，由茨坪、小行洲出发，离开井冈山，向敌后出击。

大余城失败

红四军主力下山后，当日经遂川的大汾、左安，到上犹的营前。营前是一个大村镇，部队即在干河的大坝子上宿营。第二天，15日，继续前进，经崇义的长潭、铅厂，进占了大余县城。16日，部队休息。那时，红军尚未建立政治部，公开作政治工作的是“工农革命运动委员会”，委员会主任毛泽东，副主任谭震林，委员会下设科：组织科长彭祐，宣传科长毛泽覃，农运科长陈兢进，我是职工科长，青年科长万达才，妇女科长伍若兰，曾志、贺子珍也是妇女科的。部队在大余住下后，工农革命运动委员会即到附近地区开展群众工作，我曾去工厂做调查，找木工、店员开座谈会，了解情况，宣传党和红军的主张和各项政策。

红军一下山，赣敌独立师刘士毅、国民党军二十一旅李文彬部即尾追而来。1月21日，李文彬旅逼近大余，我军张威率独立营进入战地迎战。李文彬的二十一旅是朱培德的主力，官兵戴白帽子，二十八团曾同他们交过手。大余一仗，独立营营长张威阵亡，败退下来，跟着二十八团、三十一团都先后撤了下来，分散了。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身负重伤，在随后的行军中不幸牺牲。在敌人的尾追堵截下，部队被迫向赣南艰难转战，原来柏露会议确定的“围魏救赵”的目的没有达到，也不可能再回井冈山。

井冈山没有守住，1月29日，湘赣敌人攻上了山。彭德怀率部队200余人撤下山来，王佐的三十二团原是井冈山土生土长的部队，地形熟悉，分散隐蔽。

第三次反“会剿”，山上、山下都失败了，茨坪、大小五井都被敌人进占。有人说，当时红军下山是所谓“向赣南、闽西进军”，“开创新的根据地”。这个说法值得商榷。据我所知，柏露会议上并没有向赣南、闽西进军的打算，出击大余是打援的，大余失败后转战在赣南、闽西是被敌人所迫，边打边走，这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井冈山根据地已经经营一年多，各方面都有一定基础，又留下彭德怀率部守山，怎么能说不要井冈山根据地呢？那时，毛泽东同志曾对我和前委工作同志说过，井冈山是个好地方，比南京好得多，它周围800里，有草材、营前、大汾、黄坳、沔渡等10个城镇，有山有水，腾云驾雾，蒋介石的南京就没有我们井冈山大。蒋介石“占市为王”，我们“占山为王”。毛泽东同志这个话的寓意很明显，就是坚持武装割据，坚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总之，是由于在大余打了败仗，不能调动进犯之敌，从而井冈山根据地被敌进占。

井冈山根据地虽暂时被敌占了，但是，井冈山的光辉永存。它是我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创建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它的创建，是我党一个历史性的战略转移，使党的工作由城市转移到以农村为中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道路。在当时，对建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不是所有同志都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和它对中国革命的历史深远意义。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无产阶级革命史上，从巴黎公社到俄国十月革命，都是走组织城市工人武装起义，先占城市，后取农村的

革命道路。1924年，国共合作，第一次国内大革命也是走先占城市的革命道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内许多同志从惨痛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有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但是，在夺取政权的方式上，仍然是仿照别国的革命经验，夺取大城市。如南昌起义，决定起义军南下广东，先取潮州、汕头，以广东为根据地，再行北伐。湖南秋收起义，计划是先夺取长沙。广州起义，原来的意图是固守广州，进而夺取全省政权。党的城市工作，那时也是不顾大革命失败后的严峻形势，仍是多次号召举行罢工、暴动。总之，这些武装起义、暴动的指导思想都是以城市为中心，走先取城市后及农村的革命道路，结果都失败了。那时，国民党反动派控制着全国政权，依靠着国际帝国主义，掌握着强大的军队，占据着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敌我力量十分悬殊，走城市武装起义以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显然是不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的。中国革命向何处去？全党同志都在探索、实践。

在井冈山根据地创建过程中，也不是所有同志都认识一致。那时，井冈山被白色政权四面包围，敌人重兵不断“会剿”，物资匮乏，经济困难，军民生活十分艰苦，“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不少人思想里存在着疑虑，我思想上也是存在疑虑的。这个思想在跟随毛泽东同志革命的实践中逐步得到解决，逐步增强斗争信心。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毛泽东同志不仅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而且创造性地把开展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建设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三大任务结合起来，成为统一的整体。他创立了三级军事体制，在加强正规军队建设的同时，积极建立县游击队和区、乡赤卫队（暴动队），开始形成了“三结合”的“人民战争”战略思

想体系。他尤其重视党的建设，始终把它作为军队和根据地建设的中心环节。在军队中坚持党代表制度和“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营设总支部，团、师设党委，重大问题必须经过党委讨论决定。这就确定了党指挥枪的原则，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井冈山斗争胜利的最宝贵的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开端，为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取得全国政权的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开创了中国式的革命道路，并胜利地迈出了第一步。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伟大预见，早已实现。如果说，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是中国革命的第一个飞跃，我们现在则正处在中国革命的第二个飞跃之中。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神州十亿人民正沿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迈进！

转战赣南闽西

圳下遭敌袭击

大余战斗失败后，我和在前委工作的一部分同志走在一起，三十一团的炮兵连和团党代表蔡协民也同我们一起退下来。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兵败如山倒”的情景。晚上肖克同志带领二十八团二营和特务营的一部分、独立营的三三两两战士也来了。肖克问我，毛泽东、朱德同志在哪里？我说，不知道。毛泽东同志的勤务员吴光荣跟着我们退下来的，他也不知道毛泽东同志在哪里。在这里，我因无经验，还闹了一个笑话：当时，天已昏黑，对面岭上黑乎乎的象有人影晃动，我问肖克，是不是敌人？肖克看了看说，你真是“草木皆兵”了。

在大余城时，前委会上曾确定，如有情况，到乌迳集合。于是第二天，我们这支队伍沿着粤边向广东南雄的乌迳前进。途中看到右前方有部队运动，便吹号联系，林彪率二十八团一营来了，即由他统一指挥部队，继续向乌迳村前进。时近黄昏，三十一团和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等也都来了，遂决定在这里宿营。

乌迳有地方党支部，当晚近12时，我还没有睡，他们来

人报告，敌人追了上来。其时，毛泽东同志已睡，我即喊他快起来。他要我去报告朱德同志，并把参谋长朱云卿同志找来，命令朱拿一部分枪给地方，请他们骚扰敌人。毛泽东同志是一贯关心地方武装建设的，无论到了哪里，只要有地方党，他总要从部队中拿些枪留给他们，帮助他们建立和扩大地方武装力量。他常对我们说，敌人有白军、县保安团和地主武装靖卫团，我们也要有三支武装职能不同的力量：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赤卫队，分别对付敌人，互相配合作战，这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拂晓前，部队即离开乌迳，向赣南的“三南”（全南、龙南、定南）地区前进。“三南”地区的地主武装力量强大而野蛮，不断向我们袭击，部队行军极为困难。为了及早和顺利地通过这个地区，决定以营为单位阻击敌人，节节掩护大队兼程向寻乌前进。

寻乌有党的县委和少数武装，县委书记古柏。部队在寻乌的圳下村宿营。第二天拂晓，三十一团为前卫，已经整装向项山出发，中间是毕占云的特务营，也已撤哨，林彪率二十八团担任后卫。那时，我和谭震林同志正在吃糯米酒酿，毛泽东、朱德同志还未起床，忽听到霹雳叭啦声，这时正逢阴历年底，原以为是村里放鞭炮，再仔细一听，不对了，枪炮声一阵紧似一阵，尾追的赣敌刘士毅部赶来，向我袭击。特务营的哨兵一撤，敌人从中间将部队插断，已冲到前门外几十米的地方，情况十分危急。我和谭震林同志赶紧叫警卫员去通知毛泽东同志，他们趁黎明前的朦胧时分，在杨梅生手枪班的掩护下，从后门突围出去。我和陈毅、谭震林从前门突围，在战斗中，毛泽覃同志负伤，伍若兰同志被俘，后被敌人押到赣州杀害了。

部队撤出圳下村后，敌仍紧追不舍。特务营摆开阵势，进行了反击，三十一团也回转头来，加入了战斗，始把敌人打退，我们也撤出了战斗。这时，还未见毛泽东、朱德同志到来。蔡协民同志问我，军长、党代表呢？我说，不知道，陈毅同志、谭震林同志也说不知道。原来的命令是出发到项山宿营的，于是大家说，那就到项山等吧。快到项山时，看到左边山路上有队伍，又看到有红旗飘动，即派人去联络，他们也看到了我们，也派人过来，知道是二十八团，即会合在一起，到达项山的罗福嶂宿营。

2月1日，前委在罗福嶂举行了会议，总结下山后几次战斗的经验教训，研究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毛泽东同志对形势作了分析，提出向寻乌、瑞金、兴国方向行动，那里有党组织，有游击队，有红军活动，创建了游击地区。会上，根据前几次战斗失散的经验教训，决定改变部队建制，将部队改编为三个纵队，原二十八团编为第一纵队，党代表陈毅（或熊寿祺）；特务营、军直属队编为第二纵队，党代表彭祐；三十一团编为第三纵队，党代表蔡协民。朱德同志改名王介，随第一、第二纵队活动，毛泽东同志随第三纵队活动，我和谭震林同志也跟随第三纵队。各纵队分散活动，采取灵活机动战术，活动地区不离开江西南部。会议刚结束，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同志前来通报，敌军正向罗福嶂包围。于是，在天未亮，红军即离开罗福嶂，冒着风雪严寒，沿着江西会昌和福建武平边界的崎岖冰封的山路，向瑞金前进。这时，三个纵队共有3000多人，仍是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地主豪绅纷纷传说，“井冈山的朱毛大股土匪下来了”，真是谈虎色变。由此，红军开始了有意识的向赣南进军。

激战大柏地

在向瑞金前进途中，路过一个叫银坑的地方，有一条小河拦住北上的道路。这时，敌人又追了上来。河上有一条木桥，但桥面狭窄，部队挤在一起，通行很缓慢。朱德同志看到这种情况，很是着急，跳下马来，亲自指挥部队从速过河。有一段河水不深，有的部队即步行淌过河去。毛泽东同志看到朱老总着急了，赶忙对我们前委的工作同志说，别说话，快过河！这样，各部队有秩序地顺利过河，将敌人甩在了后面。

到瑞金城外，部队停下来，瑞金守敌已闻风逃跑。宋裕和同志带着宣传队进城，张贴标语。我和谭震林同志正准备做饭时，烧了开水，米尚未下锅，敌人又打来了。饭也顾不上做了，跟着部队就跑，到大柏地才停下来。大柏地是一个山区村镇，在瑞金北部，距县城约60里。我记得，这一天是2月9日，正是农历除夕。敌人也未来骚扰，当夜即在大柏地宿营。第二天清晨，朱德同志命令部队继续前进。这时，担任前卫的三十一团三营不走了。那时，部队内的民主还是相当大的，三营的士兵委员会到各处联系，坚决表示不能让敌人赶着跑了，要走，你们走，三营是决心不走了，在这里拚一死战，打垮尾追的敌人。前卫部队不走，其他部队也无法行进。三营党代表罗荣桓同志、营长陈明同志见此情景，即向毛泽东、朱德同志报告。前委紧急研究，认为，自离开井冈山以来，近一个月时间，连续行军2000多里，沿途屡遭敌军拦截袭击，始终未能摆脱被敌尾追的局面。大柏地一带

是一南北走向的峡谷，长约10余华里，两边高山耸立，林木丛生，地形险要，是一理想的伏击阵地。尾追的敌军刘士毅部是被我军打败过的弱军，在圳下袭击我军时，我军突围，避开战斗，敌以为我军软弱，衔尾穷追，趾高气扬，因此，正好利用大柏地有利地形，歼灭该部，扭转当前的被动局面。于是，当即作了战斗部署。当日下午2时许，敌一个团与我前哨接触，打响战斗。这一仗打得很激烈，我军直打得弹尽援绝，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浴血奋战，毛泽东同志也亲自带着警卫排向敌人冲锋，排长负伤。直打到第二日下午，战斗胜利结束，俘敌正副团长以下800余人，缴枪数百支，敌残部仓皇退回赣州。大柏地战斗的胜利，有巨大的意义和影响，红四军下井冈山后，由此摆脱了被敌尾追的局面，给赣西南革命群众和红色游击队以极大的鼓舞。陈毅同志当年向中央的报告称这一仗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毛泽东同志在1933年夏再次经大柏地时，写下了《菩萨蛮·大柏地》一词，缅怀此次英勇壮烈的战士，表达了胜利的欢乐心情。

大柏地的战斗中，二十八团二营党代表胡世俭同志英勇牺牲，他是衡阳第三师范二十四班的同学，上井冈山前，曾任郴州县委书记，我永远怀念他。

当夜，仍在大柏地宿营，虽然是打了胜仗，但吃饭却成了问题。开战之前，老百姓都跑光了，部队要吃饭，哪里去弄粮食？我们住在一个雇工家里，屋里有两箩筐谷子，但主人又不在。红军是有纪律的，不能私自拿群众的东西。怎么办？我去请示毛泽东同志，他反问我，饭总是要吃的，你说怎么办？我说，只好先把这担谷子吃了，给主人留个条子，将来归还。毛泽东同志连说，这个办法好，立即通知各部队

照此办理，吃了房东的粮食，留条子，出布告，以后赔偿。战士们打了胜仗，又有饱饭吃，都很高兴，事务长也不再为没粮发愁，都说党代表作了好事，朱德同志说，这是逼上梁山，没得别的办法。后来，我们再回大柏地时，由军需处按条子赔还现洋，老百姓很高兴，政治影响很大。

在大柏地住了两晚，清理焚烧了一部分文件、坏枪，乘胜向长胜、宁都出发。由于这次战斗缴获许多枪枝弹药，所以动员红军全体干部战士，凡是能背枪的都背上枪，有的战士一人背两支，毛泽东同志也背着一支大枪同战士们走在一起。从这件事，也可看出，当时战斗环境之艰苦，红军最高指挥员也无例外地背着大枪行军，而这也恰恰体现了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完全新型的军队，它与军阀雇佣军队不同，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官兵平等。红军之所以有力量，在强大的敌人白色包围之中仍能存在和发展，重要原因之一，也正在于军队内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发扬。

长胜守敌慑于我军在大柏地胜利之声威，不战而逃。国民党十四军军长赖世璜的弟弟赖世琮带一工兵团守宁都，闻讯亦弃城逃窜，回长胜以东的石城老家去了。

2月13日，部队进入宁都县城。在宁都休息3天，打土豪，筹军饷。当时，部队筹粮筹款主要即靠打土豪。这时，我带领着前委的警卫排去打土豪。我还是第一次打土豪。到宁都城已是傍晚，没有调查，也不知哪家是土豪。我到了离城西15里地的一个村子，看到一座青砖瓦房，就向附近的老百姓调查，他说，这一家人全跑了，他们家雇人种地、烧饭，生活比一般人家好。我进去一看，家里有粮有猪有鸡。我想，家中既然雇有长工，又出租土地，是个地主，先把粮、猪拉走，解决部队吃饭。这时期，在毛泽东同志的教导

下，部队已有一定的政策观念，知道应分清地主和富农的界限，打土豪，不能错打了富农，更不能挫伤了中农。

在宁都地方党组织的帮助下，部队筹得5000余银元军饷，几百匹棉布，数千双鞋袜等等。全军上下每人发了4角小洋，穿上了新草鞋，粮袋子也装满了，大家高兴得很。还听说，吉安的东西固有我党领导的游击队和革命根据地。于是，部队即向西北方向，经龙岗，向东固前进。

东固会师

红四军大队行进到龙岗时，前委让我留下来，侦察后面有无追敌以及周围的敌情，大队仍继续向东固前进。龙岗离东固有半天路程，我在这里停了一天，探听清楚后面没有追兵，即赶去东固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毛泽东同志向我讲了昨晚在东固同独立红二团、红四团会师的情况。他说，东固地区在大革命时期即建立了党的组织，群众运动有较好基础，大革命失败后，党领导了武装暴动，建立了游击队，发展成如今的红二、四团，这个地区已成为赣西南地区的军事根据地。由于东固离井冈山较远，所以过去我们不清楚这里的情况。毛泽东同志还说，我们的伤员已安顿好，在地方党组织的帮助下，分别住进山中老百姓家里。

2月22日，在东固举行了红四军与独立红二团、红四团盛大的会师大会，毛泽东、朱德同志都在会上讲了话，气氛异常热烈兴奋。在东固，红四军一直受到地方党和群众的亲切欢迎。部队在这里休整了几天，原在罗福嶂会议上决定的整编方案，因当时敌人进逼，未能实施，在这里开始着手进

行改编，将团的建制改为纵队，营改为支队，连改为大队，排改为中队。这时，敌二十一旅李文彬部正向东固进逼，驻吉安之敌金汉鼎部也拟向东固进击。于是，前委决定采取打圈子的游击政策，以对付敌人的跟踪追击；并决定留下毛泽覃等一批干部，加强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党和军队的领导力量，并赠送给红二、四团一部分枪枝。红四军于2月25日离开东固，先北上折东再转东南，经吉水白沙、永丰藤田、乐安招携、宁都东韶，进到广昌、石城，然后南下瑞金壬田。

在东固时，我们还不知道井冈山失守的情况，到处找报纸，但也没有得到有关消息。由广昌到石城的路上，曾发现有一支部队跟在我们后面，后来又转去于都方向，也不知是什么部队。此后，我们看到村镇的墙上有署名红五军写的宣传标语，又听老百姓说，这个部队很好，打土豪，给穷人分谷子、分钱物。这时，我们才知道井冈山失守了，红五军也下了山。我们曾想同他们联系，但一时也不知他们在哪里。原在罗福嶂会议时计议救援井冈山之事，只好放弃。自此开始在赣闽粤交界处游击。

东固整编时，有一个小故事。当时，部队中有一些女同志，林彪嫌女同志累赘、麻烦，不愿意女同志留在部队，他宣扬女同志都要清除出红军，如果谁不退出，即抓来枪毙。当时，林彪是二十八团团团长，新编的第一纵队司令员，是有一些权威的，而且也还有些同志同意林彪的意见。女同志听到这个话，都很害怕，不少人不敢同部队一起行进，绕路远远跟在部队后面。对于贺子珍、曾志等在工农革命委员会妇女科工作的女同志，林彪是不敢动的，所以，所谓“枪毙”只不过是说说而已。部队中还有不少人支持女同志的，帮她们说话，给她们鼓励，要她们壮大胆子，不要怕。最终，精

筒女同志的意见也就不了了之。这虽然是当时整编时的一个小插曲，但也反映了红军的战斗生活很艰苦、很紧张，对女同志来讲，确有许多具体困难；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红军这样一支革命队伍中，还是有旧军队的影响，存在着军阀主义和封建的大男子主义等等。

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至今永记不忘。我们离开东固，经过永丰藤田，即往东插，沿山区走了3天，到了广昌、石城交界的白沙镇。这天晚上，毛泽东同志听说，有一猪贩子从石城赶着十几头猪到广昌，被三十一团军需处截留下来，给部队宰杀吃了。他立即派人把三十一团军需处长杨立三同志找来，问明了情况，严厉批评说：“哪里是革命军队，简直是绿林，这样的军队还能打胜仗？还能战胜敌人？”并且让连夜出布告，四处张贴，公开检讨错误，赔偿猪款。这次毛泽东同志真是气愤极了，还接连说要撤杨立三同志的职。我们在一边都不敢说话，朱德同志忙讲情说，“猪已经吃了，就算了。”毛泽东同志一听这个话，很严肃地说，“哪有这样的事，吃了还能就算了？这么大方！”从我在前委工作的实际接触中，毛泽东同志一贯注意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关心人民群众利益，强调严格遵守纪律，他亲自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和建军原则，并且始终把军纪问题作为红军的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来抓。对破坏军纪的问题，他一贯主张从严处理。对上述一类的具体事件，他从不轻易放过，总是及时抓住，用来教育干部，教育部队。正是在毛泽东同志的培育下，红军真正成为一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成为彻底为人民利益服务的革命军队。

挺进闽西

1929年3、4月间，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抽调了湘粤赣3省军队到武汉地区与桂系军阀打仗，闽赣境内只剩下一些地方小军阀。这时，我们游击至瑞金壬田，正欲东向福建长汀。在到壬田之前，路过石城时，三十一团一部围城掩护大队行进，三营营长陈明同志不幸牺牲，由张宗逊同志接替三十一团三营营长。3月11日夜，部队从瑞金壬田出发，急行军翻越闽赣交界的木杉岭，沿武夷山南麓的闽沟前进，由长汀县的楼子坝进入闽西地区，并继续东进，至县城西南的一个小山镇四都，12日即在这里宿营。这是红四军首次入闽。

长汀县为旧汀州府治，是闽西边境重镇，盘据汀州的是土著军阀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郭凤鸣部。红四军入闽前，闽西武平、龙岩、永定、上杭等县部分地区，在我党领导下，发动群众，抗捐抗税，打土豪，分田地，革命形势很好。长汀县委得知红四军进入闽西，即派县委负责人段奋夫和张大鹏同志（永定人）前来联系。毛泽东同志即召开会议，听取县委两同志的汇报。他们讲了地方党组织的情况，介绍了郭凤鸣部的情况。他们说，郭部士气低沉，民怨沸腾，我党在郭部有秘密的党组织活动；并说，郭凤鸣已亲自带领两个团在长岭寨堵截。长岭寨在长汀城南15华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是长汀县城南面的重要屏障，也是进攻长汀城的必经之路。毛泽东同志听汇报后，认为当前正是消灭郭部的太好时机，决定进攻长岭寨，彻底消灭郭凤鸣。会是

在一个小楼上开的，我下楼时，一脚踏空，踩在柴堆上，把耳朵也压坏了。第二天，朱云卿参谋长布置队伍应战。敌机枪连里有我党党员，地方党组织对他们已有布置，我们一打，他们即掉转枪口，郭凤鸣部随即全线崩溃，四散败逃。郭在乱军中逃窜时被我军捉住。二十八团连长王良看到有几个背盒子枪的簇拥着一个人走来，看样子象是一个大官，就问其中一人，谁是郭凤鸣？该人不回答，王良立即一枪击毙了；又问一个人，仍不说，又枪毙了。这时，那个象大官样的人承认，他就是旅长郭凤鸣，王良边说，你就是郭凤鸣？边对郭又是一枪，当场把郭打死。毛泽东同志很快知道了这件事，他一直是坚决反对虐待、枪毙俘虏的，这次接连打死了几个人，气愤得很，把王良狠狠地批评了一顿。王良同志打仗是勇敢的，他同陈伯钧、寻淮洲等同志都是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参加秋收起义上井冈山的，都是有名的青年知识分子连长。后来，王良曾任红四军军长。

3月14日，红四军浩浩荡荡，押着1000多名俘虏，进驻汀州城。进城时，毛泽东同志让我用两元银洋雇请了两名伙子，抬着郭凤鸣的尸体。我问，抬尸体有啥用？毛泽东同志说，你不懂，这个意义可大了，这就叫示众么！这事果真轰动了全城，人们奔走相告，纷纷涌去河滩上观看，莫不兴高采烈。第二天，召开了群众大会，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发表讲话，宣讲了红四军的宗旨，宣布了郭凤鸣的十大罪状，号召工农群众团结起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工农革命政权，实行土地革命。会后，当场将郭凤鸣的大批粮食衣物分发给到会的工农贫民群众。

毛泽东同志极为重视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在井冈山斗争时，即把建立工农革命政权作为党和红军的第一项重要任

务。我们在长汀半个多月，主要工作即是发动群众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毛泽东同志亲自带领前委的工作同志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在长汀县委的协助下，邀请社会阅历丰富、具有代表性的老裁缝、老佃农、教书先生、钱粮师爷、老衙役等人座谈。通过细致的调查研究，对长汀的政治、经济状况和社会民情风俗有了切实地了解，为制定正确的政策和行动方针提供了可靠的根据。我们会同地方党的组织，派出大批宣传队，到城乡各地贴布告，写标语，宣传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和各项政策，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在此基础上，深入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帮助群众建立农会、工会。在3月下旬，召开了长汀县工农兵各界代表会议，正式选举产生了长汀县革命委员会，丘潮保任主席，这是闽西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对闽西地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上杭、永定、龙岩各县革命群众纷纷起来斗争，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恢复、建立起工会、农会和苏维埃政权，扩大革命武装，袭击地主民团，开展土地革命，闽西地区的革命斗争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3月20日，在汀州召开了前委会，对红四军离开井冈山以来的工作进行了总结，毛泽东同志分析了闽赣两省的政治、军事、经济状况和自然条件，特别是详细分析了赣南、闽西一带党的组织、群众运动、革命武装情况和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会议进行了深入讨论，决定利用军阀混战之机，在赣南、闽西20余县范围内，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红色政权，创建闽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新的革命根据地；还决定，相机与湘赣边界取得联系，恢复井冈山地区的工农武装割据。会后，即以前委名义将上述行动方

针，报告了中央。

在此期间，毛泽东同志还以前委的名义给赣南特委写了一封复信，由秘密交通送给特委书记杨柳青同志。信中主要讲了土地革命的一些政策问题。当时，一些地方在分田中，执行“左”的政策，没收一切土地，地主、富农都不分给田地，或者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毛泽东同志不同意这种作法，他一贯主张对富农只是没收其封建土地剥削部分，对地主也应当分给他们同样一份土地，以使他们能够生活下去，并从劳动中得到改造。

原在东固决定的将团改为纵队建制，由于连续作战，终未能改变，在长汀才完成了编制系统的正式改编；为了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和便于游击行动，开展群众工作，并决定成立了红四军政治部。毛泽东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谭震林任副主任，我任秘书长。全军编为3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党代表陈毅；第二纵队司令员胡少海，党代表彭祐；第三纵队司令员伍中豪，党代表蔡协民。在汀州筹了军饷，全军新制作了灰色新军衣，红领章，红五星，还发了新鞋子，衣履标志焕然一新，军容愈加整齐威武。辎重队也有了10几个挑夫，担着子弹箱。全军还检查了身体，种了牛痘。这时，红四军比下井冈山时还壮大了些。3月21日，根据前委会议精神，全军立即进行短距离分兵，分3路在汀州城附近和新桥、河田、古城、四都等地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建立红色政权的工作。

从1月红四军下井冈山，两个月来，转战赣南、闽西，虽然未能达到“围魏救赵”以解井冈山之围的预期目的，但是却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克服了严重的经济困难。湘赣敌军虽然进占了井冈山，但是并没有达到消灭红四军这一主

要目的。特别是红四军接连在大柏地、长岭寨两战，先后击溃了刘士毅师和郭凤鸣旅，取得巨大胜利，从而迅速开创了赣南、闽西两地区工农武装割据斗争新局面，并且极大地促进了闽赣两省及邻近省份革命形势的发展。前委在汀州向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提出：“惟闽西赣南一区内之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这一计划是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这就说明，创建根据地的思想已经牢固地树立起来了。

红四、五军会师

正当我军在长汀活动期间，蒋桂军阀争夺两湖地盘的斗争更为激化，蒋介石集中在江西的部队于九江一带与桂军逼近，大战即将爆发。这时，前委鉴于赣南一带反动驻军大部调离，决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回师赣南，开展游击战争，扩大和巩固赣南红色区域，建立红色政权，开展土地革命。恰好于3月底接到彭德怀同志来信，说他们已到瑞金，当即回信给他们，让其在瑞金等候。4月4日，在毛泽东、朱德同志率领下，红四军到了瑞金，与彭军会合。

第二日，在瑞金召开了前委会议，彭德怀同志汇报了守卫井冈山战斗和突围的情况。彭讲到：红四军主力撤出井冈山后，二路敌军尾追主力南下，另三路敌军气势汹汹地向井冈山扑来，敌军以山炮、迫击炮、机关枪强大火力向井冈山根据地各哨口要隘大举猛攻。我军凭险坚守，艰苦奋斗，但终因敌众我寡，兵力十分悬殊，被敌攻入大小五井。为避免全军覆灭，决定突围撤下山来。在撤退过程中，住在红光医

院中的伤残病员和留在后方的妇女、儿童等被敌隔断，未能救出，大部分被敌人残酷杀害，有的还被押到赣州枪杀，情况极为凄惨。原三十一团团团长张子清同志，曾任唐生智部的参谋长，参加红军后，深为大家敬爱，红四军主力下山时，他因腿被机枪子弹打断，住在医院里，这次也被敌人在赣州残杀。与会同志听到这些情况，悲痛地流下泪来。

4月6日或7日，部队开至于都。前委在这里继续开会。我因病，没有列席会议。听说，于都会议主要是分析了当前的军事、政治形势，讨论了红军的行动计划。会议分析了蒋桂军阀战争的形势，认为蒋介石已控制了国民党中央政权，控制了江浙财团和广东、北方一部分财团，控制了东南数省的地盘，这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富庶地区。这样，蒋介石将国家的内政外交集权于己身，他既可利用国家政府名义办外交，借外债，又可利用中央的名义“讨伐”其他军阀，分化、收买，各个击破。正因为如此，蒋介石不同于其他军阀，必将战胜其他军阀。当前，在福建方面，敌人力量暂时不会有大的变化；在江西方面，蒋介石集中在江西的部队参加对桂系的战争，从而可能减轻对我军的压力。因此，我军应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在赣南进行短距离分兵，开辟、扩大革命根据地，并同意由彭德怀率部打回井冈山，会同湘赣边特委恢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会上还整编了队伍，除原第一、二、三纵队外，彭德怀同志带下山来的部队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彭德怀同志兼第四纵队司令员，滕代远同志兼第四纵队党代表；原留守井冈山的红四军第三十二团编为红四军第五纵队，徐彦刚为司令员，王佐为副司令员，何长工为党代表。根据彭德怀同志的要求，会议决定调一部分干部和枪枝给第四纵队。在调拨枪

枝时，林彪因为给彭德怀一部分坏枪，受到毛泽东同志的严厉批评。

会后，彭德怀即奉命率第四纵队回师西返，前委写了信由彭德怀带交湘赣特委，介绍了于都会议关于彭部回井冈山以及编队等情况。

在于都期间，有一事，至今我深刻记得，在于都会议之后，我病刚好，毛泽东同志出发去兴国的前一天傍晚，他同陈毅、谭震林和我在河边一起散步，毛泽东同志突然停下来问我们，鱼在水中是否也要睡觉？我们都答不出。他就此同我们谈起了生与死、静与动等矛盾统一的哲学问题。在我同毛泽东接触的时间里，这类事有过多，他常常在闲谈中联系眼前的一事一物，引申开来，谈起哲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记得后来我在延安时，艾思奇同志讲哲学大纲，我听不懂。一次毛泽东同志用下象棋的事例，同我们讲哲学，讲攻守战术等，我听得津津有味，也不觉得哲学深奥难懂了。那时，还有人说毛泽东是庸俗哲学。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是真正伟大的哲学家，他把哲学思想融会贯通到军事、政治等各个方面，指导中国革命斗争取得一个个巨大胜利。

袁文才、王佐被错杀

这里插笔说一下袁文才、王佐被错杀事。在乌迳突围中，袁文才和刘辉霄逃跑，回到井冈山。1930年2月，袁文才和王佐在永新被杀。他们被杀的详细情节，我不清楚，但从我在前委工作时的亲身接触和听到的一些情况，我认为，袁、王确实是被错杀了。回想起来，他们对井冈山革命根据

地的创建是有一定功劳的。在他们被错杀后，王佐的弟弟王云隆收容袁、王残部，又“反水”为匪，占据井冈山。从那时起，直到全国解放，红军游击队再也不能上山。应该说，这对湘赣边界武装割据和根据地建设是一个不应有的损失。

袁、王二人原来都是因为不堪豪绅压迫，从而各拉起一支队伍，打着“劫富济贫”的旗号，在井冈山一带占山为王，过着绿林生活。二人患难相共，结拜为兄弟。1926年，袁文才参加了共产党。同年9月，在党的领导下，袁率部队占领宁冈城，成立县人民委员会和农民自卫军。这就为以后建立井冈山根据地打下了一个基础。王佐的部队住在井冈山的茨坪，在改编前，是“兔子不吃窝边草”，对附近老百姓很好，有一定群众基础。

毛泽东同志率工农革命军到井冈山时，部队有近千人，因几经鏖战，长途跋涉，极为疲劳，且有不少伤员，又缺给养，生活也很困苦。为了工农革命军能在井冈山站住脚，毛泽东同志亲自给袁文才写信，又亲去同袁会见，耐心地向他讲明，工农革命军在罗霄山脉中段武装割据，创建革命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不是来占他的地盘，不缴他的枪，还要帮助他扩大部队，而且即时送他100条枪。袁文才解除了顾虑，帮助筹备粮款，解决给养，安置伤病员，又上山去做王佐的工作。毛泽东又派何长工同志上山作王佐的工作，并送他70条枪。在毛泽东同志团结扶助和真诚相待的感召下，取得了袁、王的信任，从而工农革命军得以在井冈山安了“家”。在团结改造袁、王部队的问题上，当时是有争论的，有的同志不愿意给袁、王部队枪枝，不愿意同他们合作。事实很明显，如果不给他们枪，不实行团结改造政策，就得不到他们的信任和支持，就会抵制工农革命军上山，那

将是部队没有落脚点，得不到休养生息，没有粮食给养，伤兵安置也不能解决，更不用说创建革命根据地了。我刚到茅坪时，毛泽东同志曾对我说过：“袁文才、王佐对革命是有帮助的。没有与袁文才、王佐的联合，我们是不容易进井冈山的，就是进去了，也站不住脚。”

1928年2月，袁、王两支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后改为红四军三十二团，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立了不少战功。王佐于1928年4月也参加了共产党，表现很好。他很尊重毛泽东同志，也很听毛的话，而且常常在部队里宣传毛泽东同志的主张，说毛委员怎么讲等等。在井冈山，毛泽东同志住在茨坪的时候最多，王佐的营部就在毛泽东同志住房的附近，前委开会，多半是在王佐的营部。

“六大”通过的《苏维埃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有“对土匪关系”的条文，说：土匪在武装起义后，应解除武装，并严厉镇压他们，土匪首领应当以反革命看待，完全歼除，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柏露会议传达“六大”文件时，毛泽东同志有意识地未传达这一条内容。会后，毛泽东同志召集红四军、红五军和湘赣特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小范围会议，原文传达了这一内容，并针对袁、王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讨论。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袁文才本来就是党员，王佐参加红军后，表现积极，在斗争中入了党，都不能按“六大”所谓的匪首处理。到会大部分同志表示赞同，决定不执行“六大”决议的这一精神。后来，袁文才在乌迳逃跑，原因之一是他听说了这个条文，产生了疑心。即使这样，袁文才并未投敌。王佐在第三次反“会剿”、彭德怀率部撤下井冈山后，仍埋伏在井冈山附近，坚持与敌作战。此后，袁、王一直率领部队在湘赣特委领导下进行武装斗争。

1930年2月，袁文才、王佐率部打垮了茶陵县地主武装挨户团，活捉团总罗克绍。就在这之前，1930年1月，中央巡视员彭清泉来湘赣特委后，在遂川圩田召集红五军军委和边界特委联席会议，推翻了柏露会议关于对袁文才、王佐不予以处置的决议，作了必须坚决解决袁、王的决定，以致发生了袁、王被害这一不应该有的悲痛事件。

赣南分兵游击

于都会议后，根据前委确定的方针和工作部署，于4月中旬，红四军以纵队为单位，分三路执行短距离分兵，活动范围扩展到于都、兴国、宁都、瑞金以及赣县、广昌的一部分地区。我同朱德、谭震林同志随军部、政治部活动，并带领着特务营，到了兴国和于都交界的银坑，打土豪，分田地，组织苏维埃。林彪带领第一纵队去了宁都方向的古龙岗、良村一带。毛泽东同志带领第三纵队到兴国县城。然后，各路又分开，各支队、大队分散活动，开展政治宣传，发动农民起义，打土豪，分田地，帮助各地发展地方武装，建立红色政权。毛泽东同志在于都、兴国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后，亲自起草了《兴国土地法》。这个土地法是在《井冈山土地法》的基础上修改制定的。它总结吸取了前一段土地革命的经验，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对《井冈山土地法》的一个重要修改，它表明了土地革命是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地主阶级，纠正了对于自耕农的土地不加区别一律没收的错误，承认了农民对原有小块土地的所有权。但是，由

于历史条件、革命经验等原因，这个土地法仍然没有改变土地国有化政策，规定没收的土地归“政府所有”，“禁止买卖”，农民分得的土地只有耕种权。毛泽东同志后来指出，这是一个错误，是由于当时缺乏土地斗争的经验而来的。

4月下旬，第一、二纵队向宁都进击，在地方党、游击队和农民群众的配合支援下，打下宁都城，消灭了守敌工兵团，活捉敌团长赖世琮。赖是赣南地区的大土豪，凶恶的地头蛇，当时原想用他换取一大笔赎金，以补充军需，一直押着他过了汀江。但是，在5月下旬，第一次打下龙岩城之后，我们住在永定县城，一天忽然风传国民党江西戴白帽子的李文彬部队来了。我们怀疑，怎么江西的部队跑到闽西来了？出城一看，根本没有这回事，纯系谣传。混乱之时，特务营警戒疏忽，赖世琮趁机逃跑了。

打下宁都后，我们又到了长胜、大柏地，打土豪，筹款子，在那里住了几天。前次路过这里时，曾吃了农民家的粮，我们又贴布告，收欠条，补偿了钱，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

从4月初到瑞金，至5月中旬，一个半月的时间，在赣南分兵所到之地，扫除地主武装，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斗争，建立起于都、兴国、宁都3个县的革命委员会和赤卫大队，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赣南红色区域。

在这里叙述一下关于“中央二月来信”一事的回忆。有材料讲，红四军前委于4月3日在瑞金收到“中央二月来信”，4月5日，前委即给中央写了回信。《毛泽东选集》一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也提到4月5日前委给中央的信。但是，我再三回忆，记得在瑞金召开的前委会议上，只是听取了彭德怀同志的汇报，大家为井冈山一些同志

的牺牲都很悲伤，会议也就再没开下去。后来，到于都后又继续开会。因此，在我的印象里，怎么也记不起在瑞金前委会议上有讨论“中央二月来信”一事。那时，除我一直跟随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外，还有谭震林、张大鹏等同志。我们下井冈山时，刘辉霄是前委秘书长，在大余城失败撤退到乌迳时，他同袁文才、谢辉一起逃跑了。此后，前委即再未任命过秘书长。刘辉霄原来经管的工作，如前委开会做记录，与地方党的联系等事都由我负责。3月，打下汀州后，成立了政治部，我任政治部秘书长，有关前委会议的一切事务性工作仍由我负责办理。所以，如果在瑞金前委会议上讨论过“中央二月来信”的话，我应该会有印象的。而且在瑞金停留的时间很短，全军即去了于都，我也不记得在瑞金有毛泽东同志给中央写信一事。前委给中央的信长达5000余字，从3日收到来信，5日写出回信，在这短短的二、三日里，又有与彭德怀部会合，听取汇报这样的大事件，似乎也无时间写此长信。于都会议上是否讨论过“中央二月来信”的事，我因病未列席会议，不知道会议详情。但是，在于都期间，我未听到过也未见到过前委给中央的复信。我再三回忆，有一件事印象很深，大体是6月初，红四军第二次打下龙岩城，在新泉休整之时，前委曾给中央写过一个报告，其中讲到官兵伏的人数、成份及其百分比，我和前委的几个工作人员数学程度都很低，算不出来，毛泽东同志看见我们有困难，说，你们没有办法，请陈毅同志来。最后还是陈毅同志帮助算出的。关于“中央二月来信”以及前委回信所谈及之事，我也是在新泉才知道的。当然，可能我记忆不准，但是为了提供研究这段历史时参考，把我关于这一段的回忆写在这里。

三下龙岩城

5月中旬，形势发生了变化。蒋桂军阀混战告一段落，粤桂军阀战争又起。盘踞在闽西的军阀陈国辉部参加了粤桂军阀的混战，闽西境内一时空虚。江西敌军则由于蒋桂战争结束，调头回防，集中力量进攻红军。为了避实就虚，前委决定“收网”，全部红军从分兵地区返回瑞金，5月19日，离开赣南，挥戈东向，二次入闽。20日，在福建濯田渡过了汀江。22日，进驻到新泉、蛟洋一带。新泉有温泉，终年水面上云气氤氲。我们住在小池，准备攻打龙岩。

龙岩是闽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盘踞在闽西一带的敌军是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陈国辉部。陈原是一土匪头目。这时，他奉蒋介石之命，率主力开赴潮汕，留驻龙岩的兵力不足五百。23日，红军攻进龙岩城，除补充营营长彭棠率残部逃出外，守敌全部被歼。为了诱敌归巢，扩大红色区域，当日下午，红军主动撤出县城，向永定出发。

永定是张鼎丞同志的老家。25日，在永定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消灭了地主团匪，攻占了永定城，随即成立了永定县革命委员会，张鼎丞同志任主席。

永定有个地方叫胡雷，村镇上多半是小洋房，很漂亮。我们是5月30日到胡雷，在这里举行了“五卅”纪念会，朱德同志讲了话。

在我们攻打龙岩的前一天黄昏，我们在龙岩城附近宿营，邓子恢同志来了。我同他是初次相见，前委的秘书和长汀县委来的两位同志也不认识他。他问住哪个房子？我问他

是哪里的？他只说是特委的，也没告诉我姓名。那时，我正为还没安排好前委的房子着急，所以蛮生硬地说，你等一等，党代表的房子还没找到哩。过后住了下来，我才知道他就是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同志。这件事，至今想起来，仍感惭愧，对不起他。虽然当时不相识，对地方同志总应该客气一些。后来，我们打龙岩、永定和在胡雷时，邓子恢同志一直同我们在一起。

我们住在胡雷时，张鼎丞同志也来了，还带着几十人的游击队。毛泽东同志和朱德、陈毅同志同张鼎丞、邓子恢同志见了面，谈了闽西的革命斗争情况。

这时，逃往永福的龙岩残敌彭崇又窜回龙岩城，于是，前委决定二打龙岩。6月3日，攻进龙岩城，守敌又逃往永福。当天，在龙岩城内召开万人大会，宣告成立龙岩县革命委员会，邓子恢同志任主席。

二克龙岩，扫清龙岩周围的反动民团之后，红军又很快主动撤离，转向上杭，攻下上杭的白砂，消灭郭凤鸣残部卢新铭团大部，敌人退缩上杭城里，凭险据守。我们从白砂到了旧县、新泉，在这里住下来，部队进行了休整。

陈国辉因老巢告急，匆匆从广东撤回闽西，亲率主力进了龙岩城。6月18日，我们从新泉到了小池，军委部署了三打龙岩的计划。19日凌晨，开始向龙岩进攻。毛泽东、谭震林以及前委的其他工作同志等几十人同张鼎丞同志的游击队一起行动，占领了一字山阵地。中午，我军攻入城内，枪声尚未停止，毛泽东同志即说，走，进城。张鼎丞同志说，还在打枪哩！他说，怕啥，走！这一仗，取得全歼守敌的重大胜利，陈国辉只身化装逃往南安，又当土匪去了。

在龙岩，毛泽东同志曾向龙岩中学学生讲过一次话，一

连讲了几个钟头，主要是讲了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和政策，还讲，他和蒋介石过去是朋友，现在蒋介石背叛了革命，投降帝国主义，成了敌人，所以要打倒他，等等。

红军三战三克龙岩的胜利，震动了闽西，解放了长汀、永定、龙岩三个县城，红色区域扩展到长汀、永定、龙岩、上杭、连城、武平 6 县，纵横 300 多里，开创了闽西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

从 1929 年 1 月红四军下井冈山以来，在半年时间里，转战赣南闽西，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相继建立起 10 多个县的红色政权，为建立中央革命根据地奠定了良好基础。

关于红军建设的一场争论

在胡雷开始了争论

1929年6月22日，在龙岩城召开了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围绕着要不要设立军委的问题发生了一场争论。其实，这场争论从永定县胡雷的前委会议上即开始，争到上杭县的白砂、连城县的新泉，又争到龙岩“七大”，分歧的由来更久，从井冈山朱毛红军会师以来，随着红军的扩大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对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的问题，在红四军党内以及主要领导者之间即有一些不同意见，并且在行动上也常有所表现。所以，“七大”的争论，实质上并非单纯为军委这一机构是否设立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对军队的领导，关系到红军建设的一系列原则问题。

为了说明争论的问题，先从争论的焦点军委问题说起。

1928年4月，朱德、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会师以后，朱德同志任红四军军长，毛泽东同志任党代表，并成立了中共红四军军事委员会，毛泽东同志任军委书记。5月20日，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同志任特委书记。红四军军委书记改由陈毅同志担任。6月4日，中央给红四军的指示信中指定由毛泽东、朱德等5人组

成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同志为前委书记，统辖红四军军委和湘赣边界特委。前委是红军游击活动期间的特殊组织，是共产党中央的代表机构，它的组织成员是由中央指定的，它统一领导和指挥红军及其游击地区、农村根据地的地方工作。

6月下旬，湖南省委派杨开明代理湘赣边界特委书记。11月初，根据中央的指定，前委提名报中央批准，宋乔生（工人）、毛科文（农民）、谭震林（湘赣边界特委书记）为前委委员。同月中旬，红四军“六大”选举了新的军事委员会，朱德同志接替陈毅同志担任军委书记，陈毅同志改任红四军士兵委员会秘书长。那时，红四军未建政治部，只有工农革命运动委员会，主任毛泽东，副主任谭震林，它实际上是政治部的前身。1929年1月，红四军下井冈山后，每日行军打仗，形势严峻，常要开会讨论军情和部队行动问题，这样，军委和前委机构就显得重叠，开了军委会又要开前委会，或者开了前委会还要开军委会，而又多是同样一些人，大家都感到“颇生麻烦”。为应付恶劣环境，减少领导层次，便于机断，在项山整编时，前委决定，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权力集中于前委。同年3月，打下汀州后，部队整编，取消了工农革命运动委员会，改建为红四军政治部。政治部从建立之始，即是在前委领导下的代表党的工作机关，除负责军内的政治工作外，如发动群众，扩大党的宣传，建立地方武装和苏维埃政权等工作，统由政治部负责，即所谓“前委指挥，政治部对外号召和联系”。

5月间，由于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扩大，军队和地方工作多了，前委既管军队工作，又管地方工作，感到兼顾不过来，为了便于领导，前委临时决定，组织军的最高党委，成立了红四军临时军委，由刘安恭任临时军委书记。刘安恭，

四川人，曾入云南讲武堂，后去苏联学习，1929年党中央派来红四军工作。他经常讲苏联黑暗面的话，令人反感。他刚由苏回国不久，不了解中国红军的发展历史和斗争情况，即主张搬用苏联红军的一些作法，并在他主持的一次军委会议上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这个决定限制了前委的领导权，使前委无法开展工作。显而易见，这个决定是错误的，是不利于革命斗争的，自然引起了许多同志的不满。这时，原来在井冈山时期即存在的关于红军建设问题又开始议论起来，一些不正确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也颇有表露。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同志利用战斗和行军的空隙，采取各种措施，作了不少工作，并多次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进行讨论。5月底，胡雷前委会议上对党的工作范围、支部工作等问题争论，意见未能统一。6月8日，在白砂又召开前委扩大会，继续讨论争论的问题。这次会议虽然以多数（41人参加会议，36票赞成，5票反对）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但争论的根本问题却仍未解决，而且这些分歧意见在党内以至在红军战士、军官中日益发展起来。

由于红四军党内对一些原则问题认识不尽一致，毛泽东同志认为前委不好工作。于是，他在白砂会议上提出了一份书面意见，列举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主要问题。书面意见有4条：（1）前委、军委成分权现象，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2）根本分歧在前委、军委。（3）反对党管一切（党管太多了，权太集中于前委），反对一切归支部（支部只是教育同志的机关），反对党员的个人自由受限制，要求党员有相当自由（一支枪也要问过党），这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发生动摇，成了根本上的问题——个人自由主义与无产阶级组织性纪律性斗争的问

题。(4) 对于决议案没有服从的诚意，讨论时不切实讨论，决议后又要反对，且归咎于个人，因此，前委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问题（同时成了全党的问题），完全做不起来。最后，毛泽东同志提出，他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他离开前委。

当天夜里，林彪给毛泽东同志送来一封急信，主要是表示不赞成毛泽东同志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我当即将此信送给了毛泽东同志，他看了一下，对我说，放在这里吧，没有别的事了，你休息去吧。回屋后，我一直不能入睡。第二天得知，毛泽东同志也一夜辗转未眠。这些天来，他常为解决争论、纠正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而焦急思虑。

白砂前委会议通过了撤销临时军委的决定，刘安恭的军委书记自然免职。但是，在前委之下要不要设立军委这一组织，军内及主要领导人之间仍有不同意见，尤其是刘安恭更是到处游说，坚持要成立军委的意见，事实上是主张“分权主义”，并说什么红四军党内分成派别等等，散布了许多挑拨离间红四军主要领导关系的言论。他的这种“不调查清楚事实状况”就“偏于一面”的“轻率发言”，起了很坏的作用，造成了军内官兵思想混乱，助长了党内思想上的分歧，而且使争论复杂化了。后来，陈毅同志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到，刘安恭来红四军后的一些言行，是造成党内和领导间争论的一个主要原因。

6月中旬，国民党地方军阀陈国辉部由广东潮、汕地区窜回龙岩城。前委由新泉移住到小池，准备三打龙岩，彻底消灭陈国辉部。军委在小池开会研究部署三打龙岩的作战计划，通知谭震林同志参加，而党代表毛泽东同志没有接到通

知。当时，谭震林同志建议毛泽东同志也去参加，毛泽东同志说，没有通知，怎么好参加。会后，谭告诉我们，在这次战斗中，毛泽东、谭震林、我和前委、政治部的工作人员随同新由闽西地方游击队编成的红四军支队张鼎丞部行动。

三克龙岩后，部队在龙岩整训20余天。很明显，在当时敌强我弱、不断被敌“围剿”、战斗十分紧张的环境中，革命队伍内部，尤其是领导人之间存在着日益严重的分歧和争论，对革命是不利的。于是，前委决定利用这一短暂稳定的时间，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是在龙岩城的一所中学里召开的，我负责会议的秘书事务工作。原计划会议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的经验，统一思想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以进一步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更好地担负起创建发展农村根据地的伟大革命斗争任务。会议开了一天，虽然通过了决议案，选举了新的前委会，但对从“七大”前就开始争论的主要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争论的主要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6月14日给前委的一封亲笔信中，对争论的问题列举了14条：（1）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2）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3）小团体主义与反对小团体主义；（4）流寇思想与反对流寇思想；（5）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6）地方武装问题；（7）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问题；（8）对时局的估量；（9）湘南之失败；（10）科学化、规范化问题；（11）四军军事技术问题；（12）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13）分权主义与集权；（14）其他腐败思想。他还指出，近日两种

不同的意见，最明显的莫过于军委问题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现时军委要不要的问题。

关于军委要不要的不同意见，概括起来，主要是：

一种意见认为：既有四军，就要有军委；建立军委是完成党的组织系统；并且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代替了群众组织”等等，甚至攻击前委领导有“家长制”倾向，是“书记专政”。其言外之意，只有成立了军委，才能改变如其所说的这种状况。

反对设立军委的意见认为：现在红四军只是有4000多人的一个小部队，又处在游击不定、频繁行军作战的环境里，“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因此，有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要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生生的插进一个军委；而且人也是这些人，事也是这些事，这是十分明白的，在实际上不需要的。并认为，坚持设立军委是“形式主义”，“实际弄得不好，形式上弄得再好看又有什么用处呢？”所谓“前委管的太多”等说法，只不过是“为要成立新的指导机关——军委，便不得不提出旧的理由，攻击旧的指导机关——前委以至支部”，这实际上是“分权主义”。而这种分权主义是“与无产阶级的斗争组织（无论是无产阶级的组织——工会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共产党，或其他武装组织——红军）不相容的。军委前委分权形式所以不能存在就是这个理由”。

最后，“七大”否定了在前委之下再设立一个军委的意见，认为这确系机关重叠，无再设军委之必要。在“七大”决议中还指出：“党代替群众组织，完全不是事实”；说前委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失于武断，不合事实”；所谓

前委领导有“家长制”倾向，“书记专政”问题是“纯属偏见”。

军委要不要的争论虽然解决了，但是在这个问题背后的关于党和军队关系的争论，仍未得到完全解决。所谓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主要是由于当时红军还建立不久，其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旧军队的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都带到了红军队伍中来，因而一部分人习惯于旧军队的领导方式，对保证军队接受党的绝对领导不赞成，有怀疑。他们强调“军官权威”，喜欢“长官说了算”，相反认为现在是“党太管事了”，“党代表权力太大”，提出“党不应该管理一切”，“党所过问的范围是受限制的”，“党支部只管教育同志”；并主张“司令部对外”，政治部只能“对内”，对军队只能指导，不能领导等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党对军队领导权的建立。

在这场争论中，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抬头。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红军的三大任务：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创立了正规红军、地方红军和地方赤卫队三级体制的人民军队体系，并且明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在当时，革命的政治任务主要就是，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实行武装割据，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但是，一部分人对此总是格格不入，他们主张“军队只管打仗”，建立和巩固根据地是地方党组织的事；主张扩大红军用“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方法；并且热衷于“流动游击”，“走州过府”，打大城市；而不愿意发展地方武装，不积极做群众工作，不愿

意做艰苦的建立根据地和人民政权的斗争；甚至忽视宣传队的重要性，取消宣传工作，还说什么宣传兵是“吃闲饭”的，“妨碍行军”等等。对改造部队问题，毛泽东同志积极倡导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主义制度，发扬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废除打骂士兵和枪毙逃兵的旧制度，实行官兵一致，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士兵管理伙食，经济公开；并在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代表士兵利益，并做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军内的民主主义，对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起了积极作用，对军阀主义残余是一个极大的冲击。但是，这也引起了一部分习惯于旧军队领导方式的人的抵制。另一方面，由于红军的大部分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和极端民主化思想带到了军内，因而一部分人反对自上而下的军队内部民主制度，主张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事无大小，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甚至有的人对党内应有的严格纪律也感到“受拘束”，“不自由”；有的领导同志对破坏军纪的问题，反对从严，主张从宽，认为只要打仗胜利了，军纪破坏一点，城市政策破坏一点也没什么大要紧，而不把军纪问题作为红军的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来抓。上述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极大地妨碍了部队的改造和执行正确的革命的政治任务。

由于“七大”未能统一认识，毛泽东同志向大会提出的关于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克服红军中正在滋长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流寇思想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正确主张，一时未被大多数代表接受。大会在最后改选前委时，原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只当选为前委委员，而没有被选为前委书记。

这里附带说一下，那时毛泽东同志对于干部要求高，要求严，批评人也是很严厉的，对一些营团级负责干部的缺点、错误，他也毫不留情地当面批评、训斥，常常令人难以接受，下不来台，因而有些同志对他是有意见的。

到闽西特委

“七大”以后，毛泽东同志离开了红四军前委领导岗位，去帮助闽西特委召开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7月8日，我随毛泽东、贺子珍一起到了闽西特委所在地蛟洋。7月，陈毅同志去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之前，曾到蛟洋同毛泽东同志交换意见，两人在交谈中又争论起来，各执己见，未能统一。

后来，党中央在李立三、周恩来同志主持下，听取了陈毅同志的汇报，写出了对红四军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充分肯定了红四军两年来的斗争经验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建党建军的基本原则，正确解决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有争议的主要问题。11月，陈毅同志根据中央指示邀请毛泽东同志返回红四军复职，主持前委工作。12月，在上杭的古田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传达讨论了中央九月来信，总结了经验教训，一致通过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多项决议，改选了前委，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书记。这样，古田会议在实质上已经为“七大”作了结论。关于古田会议的回忆文章、资料很多，我不赘言。

从“七大”到“九大”，至今已经过去60多年。“七

大”的功过是非早已有了定论，这本已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别有用心地又翻动这段历史，无限上纲，搞乱人们的思想，打击迫害朱德、陈毅等同志。林彪摔死了，“四人帮”被粉碎了，这段历史也就可以恢复了它的本来面貌。但是，现在却又有一些人议论，对60多年前已有结论的“七大”，说什么“围绕‘七大’成败问题的争论却延续了半个多世纪”。这样说，有什么根据呢？对历史和现实又有什么益处呢？

回顾这段历史，我认为，那时召开“七大”，是完全必要的，是红四军领导人共同研究决定的，不是任何个人行为；而且召开这次大会的目的和愿望是好的，是想统一认识，解决分歧，结束争论，加强团结，以利革命；“七大”的决议，对井冈山时期的一些历史问题和红四军实行的一些制度等结论，也是基本上正确的。“七大”并非一无是处。至于“七大”未能完全解决分歧，这也是客观历史的局限性所决定，并非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所能转移。总之，在“七大”，解决根本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陈毅同志9月1日在上海向中央的报告中也说，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两方面的争论“是折衷的”，“并没有把问题彻底解决”。12月，我在上海学习时，中央曾将陈毅同志9月向中央写的报告拿给我看，并征询我对此报告的意见。我曾说过，这个报告所说的情况是符合事实的，但关于党对军队的领导以及军队建设的一些原则性问题，“七大”认识不统一，激烈争论，未得解决。正是有了“七大”这场争论，中央听取了陈毅同志的汇报，才有了中央的“九月来信”和古田会议，使彻底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有了基础。“九大”统一了思想，解决了争论问题。古田会议的伟大历史功绩，有口皆碑。这怎么能

说“七大”的争论延续了半个多世纪呢？！

有些人说，毛泽东同志在“七大”未被选为前委书记，是他“自己再三请求”的结果。持此说法的人，以毛泽东在白砂前委会议上的书面意见和在新泉写给林彪信中的一段话为根据，并且十分肯定地说，如果不是毛泽东“自己坚持不干”，仍有可能被选为前委书记，这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毛泽东在前委会议上的书面意见和给林彪的信，我当时即听到过、看到过，最近我又查看过，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我都看不出毛泽东同志有所谓“自己坚持不干”的意思，而且从我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实际接触了解，毛泽东同志根本不是对革命消极、不负责任的人。那时，他确实是提出了请求“斟换书记”，让他“离开前委”的意见。但是，他这样说的前提是由于“前委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问题”，工作完全做不起来，他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他在给林彪的信中更明确提到，他“请求离开前委，并不是消极，不参加这种斗争”，“我没有离开一天，仍旧可以随大家作思想奋斗一天”。从这两段话可以看出，尤其是从两篇资料全面分析，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毛泽东同志为党内有争论和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而痛心疾首，积极研究分析其原因，并采取各种措施加以解决。当时的历史事实，毛泽东同志也正是这样作的。怎么能对历史不进行全面研究分析，只抓住历史材料中的片言只语，断章取义，把毛泽东同志在“七大”上未能当选前委书记这一历史事实，推论为是他“自己坚持不干”呢？如果要推论的话，我认为，只能是毛泽东同志积极想改变前委不正常的领导状况，而不会是他“坚决不干”。

还有人说，毛泽东同志在“七大”后离开部队去蛟洋，

是前委根据他自己的“要求”，派他“带领谭震林、蔡协民、江华、曾志等离开部队去蛟洋，指导闽西党的一大的召开，同时养病”。据当时我亲身经历，事实并非如此。毛泽东同志离开部队时并未生病，他为准备闽西党一大的召开亲自主持各种座谈会，有时夜以继日地工作。他生病，不是在去蛟洋以前，而是到蛟洋以后，在永定生病的。所以，不存在什么“同时养病”。我和谭震林等同志去蛟洋，也并非为指导闽西党一大的召开，而是调离了我们的工作。在此之前，部队在新泉整编时，曾决定谭震林任四纵队政治部主任，我任一纵队政治部主任，但我们都还没有到职。四纵队是由闽西地方革命武装新组建成的。这时，谭震林即离开前委直去白砂，到四纵队任职去了，而未到蛟洋。7月8日，我随毛泽东、贺子珍一起到了闽西特委所在地蛟洋。在离龙岩城时，闽西特委给我们每人发了30元钞票，任命我为闽西特委秘书长。我们离开部队由龙岩出发时，把我的马也扣留下了，那时我们一行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样子。陈毅同志在“七大”召开10多年以后，回忆此事曾说，他觉得“七大”有许多不足，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不该让毛泽东同志离开前委的领导岗位。这短短的一句话，充分表现了陈毅同志实事求是、光明磊落、高风亮节的品格，无愧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总之，在我军初创时期，大家都无经验，在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出现分歧，发生一些曲折，是不可避免的。实事求是，正确研究和吸取经验教训，是必要的。但是，应当从全党的利益这个大局出发，而不必要过分看重个人的责任。

离开红四军

留在福建省委

“七大”结束后，我离开了红四军。对离开红四军，我思想上是不愉快的。在闽西特委工作不久，我又患疟疾，眼睛也不好，我报告特委，经批准去厦门治病。行前，向毛泽东同志讲了这件事，他再三劝我不要走，说：你莫走，还是这里好。建国后，我在浙江工作时，毛泽东同志还谈起那时劝我留下来的事，言谈之间似有感慨之意。

7月下旬，闽粤赣三省敌军分三路向红四军“会剿”。这时，毛泽东同志正在永定县境，病情严重，住在胡雷附近大路边的一座房子里休养。粤敌陈维远一个旅从大埔向永定进攻，正由此经过。幸好敌军怕松据地群众在水缸里放毒，下令不准进老百姓家找水喝，因而敌军未曾停留就过去了。敌人过去后，警卫员赶快把毛泽东同志扶上担架，由胡雷向北躲走了。我听说这件事，心想这真危险啊！怎么会发生这种糟糕事，打游击本来就不该住在大路边，何况又是重病，行动不便，更应该住在较隐蔽又不易为敌人发现行踪的地方。此事过后很久，我心情仍很不平静。

顺笔在这里叙述一下要求去苏联学习一事。大约是在新泉时，由于“中央二月来信”提出，要红四军缩小目标，将

队伍分小，干部分散，毛、朱离开部队，因而引起了许多干部的不安和不满。非闽赣籍的许多外来干部都要求去苏联学习，毛泽东、陈毅、林彪、谭震林等都填了表，我也填了表。“七大”以后，要求去苏联学习的风气又兴起了一下。但此事中央未予批准。

1929年秋，我去厦门治疗眼疾。由于敌军封锁，不能直接由陆路去厦门，须经广东绕行，交通带领我从蛟洋出发，经白沙、上杭，西至武平，然后再南下进入广东梅县、潮州，到汕头乘船，走海路至厦门。一路上穿行于白区，要化装隐蔽，以免暴露。在福建境内，我们绕过城市，走农村。在梅县，住一教员家，他母亲害怕，不愿意留我们住。在潮州，我不会讲广东话，又当了一次哑吧。在汕头，住在旅馆，恰逢警察局来检查，我们躲到附近一工厂里。在厦门，福建省委安排我同斗生同志住在一起，他是南昌起义后护送周恩来同志由海丰去香港的交通员。

在我治病期间，公开身份是记者，省委军委书记王海萍同志（海南岛琼崖人）同我谈，希望我边治病边做些工作，并征询我愿意参加市委还是省委军委工作。我表示，由组织决定。于是，省委决定我任省委军委常委。

漳州附近有一股土匪，红军攻下龙岩后，他们曾主动同红四军联系，要求编为红军，但因他们要求太高，没谈判成。这次省委又派我去同他们联系改编的事。他们住在山边的一个小村子里，我一进村，即见到有些穿便衣、敞着怀、腰间别着枪的人，一看就知是土匪队伍。他们的一个头头同我谈判，我的话，他听不懂，他的话，我也听不懂，虽有人帮我翻译，但有些话还是传不清楚。据说他是中学毕业生，我提议，是否可以笔谈？他哼哼唔唔，原来是不识几个字，

中学文凭是花钱买来的。他老婆还对我说，要我劝他老公改邪归正，不要干这个事。谈判中，他们口气还很大，坚持要正式红军的番号，编成一个军的建制。我劝他们编成一个支队，很诚恳地同他们讲，没有那么多人，没有实力，还是目标小一些好。我的印象，他们还是有革命的意思。但是由于他们的坚持，结果还是没有谈成。

去上海学习

这一年的冬天，福建省委派交通送我到上海，进中央举办的训练班学习，主要学军事、巷战、爆破技术等。同我一起学习的有：蔡申熙，原为江西省委军委书记，后来任十五军军长；旷继勋，四川人，学习后派到川东工作；白子玉夫妇，顺直省委派来的，白妻是北京中学学生；还有一位湖南常宁人。教员有向忠发、陈绍禹、顾顺章、李翔吾。向讲工运；陈讲政治；顾讲特工，主要是讲如何同敌特和叛徒斗争；李讲巷战技术，主要是讲如何搞城市暴动和使用炸药、工具的方法等。学习有一个月的时间，住在闸北路一个学校里，都关在房子里，不让出门，有称呼为黄老板的夫妇负责我们吃住等生活问题。学习完毕后，搬出学校，分散开住，我住在印度里一个亭子间里，自己烧饭，每天上街调查地形、马路情况、房子高低等等，我们戏称是当了“马路巡阅使”。由于我们不熟悉上海的环境，对此兴趣不大，所以跑了几天就算了。学习完毕，原拟分配我去红二方面军，因当时无交通，我提出愿意回湖南工作，恰好湖南省委书记宁迪卿在上海，他欢迎我回湖南，中央同意了，并适应工作需要，给我改名为黄春圃。从此，开始到一新地区工作和生活。

赣水苍茫闽山碧

重返红军

1930年春节前，我和宁迪卿，还有一位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的姓周的同志一起，乘一艘小客轮离开上海。轮船溯江而上，缓缓地驶向汉口。船舱里太闷，又不能随便与别人说话，我不时地走上甲板换空气。舱外的空气是清新的，但我的心中却仍然十分烦闷。只见江面上，一艘艘帝国主义的军舰在游弋，它们傲慢地鸣起汽笛，横冲直撞，掀起阵阵浪涛。一些小渔船小货船忙不迭地躲避着，稍不小心就会被撞翻。岸边，队队纤夫“杭唷、杭唷”地哼着号子，背负纤绳，弓身行进在崎岖的道路上。春寒料峭，江风凛冽，我衣衫单薄，不由地阵阵发颤，但他们却身着单衣或赤背，裸露着黝黑的脊梁。

几天的航行，满目所见，一片萧瑟，一片凋零。长江中下游，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现在却显得千疮百孔，毫无生气。到了汉口，江汉关上的巨钟进入我的眼帘，周围是英租界，一幢幢大英帝国式的建筑耀武扬威地耸立江岸，低矮、破旧的民房象一群蜷缩在衣衫华贵的富人身旁的叫花子，相映之下，格外醒目。上岸后，我便与宁迪卿他们分手了。

说来好笑，30多年后，“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说我1927年在鄂南被捕叛变。对这种谰言，我嗤之以鼻。1930年的这一次是我在整个战争年代唯一的一次途经武汉，怎么可能在1927年就在湖北被敌人逮捕呢？好在中央是了解我的，没有理会这件事。

我独自一人由秘密交通安排，经湘阴到长沙，一路上，对外佯称是在上海读书的学生，回家度寒假过春节。到长沙后，接上交通关系，被送到浏阳县付家冲，在山上一个农民的地窖里住了几天，再由游击队把我送到红五军随营学校。学校就设在小河村王家祠堂里。这样，在我离开红军半年以后，又回来了。

离开红军的这一段时间里，全国的革命形势和红军的游击战争有了很大的发展。经过蒋桂两派新军阀混战，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封建官僚买办大资产阶级虽然建立了全国性的反革命政权，表面上统一了全国，但在帝国主义的操纵下，各派军阀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不断地发生冲突，小规模军阀战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些战争使千百万人流离失所，饥寒交迫，挣扎在死亡线上，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全国人民企首以盼的国民革命、北伐战争，打倒了旧军阀，却又换来了国民党各派系的无数个新军阀。国家的统一和安宁成为泡影。越来越多的人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真面目。在党的“六大”精神的指引下，全国各地的党组织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尽管中国革命仍处在低潮时期，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士兵运动在严酷的寒冬下正孕育着勃勃的生机。广大党员和干部，开始认识到了武装斗争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到1930年，全国的红军已经发展到10多万人，开辟了10几个革命根据地，分布在江西、福建、湖

南、湖北、广东、广西、河南、安徽、浙江、陕西等10余省300余县的广大地区。正如毛泽东同志1930年1月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信中所说的，“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

在这个时期，红五军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30年，已有5个纵队，5000余人。

红五军随营学校，校长由军参谋长邓萍同志兼任，彭绍辉同志任大队长，政治委员是张景雅。张景雅是湘西人，党的基础知识比较缺乏。他讲党课说，共产党就是很多人集合在一起。为了对学员进行党的基础知识教育，我编了一本小册子《支部生活》。在这本小册子中，我介绍了如何建立党的支部，组织支部干事会，如何召开党的小组会和支部会，会议的主持者在会前怎样使大家了解会议的议题，会上如何引导大家发表意见，怎样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等等。其中的许多知识是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时从他那里学来的。毛泽东同志从来不开无准备、不能解决问题的会，他总是让别人会前准备好意见，会上充分发表意见，遇到不同意见并不急于作结论，而是经过充分讨论，统一大家的思想。而有些同志是不大懂得这些工作方法的。随营学校的主要任务是训练连排基层干部。建国后任过五机部部长的丘创成同志就是那时随营学校的学员。

两打长沙

1930年4月，爆发了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之间在河南信阳、商丘一带的中原大战，一些红色区域周围的反革命

力量空虚了，正是革命发展的大好时机。

5月，红五军的5个纵队和平江长寿街会师后，攻克了平江县城。随即，除留第一纵队和平江开展工作外，彭德怀率其余纵队进军鄂东南。6月，第五纵队扩编为红八军。根据中央指示，红五军、红八军组成红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总政委，黄公略任副总指挥，邓萍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我们随营学校也就成了红三军团的随营学校。与此同时，红四军、红六军和红十二军也组成了红一军团。7月，红六军改称为红三军。

随着国内革命力量的增长，党的某些领导人，又骄傲起来了，党内存在的一些“左”倾错误思想和“左”的政策，又有了新的发展。他们夸大了国内统治阶级的危机，否认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认为已经具备了在全国大干的形势。同时，还过分夸大了国际资本主义危机和帝国主义之间、帝国主义与苏联之间的矛盾，过高地估量世界革命力量的发展，认为有“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他们认为中国革命的总爆发必将引起世界革命的总爆发，而中国革命必须在世界革命总爆发中才能胜利。这就是以李立三同志为代表的党内的第二次“左”的错误领导对形势的判断。基于这样的错误认识，中央拟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组织全国大中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他们命令红三军团打长沙，红一军团打南昌、九江，然后集中进攻武汉，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同时，还计划搞南京兵暴，上海总同盟罢工，全国许多城市搞罢工、起义，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为了贯彻执行这个冒险计划，他们在组织上，将各级党、团、工会组织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并在党内大反右倾。红军两次攻

打长沙，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发生的。

1930年7月，红三军团在占领了岳州、平江后，扫清了敌人在长沙的外围防线，以8000多人打败了万余优势敌军，于27日攻占了长沙。我们随营学校随部队进城后，干部、教员和学员分配到各战斗部队任职。彭绍辉同志到五军一师一团任团长，我任一师三团政委。8月1日，10万群众在长沙集会，成立了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李立三同志任主席（并未到职）。这一天，长沙城内彩旗挥舞，万众欢腾。长沙，是我军创建以来打下的第一个中心城市，干部、战士心情十分振奋。经过北伐战争洗礼，掀起过大革命高潮的湖南人民又一次见到了红旗，兴高彩烈，喜气洋洋。在攻打长沙的战斗中，有许多武装农民参加作战，打下长沙后，四乡的农民也跟着进城。有些没有经过训练和组织的农民的确象一盘散沙，总指挥部让他们搬武器弹药，他们不愿多搬，只想要枕头、首饰、被服等日用品，路旁到处睡的是人，几个人一把伞，躺下就睡觉。这件事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什么叫“农民意识”。农民需要共产党去领导，去组织，去改造，去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在城里，我还专门到1927年我当政治交通员来长沙时住过的那个郑家公寓，想看看那家人怎么样了，但大门锁着，无人在家。

红军攻占长沙的胜利，使敌人大为震惊，他们立即组织力量进行反扑，水陆两路分进合击长沙城，红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8月6日，敌军两个团从小西门偷渡过河，进入小吴门一带，与红军展开激战，其他敌军也逐渐逼近了长沙。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形势下，军团决定撤离长沙。守城时，我们三团、总部炮兵团和红八军的第四师（政委石恒中）在一起，接到撤退的命令后，互相掩护，边打边撤，先向南、再

向东，过了永安市，见到了彭德怀、何长工同志，他们都很高兴，说总算把部队带出来了。后来，红三军团到平江长寿街一带集结休息。

红一军团按中央的命令攻打南昌不克。毛泽东、朱德同志改变部署，收复吉安，然后经铜鼓、修水往浏阳向三军团靠拢，在文家市消灭了何键部戴斗恒师的一个旅。8月23日两个军团在浏阳东的永和市会师。会师后，两个军团的前委举行了联席会议，按中央指示，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政委，彭德怀为副总司令，滕代远为副政委。一军团辖三军、四军、十二军，三军团辖五军、八军和不久前成立的十六军，总兵力约3万多人。同时还成立了党的总前委，毛泽东同志任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见到我后，要我回前委工作，但一师师长李实行同志不愿放我走，我也觉得在哪里工作都一样，也就没有去。

3万多红军聚集在一起，声势浩荡，威武雄壮，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如果用这些部队去搞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其作用将是不可估量的。但中央却强令红一方面军再攻长沙。

第二次打长沙，和第一次相比，虽然红军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增强，但敌人防守的兵力却大大超过以前，并且修筑了3道防御工事，设置有巨型鹿砦和高压电网，敌强我弱的态势更为明显。8月24日，红军分3路向长沙推进，到达长沙近郊猴子石一带。9月2日，发起总攻，不克。我军便对长沙采取包围态势，以诱敌出击。3日，敌军向我出击，被消灭和击溃5个团后，龟缩于阵地内，凭借坚固的工事，固守待援。9月10日，红军又发动强攻，组织了敢死队，猛冲没

有成功。于是又采用古战术，买了不少水牛，在水牛角上捆上蘸满煤油的棉花，把棉花点燃，驱动水牛冲敌工事。但水牛到铁丝网前不再往前冲了，反而往旁边和后面跑，伤了一些自己人。这个战术又没有成功。这时，毛泽东同志根据敌我力量悬殊以及敌援军日益集中所形成的对我不利局面，初步说服了红一方面军主要领导撤围长沙。9月12日，部队撤至萍乡、醴陵、株洲等处待机，并总结十多天来打长沙的经验教训。敌人也不敢追，因为鉴于湘军1个旅曾经在文家市被红一军团消灭，长沙城出来的5个团又被打败，湘军从来没有受过这样大的损失，敌人害怕了。9月底，中共长江局代表周以栗来到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驻地宜春，带来了中央的信。他召集前委会议，想说服红军再攻长沙，并准备夺取武汉。他还说，武汉的工人、市民盼望红军，情绪高涨，汽车可以从人头上开过去，人还不散。我们有的同志同我一样，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不知道汽车到底能不能从人头上开过去，也相信他说的话。毛泽东同志根据蒋冯阎大战很快就要停止，蒋介石将要集中兵力来对付红军的形势和攻打长沙的教训，说服了周以栗同志和一方面军其他领导同志，放弃打长沙的计划。10月，红军胜利地打下了吉安，使周围广大革命根据地联成一片，并成立了江西省工农兵临时苏维埃政府，曾山任主席，陈正人任副主席。这样，红一方面军不仅避免了“左”的错误可能造成的更大损失，并且得到了发展。

红军两次进攻长沙，是“左”倾路线的产物，也反映了我们党和红军在幼年时期的不成熟。实践证明，象长沙这样的中心城市，在当时，不应该是我们夺取的目标，即使打下了，也不可能长居久占。中国革命，还得走毛泽东同志开辟

的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的道路。但是，红军战士在攻打长沙的战斗中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是永远值得纪念的。长沙，是我军在内战时期打下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大城市。就这件事本身而言，它表明了红军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有战斗力的部队，而不是象国民党反动派污蔑的那样，是一群乌合之众。它向人民宣告，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统治所压倒，所屈服。这在当时，是有一定的政治意义的。

富田事变

1930年10月，蒋、冯、阎军阀大战刚结束，蒋介石即指令其驻江西的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调集10万军队，准备对红一方面军和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军事“围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新余县罗坊召集会议，讨论当时的形势和红军去向。我们三军团团以上的干部对红军的行动也进行了讨论。讨论的焦点集中在打不打大城市，红军两个军团集中还是分散等问题上，具体地说，过不过赣江，到江东根据地去。有一部分同志头脑还没有冷下来，主张继续打南昌和九江等大城市，或到鄂南去，不同意过江。从当时的情况看，江东形势好，有党组织，群众正在分田，拥护我们，并且远离中心城市，有利于我们的发展。与鄂南相比较，鄂南虽然也有党组织，有独立师、游击队，但经常威胁武汉、九江、南昌，敌人一定不会放松，那里周旋的余地也不如江西、福建。经过讨论，大家赞成集中，赞成过江东。彭德怀

同志最后发言，也赞成过江东，就这样定了。

在新余，我们部队还发展了一些党员，苏振华、杜理卿等同志就是在这时入党的。我是团政委兼师党委的组织委员，师政委和师党委书记是吴溉之同志。我与苏振华等同志谈了话，并主持他们的入党宣誓仪式。

部队过赣江后，我们集中到小布、东韶、洛口一带休整、补充，作反“围剿”的准备，同时进行内部肃反。在肃反中，福建和湖南打击的对象是“改组派”，江西则大抓“A B团”。师一级都成立了肃反委员会。我们一师的肃反委员会，由吴溉之同志任主任，我是委员之一。杀人权就放在师级，往往是凭口供就杀人，也没有什么申诉和辩护。三军团打下长沙时，从监狱里出来跟部队走的知识分子被杀了不少。讲怪话也有掉脑袋的危险。原红四军三十二团政委陈东日夫妇俩就是这时被杀的。我们团的主任副官杜理卿同志也差一点被杀，我向吴溉之同志担保他不是坏人，他的毛病就是好吃一点，团长周彩薪有点害怕，我说，你不用害怕，我担保。我和周彩薪同志介绍杜重新入党，杜理卿同志以后为革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后来改名为许建国，解放后担任过公安部副部长，我国驻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大使等重要工作。

在肃反中，发生了“富田事变”。红二十军的一些干部，对肃反扩大化不满而采取了极端的过激措施。他们带领部队攻打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赶走曾山主席，并把红二十军拉过了赣江，到永新、莲花、安福、茶陵一带，发表声明，反对红一方面军领导，非法成立了“江西省行委”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他们还伪造毛泽东同志给古柏的信，挑动红三军团领导人反对总前委，还以同样手段写信给朱德、黄

公略同志，妄图制造分裂。彭德怀等人识破了阴谋，红三军团领导人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邓萍等发表了拥护毛泽东同志和总前委的宣言。在国民党10万大军压境的紧迫形势下，二十军的这些行动对革命十分不利，是极其错误的。1931年1月，苏区中央局经过调查，发表了对富田事变的决议，认为富田事变是分裂革命势力、分裂红军的反党行为，决定将为首者开除党籍；同时认为，富田事变不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主张以党内斗争的方式来解决矛盾。由于苏区中央局的正确处理，富田事变的主要领导者向党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表示服从总前委的领导。

每当我想起中央苏区肃反，心情总是十分沉痛的。我们有些好同志，满怀着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仰来参加党，参加革命，并随时准备为崇高的理想而流尽最后一滴血。但是，他们没有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没有死在浴血搏杀的战场，却倒在自己同志的枪口下，而这一切又是以革命的名义执行的。这个严重教训非常深刻。党内斗争中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仅不会“纯洁”革命队伍，只会对革命造成损失，使亲者痛，仇者快。可惜我们党内不只一次地发生过这样的严重现象。毛泽东同志一贯反对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进行党内斗争，在杀人的问题上，尤其谨慎。以后在延安时期，他提出了一整套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方法和原则，开创了党内斗争的良好风气。建国以后，在机关内部肃反中，他又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原则。后来，“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悲剧，则是背离了毛泽东思想所造成的。我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总是忘不了苏区肃反的教训，特别是在我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和宪法赋予生杀权力的时候，更是谨慎地对待杀人问题。我觉

得，杀人不是儿戏，杀一个人是容易的，但若错杀了，就无法补救。

经过肃反和训练一个时期，部队便散开，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我们团作为西路军，由谭震林司令员、郭化若参谋长率领，打银坑赖村的“土围子”。土围子是反动地主武装的反革命据点，他们以村庄为屏障对我军进行顽抗。我们在既无重炮又要顾及群众利益的情况下，只好挖地道逼近攻击。在我们地道还没有挖通之时，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开始了，部队又投入了反“围剿”的准备。第一次反“围剿”后，我们又接着打土围子。经过实战才懂得，用主力部队打土围子往往久攻不下，限制了我们的机动兵力；用地方部队打土围子才是个好办法。长征到陕北后，我们用地方部队打掉了不少土围子。“文化大革命”中，张春桥写了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文章，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要打“土围子”，实质上是想借此打倒一大批老干部，特别是要打倒周总理，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阴谋。张春桥要打的是政治上的“土围子”。

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

1930年12月，国民党刚开过三届四中全会，蒋介石便到达南昌，督率“剿共”。12月9日，他在南昌召开“剿匪”会议，特悬赏5万元，缉拿红军统帅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等，又颁布了《剿匪奖赏令》。蒋介石纠集了10万大军，以鲁涤平为总司令，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实行“分进合击、长驱直入”的作战方针，向我根据地中心区域

大举进攻。敌公秉藩、张辉瓒、谭道源、许克祥、毛炳文5个师，先后占领了东固、龙冈、源头、洛口一线。早在新余召开的总前委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诱敌深入，将敌人诱入我根据地内部，利用良好的群众基础和地形条件，各个击破的方针。在小布，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了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并为大会拟写了集红军战略战术之大成的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在毛泽东、朱德等同志指挥下，红军先伏击谭道源的第五十师，由于该敌坚守源头不出，总前委便决定将攻击目标转向张辉瓒师。12月29日，红军主力秘密进至龙冈，将张师师部和两个旅包围起来，第二天，发起总攻，全歼该敌，活捉了张辉瓒。龙冈大捷后，红军挥师东指，追击惊慌失措从源头退往东韶的谭道源师。东韶一战，歼敌半个师，敌人全线溃退，我军乘胜追击。朱总司令和我们在一起，他挥舞手枪，高兴地喊道：“追谭道源去！”我们随着总司令，追了20多里地，终因敌逃窜太快而没有追上。红军5天内接连打了两个胜仗，歼敌近一个半师，俘敌1万余人，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辉煌胜利。第一次反“围剿”结束后，举行了庆祝大会，大家都去看张辉瓒。当时，对他还是优待的，还曾想以他为人质，换得一些军用品。后来由于敌情紧迫，把他枪毙了。

第一次反“围剿”结束不久，1931年2月，蒋介石令军政部长何应钦组成南昌行营，调集了20万军队，改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构成一条800里长的战线，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军事“围剿”。这时，项英等人来到了中央苏区，成立了苏区中央

局。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举行了扩大会议，讨论作战方针。在会上，有人提出放弃苏区，撤到云贵川去，建立新的根据地。毛泽东同志则主张在苏区内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会上争论很激烈。一方面军参谋长朱云卿同志因病在医院治疗，坐担架来参加会议。他说，如果走，我就回医院到老百姓家里打埋伏，如果留，我就来部署。最后大家都同意留。朱云卿是个好同志，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和红军的成长，作了很大的贡献，在部队中很有威信。第二次反“围剿”打下建宁以后，听说他被反革命分子暗杀了，我们都很难过。

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一致接受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决定集中红军主力，避强打弱，由西向东，打破第二次“围剿”。在打击方向上，决定先打王金钰这一路。这一路是北方军队，比较弱，地形不熟，又不会爬山。我们按总部的命令，在龙冈、上固、东固地区集结，待机歼敌，等待了25天之久。终于，王金钰部奉命离开富田的阵地向东固推进。总部决定集中兵力在运动战中歼灭该敌。红一军团在正面堵住敌人，我们三军团五、八两个军迂回到侧翼。5月16日，敌二十八师两个旅和四十七师一个旅进至我军埋伏地。午饭后，我去军部了解敌情，忽然，枪声大作，红一军团同前面的敌人交上了火。我迅速跑回部队。我们从侧面冲下去，将后续的敌人分割围住。敌人被这突然一击搞得晕头转向，有很多来不及抵抗就做了俘虏。这一仗，敌1万多人大部被歼，公秉藩也当了俘虏，但他佯称营部书记官获释逃脱了。敌四十三师和二十八师、四十七师残部慌忙向水南溃退，因潇龙河上敌人原来架设的便桥已为我游击队拆除，河深不能徒涉，敌又转向白沙逃窜。红三军团直插白沙河，歼敌四十

七师一个旅的残部和四十三师一部。5月22日，我们又往中村前进，由于距敌很近，采取战备行军，放连哨。我们团是前卫，到中村后，与正在向西移动的高树勋第二十七师1个旅遭遇，我军发起猛烈攻击，分段包围，敌大部被歼。中村大捷后，红军除留一部分部队追击北撤之敌外，主力东进广昌。一军团为主攻，三军团为预备队，5月27日，攻克广昌，歼敌第五师一部。然后，挥师向建宁，以红三军团一、三、四师为主攻，乘建宁敌人立足未稳，从敌左右两翼发起攻击，歼敌五十六师3个多团，占领了建宁城。至此，红军15天横扫700里，连打5个胜仗，消灭敌军3万多人，干脆利索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此役结束后，红军总部移至建宁，红一、三军团分散向福建西北部进军，直达闽江上游，接连解放了泰宁、邵武、光泽、将乐、顺昌、宁化、清流、归化等县广大地区。红三师则到资溪境，威胁抚州，掩护我们在黎川一带开展工作，打土豪，筹款，扩大队伍。

第二次反“围剿”以前，红军扩大队伍，主要是靠在已解放的地区，经过土改，动员群众参军，或者在新解放区宣传和发动群众参军，而对俘虏的敌军，一般是经过教育后，发给路费放走了。我们到黎川后，马上就遇到了扩军的困难。这里刚刚解放，土地改革还未开始，群众对我们还不完全理解和信任。经过请示上级，我们留下了一部分敌五十六师的俘虏，组成了补充连。彭德怀对此很赞赏。在俘虏的去留问题上，红军内部一直是有两种意见的：有的主张留下俘虏兵，加以改造，壮大我们的队伍；有的认为俘虏不可靠，主张教育后放走。我们是赞成第一种意见的。以后，大多数同志都认识了这个问题，赞同对俘虏来去自由，愿留的留下，不愿留的发给路费放走。后来，红军还加强了瓦解敌军

的工作，最成功的例子，就是发动了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的宁都起义。但是，起义后，还是放走了不少人。在抗日战争，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改造过来的俘虏，成为我们一些部队的主要补充来源。

我觉得，如何对待俘虏，敢不敢留他们，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第一，敌军中的大多数士兵也是穷苦人出身，他们当兵打红军是被迫的。第二，我们党和红军有能力、有信心改造他们，我们革命的目的，是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的劳苦大众，当然也包括解放这些被迫当兵打红军的国民党军的士兵。而要实现我们的目的，也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践证明，我们党优待俘虏、改造俘虏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许多俘虏经过改造和教育，成为英勇善战的红军战士，为革命作出了贡献。

1931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共纠集了23个师23个旅，5个航空队，兵力约30万。蒋介石带领德、日、英等国军事顾问到南昌，并亲自担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任前线总司令，采取“长驱直入”战略，企图先击破红军主力，捣毁苏区，再深入进行“清剿”。敌人兵分三路，一路从南城、抚州一线进广昌，一路从赣州插于都、兴国，一路从吉水、永丰向南压过来，根据地内全部县城均为敌人占领。当时，我军主力仍在福建建宁，苦战之后尚未得到休息和补充。针对这一严重情况，毛泽东同志提出了“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用“推磨战术”，牵着敌人的鼻子在根据地内转圈子。按总部命令，我们兵分两路，一路从石城到瑞金之间，一路从广昌到石城之间，绕道千里，回师根据地中心区域，集中到兴国银坑地区。这时，原在广西的红七军和“富田事变”分裂出去

的红二十军也到了银坑。二十军被编散了，红七军编入红三军团序列。红军主力在此集结休整了一段时间，敌人一直没能发觉。当时，能够做到这一点，一是部队有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和严格的组织纪律，二是地方党和政府做了大量的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工作。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根据地人民的觉悟是很高的。这说明，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搞武装斗争，必须紧紧地依靠群众，而要使群众信任我们，关键就在于建立和巩固根据地，深入土地革命。在根据地人民面前，敌人成了聋子、瞎子，群众优势极大地弥补了我们兵力和装备上的劣势。因此，许多红军指战员都有这个体会，在根据地打仗，心里有底，有饭吃，有地方休息，负伤了有地方打埋伏。当然根据地人民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以后，敌人占领我苏区时，对人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摧残，他们杀人放火，捣毁村庄，把大片的地区变成了无人区。据说，有些老区人口至今还未恢复到苏维埃时期的数字。

敌人在我苏区内狼奔豕突20余天，始终未找到红军主力，却遭到我地方部队的不断袭扰打击。至7月底，才发现红军主力在兴国地区。敌人判断红军可能西渡赣江，急忙调整部署，妄图围歼红军于赣江东岸地区。红军仍以一部分部队牵制敌人主力，我红一、三军团主力则迅速由兴国的高兴圩、老营盘向富田开进，后发现敌罗卓英、陈诚部两个主力师到了富田，便改变计划，巧妙地通过蔡廷锴、韩德勤两师之间40华里的空隙地带，迅速进入莲塘地区。我们师是先头部队，在莲塘北三五华里的地方，与敌上官云相部的第四十七师接上了火。总部决定，由我们师顶住敌人，兄弟部队趁机将敌人包围起来。我们守在一个山头上，总指挥部就在山脚下宿营。师长李实行叫我们一定要顶住。从下午5时起，

打了一夜。李实行同志负伤了，后来牺牲在后方医院。我的战友、团长周彩薪同志也牺牲了。第二天拂晓，一军团上来了，四军十师师长彭雄找我问情况。我说，前面就是敌人。彭雄喊“十师跟我来，从侧面冲过去”。我们团也发起反攻，机枪连在前面，集中机枪向敌人猛烈射击，战士们打红了眼睛，因为他们连的指导员和许多战友牺牲了。几百名敌人在我火力下倒下了。我们夺取敌人阵地后，又掩护十师继续冲锋。莲塘战斗全歼敌四十七师第一旅，敌旅长被击毙，上官云相仅带着几个人逃奔龙冈。我军乘胜进击莲塘北30里地的良村守敌五十四师郝梦龄部，郝师大部被歼。我军向龙冈方向追击，三军、十二军追到了龙冈，我们和四军在后面，天黑了，毛主席说，不追了，停止。于是，部队向东，打驻在黄陂的毛炳文部。我们五、八军担任右翼迂回攻击，四军、十二军正面主攻。这一仗消灭了毛炳文部4个团，俘敌4000余人。此时，蒋介石、何应钦发现红军主力在黄陂，急令所有向西向南的部队调头向东，取密集大包围姿态向红军扑来，寻找红军主力决战。我军则以罗炳辉的第十二军带走各军番号，佯装主力向东北乐安方向运动，故意白天行军，路上扬旗吹号，广插行军路标，敌军果然中计，尾追而去。我主力则出其不意地从敌军几个师中间的一个20华里间隙的大山中穿越过去，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转到兴国西北山区的白石地区休整。红军休整了半个月后，敌人才得知红军主力在兴国，但他们在苏区来回奔波两个月，已疲惫不堪。3个师遭到歼灭性的打击，士气急剧下降，无力再战，蒋介石不得不下令结束“围剿”，实行总退却。我军在充分休整后，对退敌相机追歼，红三军在老营盘全歼敌第九师蒋鼎文部的1个旅。红三军团五、七两个军在高兴圩与蒋光鼐3个

师血战，战斗极其激烈，双方伤亡都很大，形成对峙局面。我军主动撤出战斗，敌人也不敢恋战，退到兴国县城一带。老营盘、高兴圩战斗是第三次反“围剿”中规模最大、最激烈的两次战斗。后来，部队政治测验，问党内两条战线斗争是什么，有些同志还答出了笑话，说：一条是高兴圩，一条是老营盘。其实，我那时也不懂得这个内容。第三次反“围剿”的最后一战，我军又在方石岭歼灭敌韩德勤五十二师，击溃蒋鼎文师。

从1931年7月初到9月中旬的75天中，红一方面军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先后击溃敌人7个师，歼敌17个团，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红一方面军主力立即东转闽赣南部边界的广大地区开展群众工作，消灭地主武装和土著军阀势力。红一军团到瑞金、石城，三军团到会昌，十二军去闽西，一部分地方武装包围了宁都，并监视北面的敌人。三军团打下了会昌城后，又连续攻占了寻邬、安远两座县城，在这里进一步发动群众，建立政权，组建地方武装，扩大红军。到1931年冬天，赣西南和闽西两大块革命根据地巩固地连成了一片，正式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全国最大的中央革命根据地。1931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大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成立，选举毛泽东同志为执行委员会主席。同时，还成

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为主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我们党建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的革命政权。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相比较，尽管它是初生幼小的，直辖地区也十分有限，但它的政治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它表明，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目的，就是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统治，以武装斗争来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

在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更加深入，各项政策和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各项建设事业，如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等不断向前发展。

在根据地的广大地区，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真正实现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耕者有其田”。在分配土地中，各地还设立了红军公田，红军指战员都有份。公田由苏维埃政府组织农民耕种，收入分配给红军指战员。我记得，1932年和1933年这两年，我都分到了公田的收入钱。在这个时期，根据地内红军的给养，逐步由打土豪转到由经济建设和税收供给，更加有保障了。苏区还发行了建设公债，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踊跃购买公债，支持苏区建设。

这个时期，毛泽东同志以很大的精力卓有成效地主持了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他经常下乡调查研究，解决斗争中出现的问题。他发表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我们的经济政策》等文章，强调了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支援革命战争的极端重要性。1933年10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通过了毛泽东同志起草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文件，作为划分农村阶级的依据，指导土地革命斗争。这个文件纠正了土改中“左”的和右的错误，既强调

了贫雇农的核心作用，又强调了保护中农的利益，团结中农，还严格区分了富农和地主，坚持给富农以经济出路，给地主以生活出路的政策。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中央苏区的土地改革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革命根据地展现出一片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

1931年12月，被蒋介石调到江西参加“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赵博生、董振堂等领导下，举行了宁都起义。起义部队17000余人，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军团。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已达6万多人。在这个时期，红军队伍的政治工作和思想建设也逐渐完善起来。早在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同志就在红军中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以后，又进一步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建立了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明确规定了红军打仗、做群众工作、筹款的三大任务。这些，在中央苏区时期又得到了发展。军队中党的建设，不仅是支部建在连上，连里有党代表，而且把党的小组建在排上，排里设了政治战士，协助排长做政治思想工作；军队内的民主空气更加浓厚，红军建军初期的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不良风气得到了克服；三大民主进一步发展，三大任务又有了新的内容。红军不仅是一个战斗队，而且是一个宣传队、生产队，除了担负打仗、消灭敌人，扩大和保卫苏区的艰巨任务，还要组织、宣传和发动群众，帮助建立苏维埃政权，参加分配土地，还要参加苏区的经济建设和其他建设。人民军队在斗争实践中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红军中强有力的党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是这支军队区别于其他一切旧式军队的根本所在，也是它能够战胜一切强大的敌人，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打不烂、拖不垮的主要原

因。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红军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有一套严格的制度，而且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如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和党员的带头作用；通过土地改革提高阶级觉悟；每次战役前的政治动员，战后的民主评议，行军中的宣传鼓动；同志间的交心谈心，互相帮助；上级关心下级，干部爱护战士等等。红军中的各级党组织，经常对战士进行“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教育，进行革命传统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使战士们懂得中国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要实现这个目的，第一步目标就是进行民主革命，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建立一个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当时的两句口号，即：“为土地而战！为苏维埃而战！”就是对这个第一步目标的形象表达。有了远大的理想，有了坚定不移的信念，有了自觉遵守的铁的纪律，这样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

攻打赣州和第四次反“围剿”

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并且统治全党达4年之久。他们打着批判立三路线的旗帜，实际上提出了一套更“左”、更完备的错误路线和政策，并且逐步推行到各革命根据地。

红军队伍的壮大发展，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加上“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各地兴起的抗日浪潮，形成了极为有利的革命形势。但是，从统治阶级方面看，军阀之间的战争已经结束，蒋介石更牢固地控制了国民党中央政权，进一步加紧了对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镇压和对革命根据地的进攻。

“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的中央，却认为当时的形势是“革命势力急剧发展与反革命统治的日益崩溃，革命危机正在全国成熟着，争取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在望。”

“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死的斗争。”号召全党为实现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而斗争，要求红军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集中力量追击敌人退却部队”，“取得一两个中心或次要的城市。”在中央苏区，他们命令红军攻打赣州，准备在打下赣州后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移到赣州来，以争取革命在江西一省的首先胜利。

赣州虽处在我根据地的四面包围之中，敌人守城部队包括反动地主武装只有万余人，但敌人粮秣、弹药充足，并可利用三面环水、城墙高坚的有利地形顽抗固守，危急时，还可以得到西南方面广东部队和北面吉安陈诚部队的增援。1930年3月，毛泽东、朱德同志曾经率红四军攻打赣州，没有打下，红军速打速撤，兵力没有受到损失。1932年春，按中央的命令，由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调集红一方面军主力对赣州实施强攻。红一军团担任牵制和准备打增援之敌，红三军团担任主攻，五军团作为预备队。2月初，红军占领了赣州城外的山头制高点，将赣州城团团围住，敌人摧毁了城外工事，撤兵进城，固守待援。从这时起，一个月内，红军数次组织爆破攻城，有几次将城墙炸开缺口，红七军部分部队曾冲入城内，但都因敌人火力密集而未成功。2月底，敌周至柔第十四师、罗卓英第十一师相继向赣州靠拢增援，部分部队偷渡入城，敌人挖了几条通向城外的坑道，准备向我反击。3月7日，敌人出坑道向我突袭，我一师遭到敌人夹击，师长侯中英被捕后遭杀害，部队受到了很大损失。8日，根据中央命令，我军撤围赣州，至赣州县江口一带集结

待命。一个多月的攻打赣州战斗结束了。

中央红军攻打赣州，历时33天，不仅城市未克，反遭很大伤亡，而且丧失了有利的形势和充分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巩固与扩展苏区的宝贵时间。这是我们党的“左”倾军事冒险主义造成的又一次恶果。

3月中旬，苏区中央局在江口圩举行会议，讨论红军今后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同志提出向赣东北方向发展，以求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的广大农村建立苏区，发展革命战争的战略方针，被拒绝。苏区中央局坚持“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北发展的方针”。中革军委根据中央局的意见，决定在赣江两岸分兵两路，准备尔后两路军“夹赣江而下”，向北发展。

在江口一带休整几天以后，红一方面军分东西两路军，东路红一、五军团向闽西发展，西路红三军团西渡赣江，去湘赣边界，进行游击战争。红五军和红七军配齐干部独立活动，军团随红七军行动。红五军一师政委黄克诚同志调任军政治部主任，我任一师政委。在湘赣苏区红七军的配合下，我们解放了上犹、崇义、遂川、汝城、桂东、营前等广大地区，先后占领过崇义、汝城、桂东等县城，消灭了许多国民党地方部队和民团，在中央苏区西南面开辟了大片红色游击区，促进了湘赣苏区的巩固和发展。与此同时，红一、五军团在闽西地区，先占龙岩，再下漳州，歼灭蒋介石嫡系部队张贞四十九师主力，发展了大片苏区。至此，中央革命根据地在1932年上半年得到迅速发展和巩固，进入全盛时期。巩固地连成一片的根据地面积达500多平方公里。

1932年6月，红军总司令部来电，说红一、五军团从漳州西南向赣粤边区发展，南雄、水口战役打得很激烈，红五

军团拼上了大刀，伤亡很大。我们迅速赶到信丰、大庾一线，南雄、水口战役已经结束。我军虽然击溃了粤军20个团，但自己损失也不小。毛泽东同志后来总结说，水口战役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个败仗。水口战役后，我主力北撤，我师接替寻淮洲十一师的梅岭关阵地，担任后卫。粤军也不追赶。实际上，广东政府和军队同蒋介石有矛盾，希望红军和苏区在中间作缓冲。红军的存在，对他们是有利的。这些人都了解蒋介石，一旦红军被消灭，下一个目标就是他们这些地方军阀了。毛泽东同志曾经分析过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帝国主义各自扶植自己的代理人，各个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冲突、战争不可避免。这就给共产党和红军的存在发展造成了有利时机和回旋余地。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红军向北后，8月17日，红一军团打下乐安，8月20日，红三军团攻占宜黄。乐安、宜黄战斗后，不久，我军撤到宁都休整。当时正值南方秋季，雨水多，湿气重，蚊子咬，部队打摆子、烂脚的很多。在宜黄境内的一次行军中，我遇到了毛泽东同志，他让我和师长彭绍辉同志命令部队休息，然后向我们询问了部队的情况。我们说，部队战斗情绪还是高涨的，只是烂脚的多，打摆子的多，他说，不要紧，到宁都休息几天，注意治疗，就会好些。

宁都会议以后，红一方面军向东北发展，一军团攻占建宁，三军团攻占黎川。接着，占领了泰宁、光泽，又获资溪、金溪战斗的胜利。

1933年1月，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此时，红三军团为了培养干部，在建宁成立了教导

营，先是黄克诚同志任政委，不久，他调到五师任政治部主任，我接任教导营政委。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以何应钦为总司令，指挥50万部队，分为左、中、右路军，其中以蒋介石嫡系11个师16万人编为3个纵队，陈诚为前敌总指挥，担任主攻任务，寻我主力作战，其余几路策应中路军行动。整个“围剿”采取“分进合击”作战方针。已从上海搬到中央苏区的临时党中央，要求红军主动出击，先发制人，西渡抚河，攻占敌人重兵驻防的坚城南丰、南城，进而威逼和夺取抚州、南昌，打破敌人的“围剿”，争取江西一省的首先胜利。周恩来、朱德同志认为我军应在抚河东岸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但拗不过中央的强令，只得服从。2月14日，红三军团担负主攻南丰的任务，与敌激战一夜，结果城未克而使红军损失300多人，第三师师长彭鳌及两个团长阵亡。此时，敌援军已由北向南出动，战局对红军不利。朱德、周恩来同志决定留少数部队佯攻南丰，主力秘密向西转移，进入宜黄南部，广昌西南的东韶、洛口和小布一带，隐蔽待机。2月27日，我军在黄陂地区设伏，集中兵力将敌五十二、五十九师分割包围，歼灭、俘虏敌军13000人，取得黄陂大捷。3月21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又在草台岗东陂地区歼敌十一师大部、第九师小部和第五十九师残部，俘敌6000余人。此时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基本上被打破了。

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蒋介石曾到前线督战，三军团组织了捕捉蒋介石的突击队。二师参谋长杜中美同志任队长，我任政委。在滕田以北的一个村子里，组织了120来人，每人都配长枪、刺刀、手榴弹、绳索，全都是经过挑选的共产党员。还没有来得及出发，前线来电说蒋介石溜走了。

第四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同志虽然离开了红军的领

导岗位，但他提出的红军作战的战略战术原则，在红军指战员中深深扎下了根，周恩来、朱德同志坚持了这些原则，在行动上抵制了中央“左”倾的错误领导，因而取得了这次反“围剿”的巨大胜利。

福建事变

第四次反“围剿”后，红军总部移到瑞金。我们教导营接收了一批学生，到宁都办学校。学校的负责人还有谢嵩、李志民等。

敌人暂未发动新的“围剿”，红军总部为粉碎敌人新的进攻，决定抓住短暂的休战时机，对部队轮流进行改编，确定取消军级单位，由军团直接指挥师，将原来的小师小团扩编为大师大团，每师编3个团，每团编3个营，每营编4个连。红三军团于1933年5月16日起，在大湖坪进行整编。整编后，红三军团辖3个师，原第五军缩编为3个团，编为第四师；原第七军第二十一军编为第五师；第六师是原兴国模范师。红三军团兵力总计19400余人。红一军团也编了3个师，即第一、二、三师。周恩来同志主持了方面军的整编大会，会上举行了庆祝活动。我记得钱壮飞、胡底同志唱了《可怜的秋香——白军士兵》等歌曲，肖劲光同志跳了苏联舞，非常热闹，全军情绪很高。大湖坪整编后，中共临时中央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分开作战，以红一军团为主组成中央军，在抚河与赣江之间牵制敌人；以红三军团为主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实行所谓“两个拳头打人”，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然后集中一方面军及地方部队，会攻抚州和南昌，

以实现革命在江西的首先胜利。我们教导营由宁都经广昌、石城到宁化，在那里训练。三军团和福建军区的部队，在第一阶段作战中，攻占了清流、泰宁、连城、归化、新泉、大洋坝、白砂等地，然后入闽北，围攻延平，直趋江口，威逼福州，消灭了大量敌人的有生力量，发展了泰宁、将乐、顺昌、邵武、延平之间的数百里游击区。在延平，我三军团第五师李天佑十三团以一个团兵力，全歼敌十九路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铁军”——六十一师三六六团，使敌人大为震惊。十九路军将领觉得，同红军作战是没有出路的，于是经过一再谈判，与红军签订了两军之间停止军事行动的协定。红三军团入闽作战，历时3个月，转战数千里，扩大了游击区，达到了预期的军事目的，稳住了东方战线，为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33年9月，蒋介石集中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向各个苏区同时进攻，发动了第五次军事“围剿”。其中，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就有50万。蒋介石鉴于前4次军事“围剿”的失败，采用了“步步为营，堡垒推进”的作战方法，企图紧缩苏区，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最后寻求同红军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红军的目的。

当时，中央苏区红军兵力已达10多万人，并且有多次粉碎敌人“围剿”的经验。苏区内部，土地革命和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在“一切为了前线”这一口号号召下，广大群众的战斗情绪非常高涨。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动员了10万工农积极分子上前线，迅速壮大了红军队伍，准备了60万担粮食，其他的战争物资准备也很充分。在这种情况下，只要领导正确，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完全可能粉碎敌人的“围剿”。

但是，“左”倾思想统治下的党的临时中央，错误地估计了敌我形势，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如“不让敌人蹂躏苏区一寸土地”，“开展民族革命战争，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等等。特别是，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把红军的指挥权完全交给军事顾问李德。李德无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红军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作战经验，教条地搬用外国军队的战略战术，采取了一整套与红军原来正确的作战原则相反的所谓正规原则，先是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命令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分别攻打敌人重兵把守、工事坚固的硝石和资溪桥，“御敌于国门之外”；遭到失败后，又以单纯防御代替积极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游击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相配合，其结果，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之中挨打。

1933年11月，第十九路军领导人蔡廷锴、蒋光鼐等，不满蒋介石反共内战、不抗日的反动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决定联共反蒋抗日，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即福建人民政府）。蒋介石不得不把进攻中央苏区的部分部队东调镇压十九路军。这样，就造成了我军打破敌人“围剿”的良机。此时，毛泽东等同志建议，红军主力突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的心脏地区，迫使敌军回援，粉碎其向苏区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是，博古、李德等人拒绝接受这一正确意见。他们认为，福建政府的反蒋抗日，是“一部分以前国民党的领袖及政客的一种欺骗民众的把戏”，断定中间派别是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比蒋介石还坏。在军事上实行“坐山观虎斗”、“渔翁得

利”的方针。

12月中旬，蒋介石害怕红军主力入闽支援十九路军，急派第八纵队向黎川东南进攻，目的是占领闽赣边界的黎川、建宁、泰宁苏区，隔断红军主力和十九路军的联系，保障其进攻十九路军的侧翼安全。红三军团在黎川城东30里的团村设伏。在这以前，我已从教导营调到六师任政委，师长是洪超。团村伏击，虽然奏效，但由于敌众我寡，红军主力不集中（只有三军团和五军团第十三师参战），打了个意义不大的击溃战。我以1.2万人击溃敌军3万人，只俘虏了不到1000人。战争中，四师师长张锡龙阵亡，洪超接任，四师政委彭雪枫也负伤了，五师政治部主任黄克诚调任四师政委，我从六师调到五师任政治部主任。

蒋介石觉察到同时与红军和第十九路军作战的不利局面，便调整战略，集中兵力对十九路军猛攻穷追，对红军则暂取守势。此时，中央却没有采取在东线向敌积极进攻，以策应十九路军、打击蒋军的策略，而是错误地将红军主力从东线调到西线永丰地区，去进攻敌人的堡垒阵地。

我们红三军团集结在广昌头陂地区，准备开往西线。1934年1月，十九路军抵挡不住蒋军的疯狂进攻，已呈失败趋势。蒋介石在镇压了十九路军后，必定全力进攻红军，我东线将出现严重局面。鉴于这种情况，中革军委又决定三军团暂不开往西线，改为向东南进军，攻打福建沙县。我们五师担负主攻任务。沙县守城部队是卢兴邦的一个旅。我们赶到沙县后，火力掩护，架云梯攻城，敌人以优势火力凭险固守。我方因部队刚到，准备不足，首战失利，改为坑道作业，准备爆破攻城。经过10多天的准备，第二次攻城又由于爆破没有达到预定效果，又未成功。我们五师撤下来休整，

改由四师主攻。四师将城墙炸开后，攻入城内，敌人大部被歼。卢兴邦的兵工厂被我们没收了，还缴获了不少物资。我军利用缴获的电台，以卢部的名义向敌人发电报“求援”。敌人信以为真，连续派飞机空投了大量弹药、钞票，均为我军所获。不少战利品被送到瑞金。三军团在沙县召开了干部大会，彭德怀同志在会上作报告，传达了中央对福建事变的意见，报告说，我们对福建事变应“坐山观虎斗”。

福建事变，由于主观和客观上的各种原因，终于失败了。此时，红军也失去了一个可以打破敌人“围剿”的良好时机而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毛泽东同志1936年12月在陕北红军大学所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演讲中，总结了这一段历史。他说：“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福建事变的失败固然有其内在的根本原因，如兵力不足，装备上劣于蒋军，内部又不统一等等，但对于我们，也有值得总结教训的地方，可以说，是同我党中央“左”的错误领导有关系的。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对于统一战线采取排斥的态度，这反映了他们对中国的国情，对中国革命的战略策略在认识上的幼稚无知。他们不了解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特点，不承认基于这样的特点，统治阶级

内部必然发生矛盾冲突的可能，不懂得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来建立统一战线，以集中力量打击最主要的敌人。他们自称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正统的马列主义，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教条地搬到中国民主革命中来。他们将党和红军正确的统一战线的政策策略斥之为右倾，而代之以“左”的政策和策略。在根据地内推行“左”的土地政策，“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造成了严重的赤白对立。在白区，实行“左”的关门主义政策，依靠少数人组织罢工、暴动，放弃对社会各阶层的统一战线工作，使党的地下组织大量遭敌破坏，白区工作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他们把所有的资产阶级都当作革命对象，拒绝一切同盟和合作，将有可能在我们反蒋斗争中站在中立同情立场的一些地方实力派推到蒋介石一边，四面树敌，孤立作战。这样一来，革命队伍倒是越来越“纯洁”，力量却越来越小了。认识上的根本错误必然导致行动上的错误，而失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1934年4月，敌人集中了11个整编师，向我根据地北面门户广昌大举进攻。我们奉命从福建建宁回师江西，参加广昌保卫战。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不顾红军连续作战、十分疲劳、减员很大的情况，集中了红一、三军团和红五军团第十三师，红八军团第二十三师，红九军团，共计9个师的兵力，在广昌及其以北地区同敌人进行决战，并且提出了“为

保卫广昌而战，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的口号。由党中央书记博古和团中央书记顾作霖共同签发的作战训令说，这是苏维埃道路和殖民地道路两条道路的决战。我军的部署，先是以九军团和第二十三师守广昌外围，集中第一、三军团和第十三师在抚河以东大罗山、延福嶂地区，准备对敌人实行“短促突击”。战斗打响后，抚河东岸之敌向我第一、三军团阵地猛攻受挫，于是，趁我主力在东岸之机，突破了第九军团的阵地。敌人采取堡垒推进，一步一步地逼近广昌。抚河东西两岸之敌同时向广昌发起总攻，我军调整了部署，以第九军团和第十四师扼守广昌，以第三师和第十三师在抚河东岸牵制敌人，集中第一、三军团和第二十三师向广昌西北之敌反击，但未奏效，我军被迫撤出广昌，向广昌以西以南转移。

广昌保卫战，历时18天。我军虽然给了敌人以重大杀伤，但自身也伤亡5500余人，占参战兵力的1/5。这是一次典型的阵地战、消耗战，是我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最大的一次失败，给以后的作战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 响。它是由“左”倾错误的领导者们不顾敌我力量的悬殊，主观臆断盲目指挥所造成的。在兵力上，敌人11个整编师，我为9个师，实际上只相当于敌3个师。敌军除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外，武器、弹药以及其他后勤供应，远远超出我军，还有空军配合作战。而我军没有飞机大炮，机枪也少，子弹大多是“土造”的。在如此恶劣的形势下，我们的红军指战员，在战斗中勇敢顽强，不顾疲劳，不怕牺牲，尽了最大的努力。当时有一句口号，叫做“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我们随时都准备这样做，而无数烈士正是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了这个气吞山河的崇高口号。

广昌战役后，军团召开了团以上的干部大会批判我，罗列了3条罪名，一是右倾，对战争动摇；二是团结干部不够；三是全师有61个逃兵，责任追究到我身上，说我工作不深入，是官僚主义。最主要的还是第一条。其实是我对“两条道路决战”的提法有不同意见，在师里没有认真地传达贯彻，对错误的军事指挥使红军到处被动挨打有不同看法。这些看法，我并没有在红军指战员中散布，而是在与师里干部的闲聊中以及在会议上陈述了我的意见。但是在批判会上，根本就无法辩解。最后，军团党委宣布，经军委总政治部批准，撤销我的五师政治部主任职务，党内给予严重警告处分。会后，送我到后方军事裁判所监管。1934年8月10日，红军总政治部办的《红星报》上发表了第三军团一位负责同志写的文章，题目是《把反对黄春圃同志的机会主义动摇与官僚主义的斗争开展到各兵团去》。文章除揭露我的上述“错误”外，还批判了我的其他“错误”，如说我对部队的力量估计不足，轻视工农干部，造成广西同志与江西同志的对立；对破坏科干事陈幼思的政治动摇与怠工贪污，采取腐朽的自由主义的态度；对上级指示采取敷衍抵触的态度；对同级政治委员不尊重等等。我认真地想了一下，究竟错在哪里，可是怎么也想不起来。说我对部队的力量估计不足，这难道有什么错吗？明明是敌强我弱，不能决战，我只不过是客观地指出了这一点。如果不顾客观形势，硬要夸大我们的力量，说能够进行决战，那不是自欺欺人吗？至于广西同志与江西同志的对立，责任也不在我身上。第五师是以原邓小平、韦拔群、张云逸同志领导的百色起义后建立的红七军为基础组建的，干部主要是广西人，战士中绝大多数是江西人，由于语言、习惯等方面的不同，有些矛盾是难免的，我

作为政治部主任很重视这个问题，做了些工作，因此，说我造成两省同志的对立是没有任何根据的。破坏科干事陈幼思不是坏人，他曾经发过几次牢骚，说成天堡垒对堡垒，叫我们怎么破坏？就被抓起来，枪决了。对此，我有不同意见。说我对同级政治委员不尊重，也只不过是工作中有些意见分歧。五师的政治委员是陈阿金，此人也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听不得半句不同意见，我有时同他发生争论，但在组织上，我还是服从他的领导，怎么说我不尊重他呢？我当时实在想不通，这不是整人吗？打了败仗，不追究指挥者的责任，反而要下级负责，罗列的罪名又是站不住脚的，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受了处分还不容许申诉，没有辩解的余地。但是，我心里是坦然的。自认为参加革命以来，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对不起革命的事情。我相信党组织总有一天会把问题搞清楚的。同时，我还看到，受到冤枉、打击的，也不只我一个。“左”倾错误的领导者，每打一次败仗，都要找“替罪羊”，这已成为惯例。如肖劲光同志被追究黎川失守的责任，撤销了职务，被判处徒刑，要不是毛主席相救，几乎送了命。再说毛主席，他受了那么多打击，革命困难危急的时候，就用他，让他负责任；革命顺利的时候就排斥他，他数次被迫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则完全把他撇在一边，而他却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服从党的纪律，勤勤恳恳地做分配他的工作。为了对红军负责，对革命负责，不管领导者采不采纳，一有机会就发表自己的意见。比起他们，我个人受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

组织路线总是在政治路线指导下并且为它服务的。错误路线统治中央达4年之久，不仅在政治上使革命事业遭受了

严重危害，而且在组织上，也使革命队伍受到了不可估量的损失。1945年4月党的七大前召开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王明路线的组织路线作了深刻的揭露。《决议》指出：“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为贯彻其意旨起见，在党内曾经把一切因为错误路线行不通而对它采取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错误地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以对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成了领导或执行‘左’倾路线的同志们提高其威信、实现其要求和吓唬党员干部的一种经常办法。它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取消了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精神，使党内纪律成为机械的纪律，发展了党内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倾向，因而使党内新鲜活泼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之发展，受到打击和阻挠。同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相结合的，则是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宗派主义者不把老干部看作党的宝贵的资本，大批地打击、处罚和撤换中央和地方一切同他们气味不相投的、不愿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有工作经验并联系群众的老干部。他们也不给新干部以正确的教育，不严肃地对待提拔新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的工作，而是轻率地提拔一切同他们气味相投的、只知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缺乏工作经验、不联系群众的新干部和外来干部，来代替中央和地方的老干部。这样，他们既打击了老干部，又损害了新干部。许多地区，更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纠缠在一起，使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处理而被诬害，造成了党内极可痛心的损失。这种宗派主

义的错误，使党内发生了上下脱节和其他许多不正常现象，极大地削弱了党。”《决议》还说，“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此宣布：对于一切被错误路线所错误处罚了的同志，应该根据情形，撤销这种处分或其错误部分。一切经过调查确系因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恢复党籍，并受到同志的纪念。”对于给我的错误处分，虽然没有具体撤销，但是，遵义会议前夕，给我分配了工作，我认为党已经给我平反了。

虽然我离开了工作岗位，但最使我耽心的还是当时的战局。广昌战役实际上已经宣告了“左”倾错误的军事路线的破产，但当时的领导人并没有吸取教训，而是继续采取战略上的消极防御，连打了几场阵地防御消耗战。敌人依仗堡垒逐步推进，我军则节节抗击，步步后退，始终摆脱不了被动的局面，没有一天不丢阵地，没有一天不打败仗。红军的兵力和弹药一天天消耗，根据地一天天缩小。到9月下旬，中央苏区只剩下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这时，如果按毛泽东等同志的意见，趁敌人尚不敢长驱直入之机，我军迅速进行休整补充，突破敌人的包围圈，以主力向湖南东部推进，或再组织东方军闯入闽北、赣东北地区，调动进入中央苏区的敌人，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找战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可能还会使战局发生转机。但博古、李德等人已为敌人所吓倒，仍然听不得不同意见，慌忙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先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后是防守中的保守主义，继而是退却中的逃跑主义，这就是“左”倾错误的领导者们，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导演的三部曲。

博古、李德等人，完全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无

视红军在前几次反“围剿”战争中的成功经验和战略战术原则，将外国的经验机械地搬到红军中来。他们指挥打仗，不考虑兵力状况、部队的情绪、地形地物等因素，而是根据地图作判断、下命令。他们片面地强调正规化，取消了正规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的体制，将大批地方部队升为正规军；在补充兵员上不是以加强有战斗力的老部队为主，而是建立新部队，搞花架子，不务实，结果使新老部队都受到损失。他们把红军的打仗、筹款、作群众工作三大任务变成只单纯地打仗，表面看来是加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实际上破坏了部队的战斗力，破坏了军队和地方的关系。他们强调阵地战、正规战，反对游击战、运动战，结果使红军来了一场大运动和大游击——二万五千里长征。军事路线是政治路线的必然反映，在错误路线指导下，尽管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战斗，流血牺牲，给了敌人以重大杀伤；尽管苏区人民在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下，积极参军参战，竭尽全力支援了战争，但第五次反“围剿”还是失败了。中国革命进入了最危急、最严峻的关头。

漫漫长征路

别了，中央苏区

10月，正是南方的金秋季节，天高气爽，果馥花香。在正常的年景，人们享受着收获的喜悦，耕耘着新的希望。但是，1934年的10月，在中央根据地，却笼罩着一片忧郁沉闷的气氛。随着几场防御战的失利，数十万敌军向根据地中心区域压过来，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到了最后关头，突围转移，已成为既定事实。但是，往哪里走，如何走？红军指战员心中疑团密布，又无从打听。根据中央决定，中革军委10月7日下令，由地方兵团接替各线主力红军的防御任务，先后将第一军团、第三军团、第八军团、第九军团和第五军团从阵地上撤下来，向瑞金、于都、会昌地区集结。在这以前，我被撤销职务之后，已到红三军团军事裁判所。裁判所所长由军团组织部部长吴溉之同志兼任，我们是老相识了。我人到后方，心却留在前方，加上受到不明不白的错误处分，心情忧郁，不久，患上了疟疾。在病中，我想了很多。1928年的这个时候，在井冈山上，我也患过一场疟疾。那时，红军队伍比现在小得多，根据地面积也小得多，生活很艰苦，但我的心情是愉快的。为什么呢？我想，最关键的

是，当时的政治路线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为广大干部战士所理解，所拥护，党内的民主空气又比较浓厚，上下一心，团结一致，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

红三军团军事裁判所奉命于10月14日从于都出发。出发的那天下午，我和吴溉之同志一起去他的警卫员彭同志家辞行。彭的父母、妹妹等得知红军要走了，都痛哭起来。我们也流了眼泪，无法用语言安慰这些为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的苏区人民。他们无私地支援了战争，献出了粮食、布匹，献出了最优秀的子弟，他们淳朴、善良、勇敢，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国共产党人，同红军紧紧地联在一起。多好的人民啊！

傍晚，部队跨过于都河，迈出长征的第一步。寒风潇潇，战马哀鸣，河水在浮桥下默默地流淌着，残阳斜照在河面上，更增添了几分凄凉。我们的心情异常沉重，一步三回头地凝望着根据地的山山水水，阵阵失家之痛袭上心来。送行的人们脸上挂着泪水，有的不禁失声大哭。以往，部队出征时，也会有乡亲们扶老携幼相送，但这样悲壮的场面是从来没有过的。红军走了，乡亲们就失去了主心骨，等待他们的，将是敌人的疯狂蹂躏和压榨。虽然上级强调，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但我们知道，在这种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是很少有可能的。这时，我患疟疾刚愈，身体虚弱，背着一床毯子，一条干粮袋，一个挂包和一把雨伞，浑身无力，步履踉跄，心中只有一个信念，跟上部队，跟上革命，就是胜利。

重新工作

中央红军以红一军团为左路前卫，红三军团为右路前

卫，红九军团掩护左翼，红八军团掩护右翼，中央和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担任后卫，8万多人，携带大量笨重的物资器材，包括石印机、印钞票的机器等，作大搬家式的转移，行动十分缓慢，不时遇到敌人阻击，我军不敢恋战，正如毛主席形容的是“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部队先行南下，然后沿着赣粤边界西进，没有经过大的战斗，就冲破了蒋介石设置的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这时已是1934年的11月了。一天，部队在宁远境内宿营，这里离我的家乡只有百把里路。第二天早上，吴溉之同志告诉我，他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开小差回家了。我苦笑了一声，对他说：“吴溉之同志，你放心吧！我绝不会开小差，就是死，也不离开部队。”说心里话，我何尝不想回家看看父母呢？但不能开小差回家呀。我最后一次离别家乡是1926年，到现在已快9年了，家里人一直不知我的下落。大革命失败后，许多人跑回家，不是丢了脑袋，就是忍气吞声地做顺民，还有少数人当了叛徒。那时，我都没有回家，现在叫我走，我也不会走的。离开党、离开红军，就没有出路。再说，我是出来革命的，革命不成功，也无颜见家乡父老。一直又过了30年，在全国解放后，1965年，我才回到家乡，可惜父母早就不在人世了。

部队进入湘南山区后，毛泽东同志曾建议，停下来，背靠广东与陈济棠建立统一战线，搞根据地。这时，围追堵截红军的敌军兵力虽有25个师之多，但他们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只有湘军因涉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而积极行动。位于我军右侧和后方的蒋介石嫡系薛岳、周浑元两个纵队行动迟缓，他们想趁我军与湘军作战大大消耗之后再坐收渔人之利，既可以消灭红军，又可以削弱地方军阀。两广部队只在

其边境防堵，既防红军，又防中央军，并不主动进攻我军。从宜章到湘江间的广大地区，敌军防御力量薄弱，又属无堡垒区域，便于我军机动作战。我军如乘各路敌军调动调整，薛、周两部尚未靠拢之际，寻机歼敌一路或一部，战局必将会出现有利于我的变化。但博古、李德等人却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他们惊慌失措，一味退却逃跑，只把希望寄托在过湘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上。1934年11月底，一部分红军部队渡过湘江，控制了渡口，随之掩护中央机关和其他部队渡江。敌军在飞机支援下，向湘江两岸我军发动全面进攻，企图夺回渡河点，在湘江两岸围歼我军。战斗异常激烈，我指战员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和凶猛的火力，浴血奋战，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掩护党中央、中革军委和直属机关在界首过江。但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红三军团六师第十八团被阻于湘江东岸，被敌8个师包围，几经冲杀突围，战至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

蒋介石发觉了我军入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在去湘西的路上布署重兵堵截。此时我军经过两个月的长途行军和艰苦战斗，人员减半，极度疲劳，战斗力大为减弱。如按原计划行动，势必同五六倍于我的敌人作战，可能招致全军覆灭。这时，毛泽东同志力主放弃北出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12月28日，党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到会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在这次会议上，党中央作出了创建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的决定。部队在黎平休整了3天，便迅速前进。毛主席有发言权了，我们这些受错误路线打击的人，也逐渐得到了“赦免”。在强渡乌江的前夕，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罗荣桓同志找我谈话，恢

复我的工作，让我担任三军团直属队政治处主任，并要我先去指挥工兵连架桥。我并不了解党中央黎平会议的情况，有点赌气地对他说，我不是犯了错误受了处分吗？怎么能再指挥部队呢？罗荣桓同志说，现在让你工作了，不要再发牢骚，执行命令吧！这样，我又重新工作了。我想，我的问题是一下子解决不了的，现在又不是解决问题的时候，还是先工作再说。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突破乌江后，红军占领遵义，党中央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集中解决军事问题，批评了“左”倾错误的领导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战略战术错误，一些曾积极执行错误路线的同志觉醒过来，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和军事指挥权威。遵义会议时，我们三军团驻在澜板凳地区，听到遵义会议的消息，我是非常高兴的。经过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通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我深深地体会到，有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红军就有胜利的希望。绝大多数红军指战员也对遵义会议感到欢欣鼓舞。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看问题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准备过长江去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建立新的根据地，在土城与四川军阀部队激战，原来预计敌人是4个团，战斗打响后，发现敌人是9个团，为了避免损失，红军主动撤离战斗。有的人就议论开了，说原来的中央没有错误，如果有错误，大家都有份；现在换了人指挥，土城战斗打不好，还是不行嘛。毛主席召集了团以上的干部会议，我

也参加了。在会上，毛主席毫不客气地说，原来的中央就是有错误，并指出，是博古等同志犯了错误。他还说，对原来中央的错误领导，我是没有责任的。在毛主席义正辞严的坦诚面前，这些人相反没有什么话说了。毛主席就是这样，对工作中的失误，他不文过饰非，不推卸责任，但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他是不让步的。这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他在全党全军中的崇高威望，不是平平安安产生的，它是革命斗争实践的产物，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

土城战斗后，红军转移到扎西地区，红三军团进行了整编，取消师部，编足4个团，即十、十一、十二、十三团。我仍任军团直属队政治处主任。

红军在毛泽东同志指挥下，改变了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计划，丢掉了沉重的包袱，轻装前进，在10多万敌人包围的重兵集团之间，声东击西，大踏步进退，机动作战，不断调动敌人，逐渐地由被动变为主动。四渡赤水，再克遵义。2月27日，在澜板凳、刀把水地区一战，消灭敌九十三师大部，五十九师一部，俘敌5000余人。这是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全军指战员情绪高涨起来。然后挥师直逼贵阳，杀得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手忙脚乱，不得不调出滇军“保驾”，敞开了云南大门。我又向昆明虚晃一枪，将云南之敌调动到昆明附近，我主力部队向金沙江急进。1935年5月，胜利地渡过金沙江，进入会理地区休息，把长征以来一直尾追我们的蒋介石部队甩掉了。在穿过四川大凉山彝族区后，英勇的红军飞渡大渡河，通过天全、芦山地区，6月，来到壮丽雄伟、令人惊心动魄的大雪山夹金山下。

万水千山只等闲

部队在天全、芦山稍事停留，作了翻越夹金山的准备。雪山上气候异常寒冷，我们将所有的衣服都穿上了。我穿了件破棉衣，带了些辣椒，拄着一根木棍往山上走。越近山顶空气越稀薄，感到头晕胸闷，喘不过气来。一路上，不少战士气单力薄、饥寒交迫，倒在雪地上再也没有起来。我走到山下，见到毛主席一行人正在一间小屋旁休息，有人喊着我在红四军和闽西时的职务说，“哟！秘书长也过来了”。毛主席朝我笑了笑，我高兴地说，主席，你好。我觉得，离开江西以来，由于生病和对红军前途的担忧，毛主席瘦了，但他仍然是那样刚毅和充满信心。遵义会议后，他又可以得心应手地指挥红军了，并且几度挫败了蒋介石围歼红军的企图，从敌人的重兵包围中跳了出来，他更显得心情愉快，精神饱满。

翻越夹金山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两方战友欢呼雀跃，互相庆贺。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集中主力北上，首先取得甘肃南部，创造川陕甘根据地。两军共同前进，翻越了几座大雪山，到达松潘附近的毛儿盖地区。在毛儿盖，中央政治局又举行了会议，再次确定了北上的方针。会后，将一、四方面军合编为左、右两路军，继续北上。我们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一部分作为右路军随毛泽东同志以及党中央机关一起前进。

出了毛儿盖后，便进入了草地。过草地是长征中最艰苦的一段。“天苍苍、野茫茫”，一望无际的沼泽地，杳无人

烟。无盐，缺粮，寒冷，疾病，一齐向我们袭来。行军中，一不小心就会陷入没顶的河沼之中，无踪无影。许多同志就牺牲在草地上，莽莽荒原埋忠骨。马匹也倒了不少，我的马也无例外的倒在沼泽里。饲养员蔡同志舍不得那套皮制的鞍子，他把鞍子解下来背着行军。晚上宿营时，难找一块干燥平坦的地方。第一天，下着雨，冷得叫人发抖，我和吴溉之同志找了个草墩子，打着伞，背靠背地坐在上面坐了一夜。第二天，情况好些了，我们走到了草地与山交界处，地上有些灌木，大家便在树旁宿营，同志们围着篝火，地当床，天当被。草地上完全找不到粮食，开始时，还有干粮，到后来，就只能吃野菜草根了。草地是对红军指战员超乎常人意志的考验，实践证明，我们共产党人，红军战士，不愧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英勇的红军战士，凭着钢铁般的意志，坚定不移的信念，发挥团结友爱的精神，互相搀扶，互相激励，多数同志终于走过来了。

出草地后，经斑佑到巴西，筹集到一些粮食、糖萝卜、蚕豆等，等待左路军的到来。但张国焘却擅自改变中央原来的决定，拒不接受命令，他竟电令陈昌浩带右路军南下，甚至依仗人多枪多，要用武力挟持中央。毛主席带着中央的同志连夜赶到三军团驻地巴西。三军团参谋长肖劲光同志向我们说明了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阴谋。彭德怀同志立即命令十二团加强警戒，这时陈昌浩奉张国焘之令要派一个团来堵我们，被徐向前同志阻止了，避免了一场内部残杀。第二天，张国焘电令红大校长李特带领红四方面军的红大人员南下。彭德怀同志不同意他们走，但毛主席决定，让他们走，他还要到红大去讲话。彭德怀说，要去，我陪你去。他是担心毛主席的安危。毛主席对红大的四方面军的同志讲了话，大意

是，捆绑不能成夫妻，现在张国焘命令你们南下，你们还是要服从他的命令，但中央关于北上的决定是正确的，我相信，你们以后还会北上的。我们的方向是一致的，只不过是先走一步，希望你们跟上来。四方面军的同志走了。对这件事的处理，表现了毛主席高超的领导艺术。彭德怀同志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是站在毛泽东同志正确领导一边的。

我们很快地通过山口，继续北上。到俄界休息一天，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紧急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红军北上的任务和到达甘肃后的方针，并确定将北上红军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俄界，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要我去十三团工作，于是，我到十三团任政治处主任，团长是陈赓同志，政委是张爱萍同志。

红军离开俄界继续北上，到达腊子口，敌人利用天险企图阻住我们，我军由红四团担任主攻，十三团作预备队，一举夺取天险腊子口，迅速越过岷山，乘势占领哈达铺。在哈达铺，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同志任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任政治委员。一军团编为第一纵队，三军团编为第二纵队，军委纵队编为第三纵队。十三团改为第十三大队，归第一纵队指挥。

红一方面军长征经过的最后一座山是六盘山。翻越六盘山后，毛泽东同志写下了《清平乐·六盘山》一词，这是一首充满着革命浪漫主义和乐观主义的气势磅礴的壮丽诗篇。1986年9月，我从新疆到宁夏，曾到六盘山上旧地重游，再一次领略了当年“红旗漫卷西风”的英勇气概，看到六盘山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把山区装点得更加绚丽多彩，郁郁葱葱，心情十分高兴，回北京后，我写下了“重行长征路，再登六盘

山”10个字，送给军事博物馆，作为对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的纪念。

1935年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陕甘苏区边缘的吴起镇，击溃了尾追而来的敌人骑兵马鸿逵部。毛泽东同志高兴地写下了赞扬彭德怀同志指挥这次战斗胜利的诗句：“山高路远沟深，骑兵任你纵横，谁敢横枪勒马，惟我彭大将军。”党中央在吴起镇举行了扩大会议，会议指出，党中央和陕甘支队已经“完结一年长途行军，开始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会议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的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在一年的长征中，红军纵横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战胜了强大敌人的围追堵截，克服了无数说不尽的艰难险阻，付出了数万将士的鲜血生命，终于完成了战略转移，从危亡中走过来，开始了新的斗争。红军出发时的8.6万多人，到吴起镇只剩下不到1万人。

在吴起镇，中央召开了一次团以上的干部大会，毛主席讲了话，他看着我们这些衣衫褴褛、憔悴疲惫的干部，流下了热泪。他说，我们丢掉了中央根据地，牺牲了许多好同志，遭到了大的失败，但到了陕北，毕竟还是胜利了。我们的队伍虽然减少了许多人，但是更精干、更坚强了，走过来的同志，经过千锤百炼，都是革命的种子。我们的事业是伟大的，前途是光明的，现在要从头做起。同志们一不要悲观，二不要讲什么价钱，老老实实服从党的安排，把工作做好。他还说，朱总司令在那边，今天有电报来，他还好，请大家放心，但他在那里过的是什么日子，你们想想就知道了。我从1928年上井冈山同毛主席在一起，这是第一次见他流泪，他流的是对丢失了根据地的痛惜之泪，对牺牲了的同志的悲伤之泪，对“左”倾错误路线和张国焘分裂红军行为的愤慨

之泪。陕北的秋天，干冷干冷的，阵阵秋风卷起黄沙扑面而来，身着单衣的我们，不觉地有些发颤。但是，毛主席的话，却如春风抹去了我们脸上的愁云，似雨露滋润了我们久旱的心田。他那清瘦的面颊，单薄的身影，有力的手势，刚毅凝重的声音，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中。

战斗在陕甘边区

关 中 游 击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在吴起镇进行几天休息以后，经保安东进，在甘泉附近与红十五军团会合。党中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同志任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任政治委员，原红一、三军团合编为第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张爱萍同志和我调到红一军团政治部任巡视员。不久，我又调到中央军委警卫团任政治委员，团长是王秉璋同志。

红军在陕北胜利会师后，蒋介石急调军队“进剿”。11月，在直罗镇，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团结一致，协同作战，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这次战役的胜利，打破了蒋介石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进剿”，巩固了陕甘苏区，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直罗镇战役后，毛主席找我和王秉璋谈话，他说，警卫团不是你们的久留之地，还是到战斗部队去吧。这样，我便调到关中特区任军事部长、军分区司令员。

关中特区和军分区分别归陕甘省委、陕甘军区领导。当时，陕甘根据地建立了两个省委，即陕西省委和陕甘省委。

陕西省委书记是郭洪涛，陕甘省委书记是李富春。肖劲光任陕甘军区司令员。关中特委书记先是鲁笨，后是贾拓夫，关中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是张邦英。

1936年上半年，红一方面主力按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组织抗日先锋队，东渡黄河向晋绥作战。我地方部队的任务是反敌人的“进剿”，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关中军分区的主力部队有一个团（关中红一团）和两个独立营。敌人“进剿”的部队多达9个师。特委和特区苏维埃政府也随我们一起行动。我们的主要活动地区是子午岭南面，子午岭以北曾是刘志丹同志率领游击队活动的地区。这一带，老百姓称为梢山，山上没有什么乔木，尽是带刺的灌木，一人多高，马和人根本钻不进去，只有一条羊肠小路可以登山。我们采取井冈山的老办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一次，敌人2个师沿子午岭山沟向东前进，我们就在旁边的山头上，甚至可以听到敌人行军的脚步声，我赶快带着队伍隐蔽离开。后来，周恩来同志批评我说，不该把部队带到离敌人主力这样近的地方。还有一次，部队在耀县照金镇北30里的地方宿营，敌人一个师进到照金镇，我带着一个骑兵连驻在离主力部队红一团五里地的一个村子里。这一天从早到晚下着大雪，地上积雪有一尺多厚。如果等到天亮，敌人一出发，很快就会发现红一团。敌人是东北军的正规师，又有骑兵，红一团的武器装备较敌人差得多。我一次又一次地派通讯员去红一团送信，天黑雪深，路不好走，身边的通讯员都派光了。独立营边营长奉命赶来，我让他们天亮后牵制敌人，掩护红一团撤退。边营长说，他们是本地人，地形熟，群众也熟，一定能拖住敌人。可是，我一直得不到红一团的_{消息}，心里十分焦急。贾拓夫、张邦英等同志都睡着了，我

坐着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不知不觉地把老边送给我的一条宝塔烟^①都抽完了。天快亮时，特委和政府机关先走，撤到同官县境内。他们出发后，红一团也赶到了，我心里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于是，我带着部队赶去与特委机关会合。

红一方面军主力经过75天的东征作战，撤回陕甘地区。不久，我调任红二十八军政治部主任，军长是宋时轮，政委宋任穷，政治部副主任伍晋南，关中红一团也编入红二十八军。这个军是由原刘志丹部编成的。当时，中央考虑，准备派一些部队打到外线去，建立新的根据地，初步拟定红二十八军去陕南汉中、湖北襄阳、河南桐柏山区和川鄂边大小巴山山区创建根据地，力图恢复通南巴地区原红四方面军的根据地。毛主席要我同博古、林彪分别商量调配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后来，由于西北地区形势的发展和变化，这一计划搁置下来。

统一战线的新局面

1936年，党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用大量精力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占领了东三省，并将魔爪伸进华北地区，大有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占领全中国的意图。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下降到次要地位。我们党看到了国内形势的新变化，采取了一系列步骤，力图挽救民族的危亡。早在1933年1月，我党便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宣言，宣布在停止进攻苏区、保

^① 一盒10支。

障人民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的条件下，中国工农红军愿与任何武装订立对日作战协定，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还与福建、广东一些部队进行了接触，达成过一些抗日的协议。但是，王明路线统治的党中央，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实行关门主义的错误政策，使这一工作受到了干扰和影响。长征途中，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倡议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号召全国同胞总动员，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红军到陕北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又被放到了极其重要的地位。1935年12月，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会后，毛泽东同志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科学地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政策。红军东征途中，又发布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华北和蒋介石、阎锡山媚外卖国的行径，宣布了先锋军东征的目的是准备对日作战，实行保护爱国运动、保护革命人民、保护工农利益、保护知识分子、保护民族工商业等政策，并向全国人民再一次发出了停止一切内战、一致对外的号召。1936年5月5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开始放弃“反蒋”口号，并向南京政府提出，“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之具体办法”。党中央还多次派人去国民党统治区利用各种关系、各种形式宣传我党的以上主张。但是，蒋介石不顾日寇侵略造成的严重民族危机，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企图以武力消灭我党我军，并着

手成立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以陈诚为总指挥，调集了16个师零3个旅，准备对陕甘苏区发动新的“进剿”。面对着严峻的形势，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坚持以民族大局为重，一方面作好了红军粉碎敌人“进剿”的军事准备，另一方面广泛开展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毛泽东同志亲自给许多国民党要人和知名人士写信，呼吁他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同我党合作抗日，党中央和红军的其他领导同志也分别向国民党各派军队的高级将领致函或派代表商谈。党中央特别加强了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周恩来同志与东北军领导人张学良举行了会谈，达成联合抗日的协议。经过这些努力，国民党军，特别是东北军、西北军的许多中高级军官逐渐同情以至接受了我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我军在战场上，尽量避免同我军有关系的国民党军队作战，并根据敌军的政治态度，分别采取散发传单、宣传品，战前喊话，战场联欢和互相慰问等形式，开展统战活动。这样，我军同这些国民党军队之间的矛盾有所缓和，从而得以集中力量打击坚决反共的敌军胡宗南部。

我党统战工作的重点放在东北军身上，他们大都是东北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他们的家乡，蒋介石的卖国政策使他们不放一枪撤到关内，遭到全国人民的怨恨，因而他们对日本帝国主义怀有强烈的民族仇恨，对蒋介石抱有极大的不满情绪，时刻都想着打回老家去。他们到陕甘与红军作战，又受到重大打击，损失兵员补不上，番号被取消，深感与红军为敌没有出路。我们党因势利导，适时开展了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1936年6月，我奉命率红一团掩护叶剑英、李克农等同志去延安前线，随行的还有危拱之同志带的一个剧团。我们住在安塞附近，白天与东北军对阵，按预先的约

定，互不伤害。晚上，东北军给我们送军需用品。我们也与东北军搞阵前联欢，宣传队经常去东北军进行慰问演出。由于我们党的正确政策，我们与东北军、西北军变成了友军。可以说，山城堡战斗大捷，粉碎国民党胡宗南部的进攻，是与我党坚决执行对东北军、西北军的正确方针分不开的；后来，“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更显示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意义，从而开始了国共两党重新合作、一致抗日的新局面。

打土围子

在安塞附近搞了一段统战工作之后，1936年秋，周恩来副主席命令我们去安定接替红三十军的防务。红三十军军长阎红彦，政委蔡树藩，他们原是守卫瓦窑堡的部队，国民党蒋介石的部队占领了瓦窑堡，党中央机关撤到保安，红三十军奉命北撤，命令我们驻防安定。驻安定一段时间后，又接军委命令，由白志文任司令，我任政委，组织部队去打“土围子”。

在保安西南四五十里有个旦八寨子，有200户人家，是地主豪绅曹俊章的老家，他自兼民团团总，有反动武装百多人，长期盘据该寨，反共反人民。该寨建在一个山坡上，背后是几十丈高的陡壁悬崖，寨前有一条河，红军多次攻打，未能打下。我接到攻打旦八寨子的命令后，先到保安，见到了毛主席，他热情地接待了我，并特别关怀地说，这半年打游击，很辛苦了，他还送我几条烟。我又到周副主席处借了望远镜。我去旦八寨子观察地形后，向周副主席报告，那里

的地形太险要，强攻是不行的，我们拟控制其寨门，不让敌人出来取水，予以长期围困，敌人自然会垮台。周副主席同意我们的布置。我们控制水源之后，敌人恐慌了。我们又向寨子喊话，让老百姓跑出来。敌人被围困实在没有办法，提出以团总的儿子为人质，换几桶水。我同意了，并趁此机会同白志文同志一起进了寨子。由于团总的儿子在我们手中，见面时，他们还表现老实。东北军有一个副官驻在寨子里，我同他聊天，他讲了一些对蒋介石不满的话。这时，白志文同志即到寨子四周去察看地形。中午，团总招待我们吃饭。当晚，敌人趁我们久围不备跑掉了，旦八寨子也就解放了。

打旦八寨子这件事，后来，在1945年，毛泽东同志所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中曾提到过，他说：“一九三六年，我们住在保安。离保安四五十里的地方有个地主豪绅的土围子。那时候党中央的所在地就在保安，政治影响可谓大矣，可是那个土围子里的反革命就是死不投降。我们在南面扫、北面扫，都不行，后来把扫帚搞到里面去扫，他才说：‘啊哟！我不干了’。”毛主席以此事例来说明，“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毛主席的这段话，指引我们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推倒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在社会主义革命，以至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斗争中，它仍然是我们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七·七事变”前后

接收延安

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实行“兵谏”，扣留了蒋介石，通电全国，要求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西安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强大感召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发展的结果。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关头，亡国大祸迫在眉睫。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及其部属出于爱国热忱，尤其是在其被蒋介石驱使参加“剿共”战争中，接连受到红军的沉重打击，深感反共没有出路；同时，我党对东北军、西北军的广大官兵耐心地进行了团结抗日的统战工作，东北军、西北军同我军达成了共同抗日的协定，形成了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联合抗日的大好趋势。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日益扩大的侵略，蒋介石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全力“进剿”红军，残酷镇压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12月，蒋介石亲临西安坐镇，并调遣大批嫡系部队入陕，监视张学良、杨虎城两部，威逼东北军、西北军全部开赴陕甘前线对

红军作战，否则即将其两部调离西北。张、杨两将军几次向蒋介石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要求，蒋不仅不采纳，反而将张、杨的争谏斥之为“反上作乱”。张、杨进谏无效，调离西北又不免为蒋军吃掉，在此情况下，张、杨被逼上梁山，发动了兵谏。

我是在第二天，13日傍晚听到“西安事变”消息的。那时，我驻在保安，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同志找到我，说周恩来副主席有要事找我，我即同他一起赶到周恩来同志住处。周恩来同志见到我，很高兴地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昨天，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抓起来了，为了防备蒋军向他们进攻，东北军、西北军要向西安周围收缩兵力，现在他们要求我们去延安接防。周恩来同志问我，现在手下有多少兵力？当时，我刚带兵打下旦八寨子，部队还在那里休整。周恩来同志指示我，不要等旦八寨子的部队了，即带张国焘的手枪连出发，到安塞附近找陕北红一团，这一带的部队全部归你指挥，迅速接收延安。我听说捉住了蒋介石，高兴极了，想起1933年在江西第四次反“围剿”中，蒋介石由南昌到前线视察，红三军团命令我和杜中美同志组织突击队捉蒋，正待出发，蒋介石已经离开，真是一大憾事。这次，张、杨二将军活捉了蒋介石，怎能不激动欢欣。周恩来同志对我又作了一些叮嘱，要我准备一下，马上出发。我喜不自禁地说，我的马还没回来，怎么“马上”走？

我兴冲冲地回到驻地，略作安排，即刻动身。到安塞，向陕北红一团黄罗斌团长、钟辉政委交代了任务，带领着红一团向延安前进。15日，到延安北门时，城内哥老会派人来送信，他们同我部李仲英有联系，说城内还有国民党地方部队。为了避免误会，引起冲突，我即让部队在北门外宿营。

第二天，16日上午，周恩来同志一行人来到我们驻地，他们原以为我们已经接收了延安城防，由杜甫川（俗称豆腐川）那边过来，拟从延安南门进城，见到城门仍有国民党兵把守，就转绕到北门来。这时，我才得知周恩来同志是去西安处理“西安事变”的，随同前去西安的杜理卿同志还对我说，周副主席在保安时忘了对你交代一件事，张、杨派飞机到延安来接他，怕你因不了解情况，把飞机打下来，为此，他一夜没睡好。其实，在我们到延安北门以前，飞机早就到了。周恩来同志在这里未作停留，即由我们护送去了机场。刘鼎同志已在机场等候，他是由西安专程来迎接的代表。随同去西安的还有罗瑞卿、李克农等同志。欧阳钦、曾三等同志本亦随去的，由于飞机小，乘坐不下，留了下来。

国民党派任延安县（当时称为肤施县）的高县长也来送行。飞机起飞后，他邀请我们进城晚餐。饭未用完，李仲英同志示意我出来，说有人送信，国民党反共分子绥德专员在城里，带着百把人，要防备他趁吃饭时捣乱。我即同黄罗斌、钟辉、李仲英等借故离去，由东门出城，下延河河坎，顺河坎回北门外驻地。

连夜，我与参谋长陈友才商议接收延安的方案，他原是周副主席那里的参谋，为执行这次任务派来当参谋长的。我们决定，如果明天城内国民党地方部队仍不撤退，即武力强占。当晚，我派一部分部队占领东门外的清凉山，一部分部队占领南门外的宝塔山。天亮后，发现城内军队已全部撤走，我们即从北门入城。

根据军委命令，成立了延安城防司令部，白志文同志任司令员，我任政治委员，在白志文同志未到职前，由我代理司令员之职。不久，杨虎城从省里又派来一位新县长，名马

豫章。城内工商各界还组织了维持会，为我军筹粮筹款。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欧阳钦等同志草拟了一个安民告示，宣布我党我军的政策。当时，延安四乡的一些地主豪绅和上层人士因不了解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早已迁入城内。我们宣布，农民武装进城抓土豪劣绅的，必须经城防司令部批准，不能擅自进城抓人和没收商店、作坊，以维持秩序安定。

红军接收延安一事，还有另一传说：延安城是红军打进去，从国民党手里夺过来的；还说，某某是第一个攻进延安城的。这些说法，不是事实。早在此之前，红军已同东北军、西北军达成共同抗日的协定，而且此时正值周恩来副主席代表共产党中央去西安与张、杨二将军共同处理“西安事变”之际，红军怎么会用武力进攻延安呢？如果使用武力进占友军之地，不是破坏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吗？打进延安的说法，显然是无道理的。我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有责任把这段事实说清楚。

“西安事变”如何解决？对蒋介石是杀是关是放？对中国革命和抗日的前途影响又将如何？这一连串问题，大家都萦萦于怀。开始，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我不理解，只是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和对蒋介石的深仇大恨，回想起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叛变，接着反共、“剿共”10年，屠杀了千千万万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对日寇侵略又采取投降卖国的不抵抗政策，不杀此独夫民贼，怎能解民怨，平民愤！现在追忆起来，这种思想多么幼稚近视，党中央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高瞻远瞩，主张“西安事变”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南京政府联合抗日，以避免更大规模的内战，促使国内和平和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早日实现。周恩来同志根据党中央的这一方针，对张学良、杨虎城和东北

军、西北军高级将领作耐心细致的工作，参加了同蒋方代表的谈判，终于达成了停止内战，联合红军抗战，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改组国民政府，释放政治犯等十项协议，“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从此，中国的政治局面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胜利，使我也从中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在“抗大”

1937年初，国内的政治局势正处在全面抗战即将爆发的前夕。由于我党坚持抗日，并成功地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我党的威信在全国人民中间迅速提高，广大人民群众把领导抗战的希望寄托在我们党和红军身上。1937年2月10日，在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向国民党提出了团结抗战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要求国民党：（1）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2）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3）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界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4）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5）改善人民生活。国民党如能将此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保证实行，共产党保证：（1）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计划；（2）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3）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4）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五项要求”和“四

项保证”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步骤，是一个重大的有原则的让步。电文发表后，立即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并推动了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反对亲日派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策和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下，蒋介石国民党不得不改变它的政策，国民党三中全会确定了和平统一等原则，并接受了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后来，“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国抗战开始，蒋介石终于被迫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共两党正式宣告重新合作。

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迎接全面抗日战争高潮的到来，1937年春，党中央决定，积极培养大批干部，把于1936年创办的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并将抗大校部由保安县迁到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同时，积极筹办陕北公学，更多地接纳、培养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

1937年2、3月间，按照毛泽东同志和中央的指示，我也进入抗大学习，延安城防司令部的工作由边章武同志接替。

入抗大学习还有一段插曲。我代理延安城防司令不久，有人向中央告状，说我不让农民武装擅自进城抓人，是右倾，是压制农民革命，还有人说我搞“山头主义”等等。对这些指责，我是不能接受的。对土地革命应当全力支持，但是农民武装进城随便抓人，是有历史教训的，1930年红军打下长沙后，四乡农民入城抓斗土豪劣绅，不听指挥，乱没收，乱抓人，出了不少乱子。我们正是基于经验教训，才作出不让农民武装擅自进城抓人的决定的。何况我们刚接收延安，谁是土豪劣绅，谁是一般地主，谁又是维护抗日的开明人士，情况尚不明了。为了正确执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团

结更多的人一致抗日，也必须严加掌握，区别对待。至于所谓搞“山头主义”，我更是思想不通。直罗镇战役后，我就到地方作军事工作，一年多来从未想过搞什么“山头”，也不知什么“宗派”。为此，我给叶剑英同志写信，问何为“山头主义”？我是什么主义？毛泽东同志知道了这件事，在保安给我写信，对我的工作给予了肯定的表示，还说相信我是为苏维埃而奋斗到底的。我读了毛主席的信，感到格外激动高兴，抛弃了所谓“山头主义”这个不切实之词的帽子。党中央搬来延安后，在张闻天同志住的窑洞里又开过一次会，张闻天、毛泽东、王观澜、李坚贞、刘英等同志参加了会，对我担任延安城防司令期间的工作作了肯定，并提出批评意见，我实事求是地对告状的问题作了说明，检讨了工作方式上的不当。会上，毛泽东同志也发言肯定了我工作积极，批评了我工作上的缺点，最后建议我去抗大学习。张闻天同志也同意了。我参加革命以后，一直没有机会系统地学习，在实践中深感自己知识不广，知之不多，有一个学习机会，当然十分高兴。

抗大校长是林彪，副校长是刘伯承，教育长罗瑞卿。为了加强学校的教育和建设，中央还决定成立了抗大教育委员会，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同志亲自兼任教育委员会主席。

我们这一期在1月20日开学，我晚到了一段时间。这一期学习的红军干部编成8个队，第一、二、三、四队大多数是红军的军、师、团干部，我分在第一队，队长是陈赓同志，党支部书记张际春同志。后来，我又到四队任队长，在四队工作的还有军事教员韩振纪同志，政治教员是一位姓杨的同志。

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全国各地的革命知识青

年，尤其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平津等大城市的学生和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先进分子，大批来到延安。我们这一期又先后成立了第九至十四队。

抗大的学习、生活是艰苦、紧张而愉快的，充满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不论以前担任什么职务，到抗大就都是学员，一律平等，同样住土屋、窑洞，睡土炕，吃饭以小米、杂粮为主。对于我们这些经过长征艰苦生活的红军干部来说，这样的生活是很不错的了。在学习上，由于学员出身经历不同，有的同志大学毕业，有的连学校门都没有进过，有些同志学习起来很吃力，笔记也记不下来；对军事课，有些同志身经百战，军事知识比较丰富，理解就更快更深一些，而战斗经验少的同志就感到困难一些。党支部组织大家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并经常出墙报，交流学习经验，表扬先进，勉励后进。我记得，我们队有一学员叫何畏，广东人，原是军长，学习不努力，生活上也散漫，大家都帮助他，陈赓同志也很关心他，晚上还帮他打洗脚水，耐心作他的思想工作。但此人思想意识不好，最后还是逃跑了。学校的文娱生活也很活跃，每当黄昏，夕阳辉映着宝塔，延河岸边到处都是抗大的学生，有的散步，有的在漫谈，有的在嬉戏，阵阵歌声在延安上空回荡：“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学校有个球场，课余时间，球场上总是很热闹的，朱总司令常到这里来，他平易近人，大家都喜欢和他在一起玩球。每星期全校学员集中出一次操，地点在飞机场。机场离学校有几里路，各队喊着口令向操场前进。到操场后，由值勤队长喊口令，整理队伍。我就怕当值勤队长，因为我嗓音小，口令喊不好。第三队队长谭希林同志的口令喊

得好，他是受过军校正规训练的。

1937年3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延安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系统地分析了张国焘错误的性质、根源和危害，号召第四方面军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作坚决斗争。抗大各队根据《决定》精神，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上，联系历史实际和亲身经历，运用回忆、对比的方法，通过小组讨论、大会发言等形式，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我们这一期学员中汇集了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及西北红军的干部，不论哪一方面军的同志都敞开思想，各抒己见，摆事实，讲道理，讨论热烈。通过对“懋功会师后南下正确还是北上正确？”等具体问题的分析，联系对比第一方面军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正确领导下坚决北上抗日，胜利开辟陕甘宁抗日基地的现实，使广大干部深刻认识到张国焘分裂主义对第四方面军及整个革命事业所造成的严重危害。第一队到第八队的同志，绝大多数是历史的直接见证人，尤其是四方面军的同志身受其害更大，回想起许多战友的生命断送在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下，更为悲愤。通过这次学习和对张国焘错误的批判，同志们进一步分清了是非，统一了认识，更加信赖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从而增强了全党全军在马列主义基础上的团结。

学哲学终身受益

在抗大学习期间，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亲自到校讲课。毛泽东同志讲授哲学，朱德同志讲授党的建

设，董必武同志讲授中国现代革命史，张闻天同志讲授中国问题，博古同志讲授马列主义基本知识，李富春、肖劲光等同志也来讲课或作报告。给我印象最深、最有教益的是毛主席讲授的哲学课。

毛主席讲授哲学课的题目是《辩证法唯物论》，内容分三个部份：（1）唯心论与唯物论；（2）辩证法唯物论；（3）唯物辩证法。毛主席讲课生动活泼，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他常常是引用一些通俗的事例，如手的拇指和其他四指的关系，象棋中的攻防关系，战争中的外线和内线的关系等等，来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抗大也有别的教师讲哲学课，所用的一些物理、化学的例子，我们没有接触过，总是听不明白，听毛主席这么一讲，就豁然开朗了。我们结束在抗大的学习时，哲学课还没有讲完，中央又举办了一个哲学训练班，邵式平同志任班主任，学员都是中央和军委机关以及边区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还有抗大的部分学员，共100多人，仍由毛主席讲课。我也参加了这个训练班。后来毛主席发表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光辉哲学著作，就是在抗大讲授的《辩证法唯物论》的主要组成部分。

毛主席讲授哲学课，更重要和深远的意义是，他不仅全面系统而又通俗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而且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揭露了“左”右倾错误，特别是揭露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冒险主义及其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实质和对革命事业的危害，从而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唯物论武装干部的头脑，树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学会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大大地提高了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水平。

听毛主席讲授哲学，是我第一次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它对我以后的革命和人生道路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使我开始懂得一点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问题，解决矛盾。记得我在中央军委四局工作时，红四方面军西路军的一些干部陆续回到延安，由我们接待安置，大多数同志送到抗大去学习。我们还接待安置了一些其他地方来延安的干部。在接待安置干部的工作中，有时同管生活的副官处闹些意见。一次在小组学习会上，我说起四局同副官处有矛盾，闹磨擦，我们要多作自我批评，不能老认为别人不对。毛主席是军委哲学学习组小组长，也出席了小组会，他听到我这么讲，笑着说，刚学了哲学就用上了，知道什么是矛盾和如何解决矛盾了。现在回想起来，过去几十年革命实践中，凡是能够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工作就顺利，有成绩；否则，就不顺利，甚至犯错误。真可以说，学哲学，终身受益。

洛川会议

1937年7月7日，日寇发动“芦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我们在抗大的学习立即结束，于8月间毕业，分赴抗日战争的各条战线。在抗大一期的毕业证书上，毛主席题词要同学们“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

我于抗大毕业后，即到中央军委报到。陈奇涵同志是军委四局局长，他要我到四局去，我也同意，军委任命我为四局副局长。不久，陈奇涵同志调走，我任局长。

中央军委参谋部下有四个局和一副官处。一局负责人郭天民；二局负责人有曾希圣、李作鹏、曹相云、胡立教；三局局长王净；副官处副官长徐日文。叶剑英、张云逸同志为副、副参谋长。1937年底，滕代远同志从苏联回来，我陪他去见毛主席，他向毛主席汇报了在苏联学习和工作的情况，毛主席提出要他去参谋部工作。后来，他即当了军委参谋长。

说来也巧，四局开始也恰为4个人，陈奇涵和我以外，还有赖毅和一姓肖的同志。任务是管军队干部的调配，以后又增加了管干部教育的工作。干部教育工作，一是管抗大，二是管汽车学校。刘鼎同志任汽车学校校长。由于没有汽车，不久就把汽车学校撤消了。四局任务增加了，人手不够，我先从四局留守处办的参谋训练班中调来一姓危的同志，又提出调在抗大工作的曹里怀同志来管教育工作。这件事同罗瑞卿同志说了几次，他就是不肯调。我实在没法，请示毛主席，发了盖着毛泽东印章的调令，罗瑞卿同志只好将曹里怀调来。事后，罗瑞卿对我说，你们要人，何必惊动主席呢？我说，没有办法啊！

这一年8月22—25日，党中央在陕北洛川县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洛川会议是党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当时的形势是，从抗日战争一开始，国民党蒋介石就采取了一条片面抗战的路线，消极抵抗，限制人民的参战活动，抗击日寇侵略的战争存在着极大的危险性。而在我们党内，随着全面抗战的开始，对所发生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不少人包括我在内，都认识不清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红军的作战方针问题，一个是统一战线中国共

两党的关系问题，需要及时明确回答。洛川会议正是在这种复杂环境和抗战存在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召开的。

毛泽东主席在会上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和党在抗战时期的基本任务问题的报告。他全面地、深刻地分析了“七·七事变”以后的军事、政治形势，论述了我党在抗战时期的基本任务和基本方针、政策。他正确指出，抗日战争将是艰苦的持久战，党的最中心任务，是实现对抗日战争的政治领导，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我党我军的工作重心应当放在战区和敌后，放手发动群众运动，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毛主席强调了对国民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不要忘记蒋介石想通过抗日战争消灭和削弱共产党和红军的阴谋诡计，党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立场，必须保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

会议讨论中，有人提出一些不同看法，这代表了当时党内不小一部分人的思想。他们对我党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坚持敌后游击战方针有怀疑，认为现在已国共合作，建立了统一战线，因此在处理国共关系上，主张对蒋介石要多尊重，对部队的指挥要多集中，红军要尽早全部开赴前线，配合国民党军队多打大仗，等等。

毛泽东同志对会议讨论中提出的问题，作了总结发言，进一步强调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最后，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和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十大纲领的内容是：（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全国军事总动员；（3）全国人民总动员；（4）改革政治机构；（5）实行抗日的外交政策；（6）实行战

时的财政经济政策；(7) 改良人民生活；(8) 实行抗日的教育政策；(9) 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10) 建立抗日的民族团结。这个纲领全面地概括了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向全国人民指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具体道路。

洛川会议基本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为实现我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和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使我对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对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实质，对我党我军的战略任务、作战方针和基本政策有了较清晰的认识，增强了在敌后山地和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的信心，解决了脑子里的思想疙瘩。

红军改编

洛川会议后，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于8月25日，我中央军委正式发布命令，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从9月20日起，按抗日战线的战斗序列，又称第十八集团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政治部，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八路军下辖三个师：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一二〇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10月，在南方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

新四军改编初期，需要大量的干部，新四军副参谋长周

子昆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两同志先后来延安要干部。他们到了四局，我把干部名册拿给他们，并说，你们看名册，要调谁，提出来，只要毛主席同意，我们就调。他们各带走了一批团以上的干部。

红军整编后，脱下了红军军服，穿上了国民革命军军装，红星八角帽换成了青天白日帽徽的军帽。部队的思想情绪波动很大，许多同志思想不通，感情上接受不了。打了10年仗，牺牲了许多战友，有的同志全家被国民党杀光，大片的苏区成了无人区，家仇阶级恨，无论如何也忘记不了。

“西安事变”捉住了蒋介石，不杀，放他回去，本来就想不通；现在倒好，又和敌人合作了，穿上国民党的军装，戴上它的帽子，这个弯子很难转得过来。个别人甚至离开部队回家了。为此，党中央作了很多工作，首先做好干部的思想工作，说明国共合作不是合并，不是投降，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并没有因为合作而结束，而是采取了新的形式，以阶级斗争服从民族斗争，以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我们共产党人搞革命，不是为了报私仇，而是为着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而斗争。现在，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就是抗日，只有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才能建立新中国。我们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应当以大局为重，以国家的长远利益为重，团结全中国人民，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抗日。换军装换帽子，仅仅是个形式，“帽徽是白的，但红军战士的心永远是红的”。这句话，很有力量，深深打入了指战员的心里。经过各级领导耐心地做工作，绝大多数同志的思想情绪稳定了下来。我的思想也有这样一个过程，初换军装，总觉得戴青天白日徽的帽子别扭，就很少戴帽子。直到去敌后，非戴帽子不可时，才戴上它。

改编后，也有个别同志自认为是“正规国军”了，而忘了根本。从我目睹的一件小事上，也反映出这一错误情绪。一天，八路军某师的一位旅长到军委参谋部来，他穿着国民革命军的将校服，趾高气扬、神气十足地要见“泽东同志”。那个样子，令人好气又好笑，一位同志“一本正经”地接待他，故意拉长声调地问他是谁？报了名字。接待的同志装作惊愕地说，红军有位×××旅长，没听说有国民党×××旅长，并问他有无名片？他很潇洒地拿出名片。接待的同志拿着名片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见了他，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以后，毛主席还几次讲这件事，以此来教育干部，统一战线不能统到国民党那里去，不能学国民党那个派头。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是个原则问题。红军改编初期，由于国民党的限制，八路军中没有设立政治委员，原来的政委改任军事副职。这种状况如果长期下去，就会削弱党的领导，削弱政治思想工作。这不是设或不设一个职务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军能不能坚持政治工作制度，能不能坚持我军的建军宗旨和党指挥枪的原则，能不能坚持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的大问题。1937年10月，党中央决定在八路军中恢复政治委员制度。新四军开始也未设政治委员，皖南事变后，党中央在重建新四军的命令中，任命刘少奇同志为新四军政治委员，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这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问题，我们决不能搞“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八路军改编完毕，即出师东进，由陕西韩城县和潼关渡过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八路军主力东进后，留在陕甘宁边区的部队组成八路军后方留守处。1937年12月，留守处改为留守兵团，肖劲光同志任司令员，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

1938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论持久战》的著名讲演，我因在医院手术未听到报告。后来在机关哲学组学习中，认真读了几遍，感到非常振奋。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系统地总结了抗战10个月来对日作战的经验，深刻地分析了中日双方的全部政治军事情况，有力地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这两种对抗战危害极大的错误观点，对中国共产党关于持久战的战略思想进一步作出了理论概括，正确地规定了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道路。指出：“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后来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关于抗日战争经历三个阶段的科学预见和我们在各阶段应采取的战略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论持久战》不仅是军事著作，也是一部不朽的哲学著作，包含着极其丰富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在山东敌后时，我经常带着《论持久战》一书，随时翻阅，每次读来都有一些新的启发；我们还把这本书作为山东根据地政治军事干部的必读教材，以此武装干部的头脑，教育部队和人民。

从1937年8月—1938年8月，我在中央军委机关整整工作了一年。延安，是党中央所在地，是八路军、新四军作战的指挥中心和总后方，这里听不见枪炮声，看不到硝烟。这对于经过10年战火的人，开始是不大习惯的，后来慢慢适应了一些。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对我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在这里，中央的指示精神能接受得更快一些，理解得更深一些，各方面的消息也多，可开阔思想，而且环境相对安定，也有条件多读一些书；同时，在性格修养和工作方法

上，也使我得益不少。但是，这总是机关工作，加之我文化、政治水平低，心里总不安，想到前方去，直接投入抗日战场，这个希望最终得以实现了。

挺进敌后

抗日战争开始不久，由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坚持推行反人民的片面抗战政策，并采取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在日寇对华北、华东、华南大规模进攻下，国民党100多万军队土崩瓦解，节节溃退。不到一年时间，整个华北几乎全部沦于敌手，京、沪、杭和沿江沿海的广大地区也全部被日寇占领，华中、华南也岌岌可危。

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后，迅速地开辟了一个广大的敌后战场，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部在平型关附近伏击敌人，首战告捷。平型关之战，是八路军出师后的第一个大胜利，也是中日开战以来中国军队所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它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疯狂气焰，粉碎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意志和胜利信心。此后，八路军又相继取得了雁门关大捷、火烧阳明堡机场等胜利。八路军在华北战场的胜利出击，有力地箝制了敌人在正面战场的进攻，使日寇速战速决的战略宣告破产。

如火如荼的抗战局面，又使我产生了上前线的强烈愿望，于是提出了去敌后的要求。开始，组织上没有同意，军委考虑将四局分管的干部管理工作移交总政治部，谭政同志要我去总政任组织部长，我不同意，仍要求去前方。组织上

见我要求强烈，最后还是批准了。这时，中央决定，张经武同志带一批干部去山东，他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服从组织决定。刘少奇同志找我谈话，决定我去山东，但说还要经过北方局的杨尚昆同志同意。当时，我不知这是为什么，全国解放以后，一次在北京见到抗战时在吕梁山地区工作的一位同志，他告诉我，1938年时，北方局曾要调我去吕梁山山西省委工作。于是，我才明白，为什么要经北方局同意的原因。

我离开延安前夕，去请示毛主席，他问我留在延安不行么？我说，在延安做机关工作，一要会写，二要会说，这些我都不会，还是去部队工作好。毛主席关切地问我，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东西买好了没有？有些东西是要带的，如地图、红蓝铅笔等等，这里没有，可以去西安买一些。临行前，我向毛主席借望远镜，想带到山东去。主席笑着说，望远镜不能给，我还要准备在陕北打游击用。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毛主席考虑问题，经常是从好坏两个方面考虑，随时准备对付最坏、最困难的局面。

离开延安前，我和吴仲廉同志向组织上提出了结婚申请。她在云阳青年训练班任指导员。训练班是胡乔木同志主持的，任务是对外地来延安的青年学生进行革命的基本训练和教育。军委将我们的结婚报告送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说，他们两人是老同学、老战友了，可以结婚。吴仲廉同志是衡阳女三师的学生，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那时我们一起搞学生运动，彼此都认识。大革命失败后，她在宜章中共县委组织部工作，参加了朱德、陈毅同志领导的湘南暴动，上了井冈山。她曾任连队指导员、军团政治部部长、纵队政治部主任等职。她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优秀的共产党

员，平易近人，深入群众，艰苦朴素，积极工作。朱德同志给她题词：“不爱红装爱武装。”她还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我俩共同生活近30年，相互的感情是很深的。她不幸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连骨灰都没有留下。当时，我已被“打倒”，软禁在浙江美术学院。后来，周总理派飞机接我来北京时，一些学生才告诉我吴仲廉同志被害死的消息。我正值病中，悲痛欲绝。到京后，许多老同志来看我，安慰我，李先念同志愤怒地连声说：“阶级报复，阶级报复”。在当时的环境下，无法为她举行任何悼念活动，只得把悲痛和仇恨埋在心底。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中共浙江省委为吴仲廉同志平反昭雪，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省人民政府追认她为革命烈士。这也可以安慰她在天之灵了。在这里顺笔写这一段，略表追思悼念之情。

临去山东前，经毛主席批准，我改名江华，因为在敌后复杂的游击战争环境中，不好再用内战时期黄春圃这个名字。去敌后的同志，都作好了牺牲的准备，所以尽可能轻装。我清理了自己的物品，有些东西送给了别的同志。我送了一床毯子给李强同志，他送了我一个苏式军用指南针，以示纪念。同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位姓周的同志，我们相处得很好。我的窑洞宽敞一些，他们单位的一些器材就放在我这里。50多年过去了，前不久，中顾委开会，见到李强同志，我们聊起来，他还提起此事。此时，我才知道“周同志”就是中央一机部的沈鸿同志，近在咫尺不得知啊！

1938年8月，张经武、黎玉同志带队，我们100多人离开延安，向山东出发。路上走了三四个月，途经国民党军队的防区、敌占区、游击区和我们的抗日根据地，由于组织

安排得比较好，各地同志积极协助配合，一路上还是比较顺利的。我们经过耀县，先到西安休息了一下，同国民党方面研究商谈了行军路线，由西安东行到河南澠池，然后过黄河到山西垣曲县。在这里，我的马跑了，周围都是卫立煌的部队，再也没找回来，只好步行。经长治到了潞城，在八路军总部住了一段时间，等候调给我们的部队。在离延安前，曾向中央提出带一支主力部队去山东，作为建立根据地的骨干力量，中央同意了。由于这时八路军已散开各地开展游击战争，一般又都是以连营为单位活动，因而调部队给我们有很多困难。我们离开八路军总部北上，到娘子关陈赓同志的旅部住了几天，他派一支部队护送我们前行。在冀南同朱瑞、徐向前、宋任穷、陈再道等同志见了面，等候调配部队停留了几天，没有等到，于是继续向山东行进。行前，宋任穷同志送了一匹骡子给吴仲廉同志。10月下旬到了山东聊城。

聊城驻着范筑先的部队。范筑先是国民党山东第六专区专员，一个有爱国思想的开明人士。日寇进攻山东后，他在我党的帮助下组织了抗日武装，积极参加抗战。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接收了一些共产党员在其部作政治工作。我们到聊城，他热情欢迎接待了我们。我们离开聊城后不久，11月中旬，日军进犯鲁西北地区，围攻聊城，范筑先率部坚守，终因兵力单薄，经过激烈战斗，聊城失守，范筑先等数百名将士壮烈牺牲。我党对范筑先将军的牺牲表示了沉痛的哀悼。后来，他所属部队的一部分编为八路军筑先纵队。

在聊城境内，我们与孙继先率领的津浦支队会合，这就是我们带去山东的唯一主力部队，兵力千把人。12月，我们到达山东省委（当时称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所在地沂水县王庄。

山东敌后抗战

组建山东纵队

山东位于黄河下游，东临大海，南接陇海铁路，津浦、胶济两铁路纵横其间，境内地形复杂：津浦路以西和胶济路以北地形平坦，为华北大平原的一部分；胶河以东是以崂山山脉为主体的狭长的胶东山岳地带；津浦路以东和胶济路以南，由错综的泰山山脉构成了沂沭河流域大片山区，耸立着沂山、鲁山、蒙山等高山固寨，成为山东的战略中心。

“七·七事变”后，平津失陷，日寇分兵沿津浦路南侵，在敌寇压境，山东危急之时，国民党军阀、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路军总司令韩复榘不作任何抵抗，率10万大军退却逃跑，山东沦入敌手。

山东人民素以彪勇强悍著称，有悠久的御外侮、抗强暴的光荣传统。在我党提出的坚持抗日主张的号召下，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山东各地党组织，在省委领导下先后在徂徕山、天福山、黑铁山、牛头镇、泰西等地组织发动了抗日武装起义，建立起数十支大大小小的抗日武装，从日伪手中收复了掖县、黄县、蓬莱等十几座县城，在80余县范围内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游击战争，并开始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

开辟了胶东、鲁中、鲁西、清河、湖西等抗日游击根据地。

山东的抗日武装打着各种旗号，名称多种多样，有“抗日救国军”、“抗日游击队”、“抗日义勇队”、“抗日自卫团”、“抗日联军”等等。1938年6月，毛泽东主席指示，山东“凡属我党领导已得到广大民众拥护、又邻近友军之游击队，以用八路军名义为宜。否则，各地国民党均将控制，如使用普通名义，则不得不听其指挥，甚至通令解散，八路军亦无权过问，用八路军名义，则无此弊”。为了统一指挥我党领导的山东抗日武装力量，中央决定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任命张经武为指挥，黎玉为政治委员，王彬任参谋长，我任政治部主任。1938年12月，我们到山东后，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立即公开打出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的旗号，并正式成立了山东纵队指挥部和政治部，还成立了供给部、卫生部。马馥塘任供给部长，白备武任卫生部长。我奉命随即组建了政治部，所辖各部门，计有组织、宣传、锄奸、民运、联络、敌工六个部，组织部长吴仲廉，锄奸部长杜明，民运部长李林，联络部长姚仲明，宣传部长和敌工部长暂缺。组织部、宣传部下分设几个科，我记得有组织科长王一平，干部科长鲍其辰，青年科长张迅如，宣传科长于平。山东纵队指挥部、政治部同山东分局一起驻在鲁中沂水县的王庄。

八路军山东纵队的成立，标志着山东的抗日斗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为了使这支部队真正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有战斗力的武装力量，在正式组建了山东纵队的领导机构之后，于1939年春，即开始整训各地的抗日部队。这些部队大多数是我党通过武装起义发展起来的，其中有的是地

方党组织直接发动武装起义建立的抗日游击队；有的是地方党组织向本地原有的区、乡政府和当地开明士绅进行统战工作，筹集武器款项，建立武装，逐步改造为抗日部队；有的是外地的共产党员回到家乡进行抗日活动，建立的抗日武装。这些抗日武装，在日寇入侵、国土沦亡之际，揭竿而起，保卫家乡，打击了日寇的猖狂气焰，振奋了民族精神，使山东大地到处燃起了抗日烽火。从总体上看，这些部队有很高的抗日热情，党的工作也有一定的基础。但是，由于建立的时间很短，来不及整顿训练，所以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弱点，主要是：

第一，部队起义初期，数量很大，号称8万，部队成员主要是农民，其次是平津流亡的和本地的大、中学生，也有开明士绅，还有一部分是无业游民、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反正的伪军、土匪等等，成份极为复杂。由于出身和所处的环境不同，经历不同，参加抗战的动机也不尽一样：有的是响应共产党的号召，不愿作亡国奴，坚决抗战的；有的是随大流，凑热闹的；有的是找官做的；有的是暂时找个落脚点，等待时机，见风使舵的；也有少数坏人混进了部队。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他们带来了军阀残余、小农思想、不守纪律、流氓习气等不良作风。所以，当环境恶化发生困难时，便发生了一些逃跑、叛变。

第二，政治工作薄弱，缺乏严格的组织纪律。有些游击队组织很松散，几个村子的人凑在一起，有事就集中，无事就回家。有些是整个村子、整个家族都参加了部队，有父子兵、兄弟兵、叔侄兵。他们昨天还是农民，刚扔下锄头，就拿起枪杆子，还没有听从命令、服从组织纪律的习惯。有些人参加部队就是为了保家保乡，家庭观念和地域观念比较浓

厚，不愿意调离自己的地区。部队的党组织和政治工作部门普遍还没有建立起来，思想政治工作尚未得到有效的开展，有极少数部队处于召之不能来，来之不能战的状况，整个纵队在战略上还不能完全实现统一领导。

第三，从整体上讲，部队的政治素质、军事素质和文化素质都比较差，战斗力比较弱。部队大多是在短期内通过起义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党员和战斗骨干数量较少，大多数战士没有受过爱国主义等政治思想教育，对于我们党的历史和现状，对于党的宗旨和路线、方针、政策缺乏理解，许多人参军的目的并不明确，只知道学历史传说中的英雄好汉，劫富济贫，抗击强暴；还有些人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复杂思想问题。

在军事上，由于多数人没有拿过枪杆子，没有经历过战争，许多人连基本的军事技术也不知道，打仗只凭热情和勇气。部队的装备也很差，拿刀枪棍棒的都有。文化上，有文化程度较高的大学生，也有中学、师范等小知识分子，而大多数农民战士则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

要将这样一支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思想复杂、纪律松散、素质较差的游击队改造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在短期内是不可能达到的。因此，在具体步骤上，我们要求循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要求过高。首先，整训侧重于部队的巩固和正规建设，基本要求是将分散的游击队组织起来。

在部队中，我们着重进行了服从组织、遵守纪律、听从指挥的教育，全军上下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由于部队原来纪律比较松散，一下子严格起来，有人就吃不消，当环境一紧张，

生活一困难，就有人逃跑。因此，在执行政策和纪律上必须十分谨慎，处罚不能太重，主要是靠政治思想工作，靠党员和先进分子的模范带头作用。通过整训，清除了一些不良分子，有些原来随大流来的而现在不愿意留在部队的人，也发给一定的生活费用，准其回家。

整训中，我们突出抓了干部的教育和训练，组织学习了《论持久战》等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央指示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以提高干部的政治军事素质。纵队还举办了各种训练班，训练各方面的干部，分局和纵队的领导干部亲自去训练班讲课。纵队领导同志还下到部队帮助工作，以抓点促面的方式推动整训工作。我带着鲍其辰等几个同志到了驻在新泰县土门、龙廷一带的六十一团工作了一个时期。六十一团是从胶东调到新泰的，原属五支队，团长是吴克华，政委是阎世即，政治处主任陈楚。我们帮助他们建立起政治工作组织和一些必要的政治工作制度。

在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和建立各种工作制度的同时，各部队还开展了射击、投弹、刺杀等基本军事技术训练和游击战争战术的训练。此外，还举办了爆破训练班，学习、推广用炸药炸碉堡和装甲车、坦克的技术。在这项工作中，在苏联专门学习工兵爆破技术的王凤麟同志起了很大的作用。王凤麟夫妇俩不幸在一次日寇“扫荡”中，在淄博突围，英勇跳崖牺牲了。同时牺牲的还有纵队宣传科长于平同志。他们都是忠诚、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我永远怀念他们。

整训之后，山东纵队将所属部队整编为第二、三、四、五、六、八支队和陇海南进支队，还有一特务团和直辖四团，各部队基本上配齐了军事、政治干部。经过整训，加强了部队的军事政治工作建设，初步建立起军事政治教育制度，

改进了管理，严格了军事生活和军事纪律，密切了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军队的政治素质、战斗力有所增强，整个部队的面貌发生了初步变化，朝正规化建设迈出了第一步。

1939年3月，八路军一一五师罗荣桓政委和陈光代理师长率领师部和东进支队（一个团），由吕梁山区到达鲁西，继而进入泰西地区创建泰西抗日根据地；9月，进入鲁南根据地。

1939年8月山东纵队又进行了以加强军政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整训，主要任务是在连队普遍建立党支部。支部建在连上，是毛泽东同志创立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国工农红军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成长壮大和取得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山东纵队建立之初，党的工作比较薄弱，党员的数量也比较少。经过斗争的考验，发展了一些党员，党员已占部队人数的15—20%，有了建立党支部的条件。通过整训，各连普遍建立了党支部，并且强调了党员在连队的先锋模范作用，要求党员做到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关心和帮助同志，开展政治思想工作。

在整训中，还提出了主力部队正规化，游击部队组织化和巩固发展新部队的要求，在部队的编制上也作了一些调整，山东纵队原第八支队改为第一支队，直辖四团改为苏鲁支队。这样，山东纵队所辖部队有第一、二、三、四、五、六支队，陇海南进支队和苏鲁支队。通过这次整训，部队的政治面貌又进一步得到改观，军事政治素质进一步提高，战斗力也大为增强。

在整个整训过程中，我们始终以古田会议所确定的建军原则为指导，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坚持把提高部队的政治觉悟、

政治素质放在首要的位置，坚持用红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来教育干部、战士，改造军队。在整训的具体步骤上，从实际出发，不搞一刀切，让各部队按照各自的实际情况进行安排。整训中也出现过一些失误，如整训初期，为了增强主力部队的战斗力，纵队搞了个试验，把一些先进战士集中起来，编为特务团。我不赞成这种做法。我认为，先进战士之所以先进，是同落后相比较而存在的，如果把先进战士集中在一起，不可能都先进，同样会出现先进和后进；并且，这种做法抽调了一些部队的骨干，影响了这些部队的战斗力。在这个问题上，红军时代就有过教训：第五次反“围剿”打沙县时，我们师曾经把落后战士集中起来开会，会议名称就叫落后战士会，战士们很不满意，会也开不下去。实践证明，纵队的这个试验是行不通的，时间不长就撤销了。

转战苏皖边区

1939年9月，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根据党中央关于今后八路军主要向华中方向发展、与新四军靠拢打成一片的指示，决定加强苏皖边区的工作，成立了八路军苏皖纵队，任命我为司令员兼政委，并任皖东北军政委员会书记，统一指挥那里的部队，开辟新的根据地。

苏皖边区北靠山东，南接长江，包括苏北和皖东北一带，从徐州至连云港的陇海铁路东端以南地区，是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好战场。1938年12月，山东纵队组织了陇海南进游击支队，南下苏皖边区，组织发展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这支队伍，在苏皖特委的领导下，在那里创建根据地，

初步打开了局面。

苏皖纵队由陇海南进支队和苏鲁支队组成。陇海南进支队即原来的陇海南进游击支队，钟辉同志为司令员兼政委，后来韦国清同志任政委。苏鲁支队司令员张光中同志，政委李乐平同志。苏皖边区还有八路军一一五师的胡炳云、田文扬大队（一个团）和孙象涵团以及运河东汤三团等一些地方游击队，这些部队也都由我统一指挥。我带着三个团的部队（即陇海南进支队、胡田大队和孙象涵团）主要在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南、运河以西、淮河以北的苏北、皖东北地区活动。苏鲁支队主要在陇海铁路以北的徐州、枣庄、邳县等地区活动。著名的铁道游击队就是苏鲁支队指挥的一支小分队。

苏皖边区原有我党的活动，成立了地委、县委，苏皖区党委书记是金明同志。皖东北地区国民党专员盛子谨，属国民党CC派。在苏皖纵队到达前，我方从照顾统战关系出发，双方曾谈过，我们在皖东北地区不筹款，不征兵，并以他的名义搞了一些武装，实则是我党领导的，如第三支队，司令员是赵会川同志，有的支队政治处主任是共产党员。盛实力不强，看到我们纵队4000多人来到这里，便心存疑惧。纵队到后，为了抗日，要建立根据地，没有枪，没有粮，没有款，没有人怎么行？于是就找盛子谨谈，他搬出以前的所谓不筹款、不征兵的协议应付我们。我即让皖东北区党委统战部长刘柱国当我的代表，由他出面同盛子谨等人交涉各种事务，并特别对他指出，在交涉中，要宣传我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宣传蒋介石的讲话：“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声明我们八路军来皖东北是为了抗日救国，地方官员应当遵循蒋委员长训示，领导地方有钱出钱，

有枪出枪，有人出人，为抗战尽义务。由于我们有实力作后盾，盛子谨也不得不按我们的要求办了。后来，他离开了这个地区，我们也客客气气地礼送出境。

苏皖边区同山东一样，日伪军、顽军几种反动势力犬牙交错，互相勾结，构成了错综复杂的局面。日军入侵后，推行“以华制华”，到处扶持组织维持会和伪军，推行伪化，以巩固其统治。国民党军在徐州会战溃败后，一些丧失民族气节的地富势力及一部分国民党军队，投降了日寇，充当汉奸。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也趁机回来积极活动，他们不打日寇，专门袭击八路军、新四军，到处扩充势力，抢占地盘，破坏抗战。我们要在这里站住脚跟，不仅要坚决打击日伪势力，也必须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

苏皖边区与山东地形不同，以平原和丘陵为主，河渠纵横，无山可依。我军数量少，质量弱，装备差；而日伪军不仅兵力和装备占优势，还有铁路、公路交通，机动灵活。这就给我们创建根据地带来了一些困难。在平原地区，敌、伪、友、顽犬牙交错的情况下，能不能坚持游击战争，是苏皖边区，也是整个华中、华北地区的一个大问题。我们逐渐在实践中学习和掌握了平原地区游击战争的方法和规律，取得了一些经验，一步一步地打开了局面，站稳了脚跟。

根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我们以小型分散的活动为主，采取井冈山斗争的老办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避开敌人的主力和进攻锋芒，敌大股进攻时，就用游击战、麻雀战进行骚扰，遇上小股敌人就迅速加以消灭，积小胜为大胜。部队初则以团或营为单位游击，继则以营、连为单位游击。这样做有几个好处：一是部队小，行动迅速，打得快，撤得快。二是遇到小股敌人可以就地歼灭，敌我力

量相当时，也可以抵挡一阵子。在平原的条件下，部队的行动要特别注意隐蔽性、迅速性，在一个地方不能久住，有时一天要换好几个地方，让敌人摸不清我们的行动。在军事斗争的同时，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抗日的堡垒户、堡垒村，户连户，村连村，在一些游击区还建立了表面上是敌人的，实际上被我控制的“两面政权”。同时，还开展了敌人内部的工作，做到你中有我；并且通过建立各种情报站、联络站，随时掌握敌人动向，战略上力争主动，早发现敌人。任何根据地的斗争，都要发动和依靠群众，平原地区尤其显得重要。没有山，群众就是山，八路军是山上的猛虎；没有水，群众就是水，八路军是水里的蛟龙。群众的条件弥补了自然条件的不足，只要紧紧依靠群众，我们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1940年，苏皖纵队打了几场硬仗。

这一年4月，纵队决定拔除泗县日伪重要据点张楼村。这是泗县最大的恶霸地主张海生的老家，它有前后两个圩子，前张楼是新建的，张海生和维持会住在这里，驻有伪军500余人，轻机枪10多挺；后张楼是张海生兄弟和佃户的住处，驻伪军300余人。两个圩子都很坚固，外围还有一些小据点，均有伪军驻守。由于张楼地处睢宁、宿迁、泗阳、泗洪、泗县、灵璧六县的中心，对我创建苏皖根据地非常不利。我们集中南进支队和胡田大队进行攻击，先拔除外围的据点，部队进到张楼圩子，敌人退守核心工事待援顽抗。后来驻宿迁、泗县、睢宁的日军赶来增援，我即撤出战斗。此次战斗，拔除其外围一些据点，毙俘敌30余人。

正在这个时候，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为首的顽固派纠集其主力八十九军和王光夏、鲁同轩的警备旅及各县的常备队共10000余人，向我皖东北根据地的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

总队张爱萍部发动进攻。当时，刘少奇同志正在皖东北。我们召开了各支队营以上的干部大会，少奇同志作了反顽斗争的动员报告。少奇同志委托我指挥这场战斗。我们集中了8个团的兵力，即张爱萍的4个团，孙象涵的1个团，胡田大队1个团，钟辉1个团，还有地方武装1个团，向敌人发起反击。敌人也是8个团，兵力大体与我相当。新四军第五支队罗炳辉同志也来电报要求参战，他们驻在淮南，距离太远，不一定打得赢，就复电没让他们来。战斗打了两天，非常激烈。战斗中，少奇同志的秘书找我，耽心少奇同志的安全。我对他说，不用耽心，我手里还有一特务营，万一情况紧急，这支机动力量还能用得上，少奇同志的安全，我有责任。最后，我军将顽军击溃，他们退到运河东岸。罗炳辉同志又来电报，要我们打过运河，他们从南面进攻，夹击敌人，打垮顽固派，开辟运河东岸根据地。少奇同志问我有何意见？我说，我们的力量还不够，打过去，不一定能站得住，总之，时机还不成熟。少奇同志同意我的意见，此议作罢。

同年6月间，苏皖纵队机关驻在江桥，我们获悉日军从泗县、睢宁、宿迁同时出动，向江桥扑来，于是立即部署迎敌。第二天拂晓，日伪军百余人，配备有轻机枪、掷弹筒等强武器，袭击了江桥。纵队特务营奋勇迎敌，与敌肉搏，我其他部队在炮火掩护下，迅速向袭击江桥之敌展开反攻。日寇在我军夹击下，从江桥撤回宿迁县城。二三小时后，睢宁、泗县两路敌军配有九二步兵炮2门、重机枪4挺、汽车30余辆，向我南进支队驻地归仁集猛攻。南进支队三团固守归仁集，与敌激战一日，击退敌十多次进攻，日军伤亡惨重。黄昏后，我其他部队增援三团，将日军一个中队包围在

一座大庙里，激战一夜。为防第二天敌人增援，拂晓时，我军主动撤出战斗。此役共毙伤日军200余人，我方伤亡也较重。

在皖东北，我同刘少奇同志一起工作的一段时间里，深感到他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上很强，对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领会得很深。他为人谦虚，在军事上，他放手让军事指挥员去工作。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军事上你负责，放手大胆地干，政治责任由他承担。在那段时间里，给中央的电报，他也要我同他一起具名签发，我坚持不同意，他还是让我签上了名字。我同他在一起工作时间不长，却从他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我一直怀念着这一段愉快工作的时光。

1940年7月，苏皖纵队开辟苏皖根据地的任务初步完成。中央决定，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二纵队南下，支援新四军作战，共同完成建立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大海以西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并将山东与华中两大根据地连接起来。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根据中央指示，决定撤销苏皖纵队，于是我带领纵队部分干部回山东工作，纵队所属陇海路以南的部队编入了新四军。

鲁村自卫战

1940年7月，我由苏皖边区回山东后，仍任山东纵队政治部主任，山东纵队已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时，沈鸿烈挑起事端，向我鲁中区进攻。纵队决定由我和许世友同志指挥鲁村自卫战役。

沈鸿烈原为青岛市市长，日寇进占山东后，沈仓皇逃跑。1938年韩复榘被蒋介石处决后，沈当上了山东省政府主席，并任苏鲁战区副司令。沈鸿烈是一个极端顽固的反共老手，他从鲁西南到鲁西北，再到鲁北、鲁中，到处组织反共，提出了三个反动口号：“宁匪化，勿赤化”；“宁亡于日，勿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以不灭”。命令其部队对八路军“见人就捉，见枪就下，见干部就杀”。1939年春，沈鸿烈还公开提出了限制我军发展的三个条件：（1）统一划分防线，把我军防线划在津浦路东侧之滕（县）泗（水）宁（阳）地区。（2）要我军“枪不离人，人不离乡，统一行动，军不干政”，阻挠我建立抗日根据地和民主政权。（3）经济粮秣统筹统支，在经济上对我进行控制。沈还假借抗日的名义，到处委派专员、县长，限制和破坏人民抗日的力量。沈鸿烈进入鲁中地区后，抢占了沂蒙山区要点东里店、鲁村一带，极力扩大势力，驱使各地顽固派向我军搞磨擦，不断制造流血事件。1939年3月下旬，沈鸿烈唆使秦启荣（国民党别动纵队第五纵队司令，毛泽东主席曾说秦是“磨擦专家”）所属王尚志部3000余人，在博山以东的太河地区伏击我山东纵队第三支队的过路干部和少数掩护部队，捕俘杀害我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团长潘建军等干部战士400余人。8月，秦启荣在莱芜县雪野村乘我四支队在泰莱公路出击敌人的机会，指挥顽军9个支队袭击我四支队司令部。8月中旬，又集中4000余人围攻我活动于淄河流域长秋镇一带的第三、第四支队各一个营达十余日。以上即有名的“太河惨案”、“雪野事件”、“淄河事件”。

1940年6月，沈鸿烈抢占了我鲁中区重镇鲁村，7月初，又以秦启荣、吴化文等部4000余人西犯，配合新泰、莱

茌、博山等处日伪军3000余人“扫荡”，夹击我军，并乘机占我茌茌东南之郑庄等地区。8月初，沈鸿烈继续向我压迫进攻，集中秦启荣、吴化文等部万余人，向我新泰以东之土门、龙廷地区大举进犯，截断了我沂蒙山与泰山区之联系，也堵塞了胶济路南北各区联系的通道。山东纵队忍无可忍，决定由我和许世友同志指挥对其进行自卫反击。我们集中了4个团的兵力：第一支队、第二支队、第四支队（团）和一一五师六八六团，向吴化文部在鲁村的3个团发起反击。我们先由六八六团担任主攻，占领了土门，然后转攻鲁村，天下着雨，我和许世友命令部队进攻，顽军抵挡不住我正义之师的猛烈冲击，一部分被歼，其余溃退了，第二支队和六八六团打进鲁村。我们又命令部队追击溃退之敌，但由于一些部队素质较差，不听指挥，自动停止追击，宿营了。鲁村自卫战，虽然于8月10日收复了鲁村，并恢复了我原有地区，保持我南北交通联系，但对沈鸿烈的打击不够有力，只打了个收获不大的击溃战。这一仗，我和许世友同志都戏称是当了“见习参谋”。

从反顽自卫战中，我们深感山东纵队太散，不能集中相当多的主力对抗日寇和顽固派的进攻，需要进一步整训，并应编成一些野战部队。于是，我们向山东分局提出了建议。1940年8月，山东纵队进行了第四期整训。这一期整训，主要解决主力部队正规化，军民武装基干化的问题。山东纵队编成了一、二、三、五旅（四旅后编成）和第一、四、五支队、蒙山支队以及特务一团、二团，共54000余人。原鲁中的部队编为第一旅，山东纵队副指挥王建安兼旅长，周赤萍任政委；滨海部队编为第二旅，孙继先任旅长，我兼政委；清河部队编为第三旅，许世友任旅长，刘其人任政

委；胶东部队编为第五旅，吴克华任旅长，高锦纯任政委；第四旅，廖容标任旅长，汪洋任政委。每旅下辖3个主力团。第二旅辖四、五、六团，第四团团团长王永禄，政委杨道和；第五团团团长刘涌，政委刘仲华；第六团团团长马跃伦，政委王健青。

在这次整训后，山东纵队建成了由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队三者结合的、战略上统一指挥的、具有一定战斗力的游击兵团。主力部队的素质，迅速提高，战斗力大为增强，可以脱离原来活动的地区，调到外地外区担负较大规模的作战任务，也就是说，山东纵队已经从游击队变成了野战军，变成了能够进行一些伏击运动战的正规军。这支武装力量，为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为坚持山东地区的抗日战争和取得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粉碎日寇“扫荡”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正面战场的大规模作战暂时缓和以后，日寇兵力源源向华北战场转移。1939年春，日寇在华北提出“强化治安与巩固华北”的方针，颁布了《治安肃正计划》。9月，又提出所谓“囚笼政策”，以据点、交通线和天然障碍割裂、封锁我根据地，并不断向我“扫荡”。政治上，极力拉拢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离间我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广泛搜罗土豪劣绅、土匪流氓、封建会道门及投降的国民党军队等败类，扩大伪军，以“维持会”为基础，扩建伪政权，以实现其“以华制华”的阴谋。经济上，加紧榨取与掠夺资源，贯彻其“以战养战”的

方针；同时，用各种手段破坏我根据地之财政经济，以摧毁我抗战的物质基础。“扫荡”与反“扫荡”，“蚕食”与反“蚕食”，封锁与反封锁，成为华北战场上敌我斗争的主要形式。我山东纵队广泛发动群众，与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保存和壮大了队伍，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

1939年夏，山东纵队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对沂蒙山区的第一次大规模“扫荡”。敌人集结20000余人，由津浦、陇海、胶济铁路及台潍公路各据点分十路出动，从6月1日起，以沂蒙北部山区为中心，由北向南，自西向东，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在飞机配合下，向我鲁中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扫荡”，企图围歼我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指挥机关。敌人先后占领了莒县、沂水、蒙阴等县城，在一些村镇安设了大量据点，割断我鲁中与滨海和鲁南地区的联系，并集中兵力向沂蒙腹地进行反复的分区“扫荡”。我领导机关事先发出了反“扫荡”的指示，缩减与分散后方机关、学校、兵工厂，军政工作人员分散到各部队帮助工作。在作战指挥上，广泛开展分散的游击战，内外线相结合，打击敌人交通线与薄弱点。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指挥机关率特务团灵活机动地与敌周旋在沂水、蒙山之间的山区，使敌人多次“分进合击”扑了空。与此同时，主力部队分散活动于外线，在游击队、自卫团等群众武装的配合下，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敌人在山区转了一个多月，不但没有摸着我军主力，反而损失了1000余人，只好草率收兵。

1940年秋，八路军发动的“百团破袭战”，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取得巨大胜利，但同时也过早地暴露了我军的力量。日寇在震惊之余，调整兵力部署，集中其侵华兵力

60%，伪军90%，专门对付我军。1941—1942年，连续推行了5次“强化治安运动”，将华北分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游击区）和“非治安区”（即我之根据地）。对占领区，以清乡为主，实施保甲制度和“连坐法”，肃清“不稳分子”，掠夺粮食等物资，实行奴化教育，强化统治，巩固占领地。对游击区，以“蚕食”为主，加强特务活动，恐怖与怀柔兼施，强迫居民接受其伪化，并广修封锁沟、墙与碉堡，防止我军深入活动。对我根据地，则以数万兵力，大举轮番“扫荡”，其战术由“分进合击”，发展到“铁壁合围”，又进而发展到“拉网合围”，实施极端野蛮残忍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妄图置我于死地。

1941年11月，敌人配合“第三次强化治安运动”，以“剿灭沂蒙山区的共军，消灭其根据地”为目的，对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大“扫荡”，日军共出动了50000余人，并配备了飞机、坦克、大炮等重火力。我领导机关号召根据地军民紧急动员起来，作好反“扫荡”的一切准备。

当时，山东纵队指挥部驻在马牧池，政治部驻在离马牧池不远的刘家城子。4日拂晓，敌人突袭马牧池。敌人行动非常诡密，从政治部驻地经过时，竟未被我发现，敌人也不知道我们驻在那里。敌人到马牧池后，被哨兵发现，鸣枪报警，司令部迅速从后山转移到南墙峪，纵队直属特务团顶住敌人打了一天，天黑后突围出来。我带着政治部和一个警卫连到南墙峪找司令部，他们已突围转移。在路上，遇到省战工会和担任掩护的山纵一旅某营。我即让他们随我行动。敌人正在岸堤宿营，我命部队迅速上了笛崮山。天亮时，敌人

发现了我们，即向山上发起进攻，我们顶住打了一天，天黑时突围。战工会和掩护营往蒙阴以南平原地区去了，我们往西北到蒙阴，后又转移到南面的观音堂，住在望海楼下休息警戒。大概过了天把，傍晚，老百姓来报告说，有一位搞农会的人找我们，我让秘书张伯祥去看看，原来是霍士廉同志，黎玉同志也同他们在一起，他们是绕笛崮山碰到敌人，从我们后面跑过来的。我和黎玉同志会合后，便上了蒙山，住了一夜，又向鲁南转移。当时，鲁南无战事。与此同时，罗荣桓同志率一一五师与山东分局机关从两股敌人的间隙也安全通过了敌人的包围圈。敌人企图搞掉我首脑机关的阴谋破产了，从11月12日开始，又象梳篦一样，对沂蒙山区进行极严密而残酷的“清剿”，大片村庄被烧毁，大批无辜群众遭屠杀，其状惨不忍睹。

为了保卫抗日根据地，我们向鲁中区返回。敌人仍在马牧池一带“清剿”，新泰、莱芜尚无敌人。我们插到新泰的大张庄。山东纵队指挥机关返回鲁中后，领导群众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反“清剿”斗争，以“三空”（撤空、藏空、躲空）对付敌人的“三光”政策，实行坚壁清野，把粮食等物资藏起来，把水井也埋起来；同时，放手发动民兵、自卫团，配合我内线主力部队展开游击战，到处袭击小股敌人。外线部队则不断寻找战机，打击和箝制敌人。12月8日，英、美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敌人主力开始后撤，但仍留下6000余名日军，配合伪军，继续搜索我军，推行伪化活动。我军抓住战机，集结兵力，不断袭击敌人。由于驻在坦埠的一个团情报未搞准确，说这一带的敌人都撤了，我们便转移到离坦埠约三四十里的上高湖村。上高湖村背后是山，司令部住在村子里，政治部住在村头，紧靠一个小山

坡。一天早上，敌人突然偷袭我领导机关，我同纵队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刘子超同志住在一起，他先起床吃过早饭，我刚起来，一出门便见敌人来了，哨兵已与敌人接火，我即命警卫连顶住，并占领对面的小山坡，其他人撤到村子后面的山上，司令部的人员也上山了。敌人见偷袭未成，也不敢追上山。撤退时，我让刘子超跟我上山，不要乱跑，但我去指挥部队时，他却忙乱地骑着马跑到大路上，被敌人抓住杀害了。刘子超是位很好的同志，是我们纵队的大知识分子，在上海当过大学教授，但是没有战斗经验，就这样牺牲了，真是可惜。

经过一个多月紧张激烈的斗争，基本上取得了反“清剿”的胜利，毙伤日军1200余人，坚持和保卫了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我机关和部队也受到不少损失，根据地的人力、物力遭到严重的破坏。

1942年是我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一年。敌人在“铁壁合围”、“分进合击”、“突然袭击”等手段的基础上，形成“拉网合围”式“扫荡”，即以强大兵力呈网状分布，快速出击，构成若干合围，企图将我军迅速围歼于狭小地区。在一年的时间里，敌人用这种方法进行的千人以上的“扫荡”达40次之多，其中有5次是万人以上的大“扫荡”。1942年10月，敌人以15000多人，对我沂蒙山区进行了“拉网扫荡”。“扫荡”之前，敌人扬言要“扫荡”滨海区两个月，并通过特务机关将其“扫荡”滨海区的假情报、作战计划送到我军。同时，临沂敌人2000余人向沭河以东我滨海地区进犯，以迷惑我军。我山东军区（刚由山东纵队改建）驻在滨海，接到敌假作战计划后，罗荣桓同志主张先不忙行动，看一看再说，我也同意这个意见，但军区一位主要负责同志却主张

转移到鲁中沂蒙山区去。于是正中敌之阴谋。敌见我转入沂蒙山区后，首先在预定合围地区进行多次合击，以迫我集中。10月27日，敌人分作12路，以我军区所在地南墙峪为中心构成直径35公里的包围圈，在飞机、大炮、骑兵的配合下，突然向我袭击。我军区机关迅速转移，未遭合围，转移到沂水以北的沂山山区。11月2日，敌人又组织8000余人分11路对我合围。我发现敌情后，于拂晓抢占了笛崮山，我方兵力只有一个特务营和鲁中二分区的一个团。笛崮山顶东西长约一里，南北不到半里，岩石嶙峋，周围有一圈倒塌的围墙，还有几处破屋，东面是十多丈高的悬崖峭壁，西面和南面是可以攀登的山坡，东北一里处有一小高地，与主峰相连，形成主峰的前哨阵地，整个地形对我有利。敌人从清晨起向我进攻，先用炮火猛烈轰击，接着从三面发起一次比一次猛烈的冲击。我军从早上到黄昏，打退了敌人8次进攻，天黑后，军区机关在特务营掩护下分数路突出重围。这场战斗，团长、政委牺牲，特务营只剩下14名战士，最后，被敌人压缩到笛崮山东端，他们战斗到最后，跳下悬崖，6名同志英勇牺牲，其余同志以后被救回。突围中，省战工会秘书长李竹如同志牺牲，黎玉同志也负了伤。我带着警卫班突围，最后只有警卫员滕代田和我冲出来。一位参谋送我到沐水西北的刘家村，那里是游击区，天亮时到了一老乡家里，后来又转移到村南的一个独家独户的草房子里，过了一天，鲁中二分区的部队过来，护送我到了驻在大诸葛的司令部。

我沂蒙区、泰山区民兵和广大群众，积极坚持了这次反“扫荡”斗争，他们大破沂蒙、临蒙等公路，并在敌前进的各交通要道埋设地雷，在广大根据地内进行了“空室清野”，广泛开展麻雀战，袭击敌人。山东其他各区也积极配合此次

反“扫荡”，向敌交通线袭扰，牵制了敌人。这次反“扫荡”，我方损失是较重的。

总结反“扫荡”斗争，最基本的经验，就是广泛地发动和坚定地依靠群众。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实践证明，在组织起来的人民面前，凶恶的敌人如同陷入“火牛阵”的野牛，他们成了瞎子、聋子，到处碰壁，消息不通，情报失灵，道路被破坏，住地被袭扰，找不到粮食，甚至找不到水，寸步难行。什么“铁壁合围”、“拉网合围”，在人民的铜墙铁壁面前，统统一筹莫展。人民战争是我们战胜敌人的有力武器，这一点，不论在过去、现在以至将来，都是适用的。

四年的回顾

1942年1月，中央军委命令，八路军山东纵队改为山东军区，八路军一一五师统一指挥山东部队。8月1日，山东纵队正式改为山东军区，黎玉任政委，王建安任副司令员，我任政治部主任。1943年春，为了实现山东部队的统一指挥，山东军区进行了整编，军区与一一五师领导机关合并，罗荣桓同志任新的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黎玉任副政委，肖华任政治部主任。山东分局拟让我任鲁中区党委书记，我根据敌后斗争的实践，提出了三点要求：（1）根据地要有一支能对付敌、伪、顽的主力部队；（2）鲁中区经济非常困

难，请分局给予适当的有效的支持；（3）对于反顽自卫斗争要放点权，即允许我们在顽固派挑衅时可以自卫，打第二枪，甚至在有理有利有节的条件下，允许打第一枪。这三点要求，特别是第三点，没有同意，于是调我回延安学习。后来，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毅同志发言中，对反顽自卫斗争，他也认为不能一概地否定打第二枪或打第一枪，在有理的情况下，应当坚持严正立场，自卫还击，打第二枪，也可以在被迫的情况下打第一枪。如果没有这一点，等顽固派什么都准备好了，我们即使想打也来不及了，必然遭受大的损失。陈毅同志的发言，对我很有启发。

现在回想起来，在山东抗战期间，坚持统一战线政策上，有成绩，也有失误。总的来讲，我们坚持团结抗战的主张，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主动和国民党军队及各种地方力量疏通关系，与一切愿与我军合作抗日的党派、团体及个人真诚团结，配合作战，共赴困难。如国民党山东第六行政区专员范筑先，鲁南抱犊崮山区的地主民团负责人万春圃等，我们都与他们建立了很好的统战关系，帮助他们发展抗日武装，后来万春圃还担任了我鲁南军区的副司令员。还有一大批国民党左派、进步人士、开明士绅来根据地参加抗日工作，如范明枢、李橙之、田佩之、刘民生、张伯秋、梁竹航、牟宜之、孙鸣岗等，范明枢还担任了山东省临时参议会的参议长。他们在“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中有职有权，施展才干，为团结抗日发挥了极大的积极作用。

但是，国民党顽固派却无时无刻蓄意破坏统一战线。以沈鸿烈为首的顽固派凭借军事优势，不断制造磨擦，挑起冲突，进攻我根据地，对顽固派的军事挑衅，在一段时间里，我们斗争不够有力，在统一战线的理解和执行上，对坚

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不够，强调团结联合多，坚持原则斗争少。正如中央所指出的“在统战工作中退让过多”，“秦启荣形同汉奸，多次向我攻击，未能予以有效反击”；中央并强调指出“对付顽固分子之无理举动，以态度强硬为原则”，“对汉奸分子（如秦启荣）必须坚决消灭之”。在反顽自卫斗争中，我也亲身体会到，必须正确理解和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斗争方法，不能教条地、机械地执行政策，该不还手就不还手，该打第一枪就打第一枪，反顽自卫斗争的众多事实也证明，我们越坚强，顽固派越不敢捣乱，中间势力就越向我们靠拢，统一战线也就越扩大与巩固。

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对其内部的反动分子也有斗争不力的问题。1940年秋，东北军五十七军军长缪激流积极奉行国民党的反动投降政策，与驻郯城桃林镇的日寇订立反共投降密约，接受了伪“鲁南十八县剿共军”的番号，当即被其内部进步人士发现，在一一一师师长常恩多领导下，于9月22日发动了锄奸斗争，驱逐了通敌叛国的缪激流。当时的形势本有急转直下，对该师实行彻底进步改造的可能，我军应该而且也可能予以必要的帮助，但我军片面考虑同友军的关系，对其进步力量未有适时的支持，以致该师缪逆的党羽得以几个月后复辟，重新把持了一一一师，并对我军不断制造磨擦，造成滨海地区长期对立与困难的局面。我党在东北军中是有一定工作基础的，有不少共产党员在内。1940年7月，中央军委给山东分局来电，要山东停止在东北军中发展党员，并要原有的党员退出，不退出的也一律停止组织生活。山东分局执行了这个指示。对此，我有不同看法。我认为，中央从维护统一战线的角度出发，决定在友军中不开展

共产党的活动，这是对的。但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东北军中可以停止发展党员，已暴露身份的党员也可以退出，但没有必要将所有的党员全都退出来。一些党员留在东北军中，可以促使其向进步方面转化，至少使其保持中立地位，这要比完全退出来有利得多。

对“山东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和“山东抗敌自卫军”，我与一些同志也有分歧。为了团结国民党区域的进步人士，1939年7月，我们吸收了山东文化教育界进步的国民党人士30多人到根据地参加抗日工作。起初，他们成立了“国民抗敌协会”，由于山东领导过分强调中间力量的作用，于1940年9月，帮助他们改组为“山东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成为半政党的性质，并帮助其在各县、区建立了基层组织，还帮助他们建立武装，名为“山东抗敌自卫军”。自此，他们逐步扩大其组织和武装力量，以至遍及山东各区。后来，一些反动分子利用该会的基层组织进行破坏活动，因而普遍出现与我对立的现象。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加强对敌斗争力量，1942年6月，“山东抗敌自卫军”改归山东纵队领导，下半年，“山东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的活动也逐渐结束。这件事情，虽然由于解决得及时，没有发生大的损失，但也一度给我们造成了不利的局面。我是不赞成帮助这个协会发展组织、建立武装的，曾提过意见，罗荣桓同志也支持我的意见，但未被接受。后来，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任山东分局书记的朱瑞同志就这个问题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他这种不讳言失误，敢于承担责任，坦诚的自我批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尊敬的。

关于群众工作，在较长一段时间里是薄弱的，被忽视的。我认为，主要是我们领导上没有坚定明确地依靠群众的

观念，而是依靠中间阶层和对中间势力的统一战线，对中间阶层的力量信任过高，对基本群众的力量认识不足，因而没有把群众运动放在重要的位置，工农群众没有普遍深入地发动和组织起来，减租减息没有认真开展，群众生活没有认真改善，同群众的关系不密切，不巩固。这些问题，直到1942年4月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来山东指导工作后，才得以解决。

1939年12月，中央曾指示，我党我军和抗日民主力量“在山东应争取优势”。这个任务，到1942年10月还没有完成，就当时的敌友我三方力量对比来看，我方不仅对敌伪处于劣势，即使和友军比较也无优势可言。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除上面讲到的统一战线、群众工作之外，我认为，还有一重要原因，即山东在军事上、政治上长期没有实现集中统一领导。山东抗战，建设根据地，需要主力部队，但我主力部队一一五师入鲁较迟，来后又未能迅速移过津浦路向东发展，过路后又未能尽早实现集中统一领导。1939年8月成立八路军第一纵队，其本来目的是统一指挥山东境内的我军各部队，但实际上只指挥了山东纵队，机关重叠。徐向前同志1940年6月去延安后，第一纵队即与山东纵队领导机关合并。1941年8月，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出了统一山东军政领导的决定，规定：山东分局为统一山东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分局暂由朱瑞、罗荣桓、黎玉、陈光组成，朱瑞任书记；山东纵队归一一五师首长指挥；山东纵队及一一五师两军政委员会合组为山东军政委员会，罗荣桓、黎玉、陈光、肖华、陈士渠、罗舜初和我7人为委员，罗荣桓为书记。但这个决定没有得到贯彻执行，统一只是形式上的。直到1943年春成立新的山东军区后，才真正实现了统一。关于

成立山东军政委员会和我任委员一事，我一直不知道，也没有参加过委员会的活动。在政权建设上，山东也丧失了一些历史的先决条件，没有及时地、主动地组织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各界人士去积极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虽然我们也成立了山东战时工作委员会，但这只是一个群众性的组织，并非正式的抗日政权，其号召力量 and 影响也就有一定限度，甚至一度要求与国民党建立“共同根据地”，放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对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权问题上的无理要求和挑衅，采取退让的办法，没有坚决地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刘少奇同志到山东后，帮助山东分局总结了抗战四年来的工作，朱瑞同志代表分局作了《抗战四年山东我党工作总结和今后任务》的报告，深刻地总结了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指出了日后的斗争方向，山东的抗战形势迅速发生了转折。

1943年夏，青纱帐起来以后，我离开山东，踏上了回延安的路程。

入中央党校

毛主席教我察言观色

由山东回延安，花了半年时间。我们从山东滨海地区出发，先由交通护送过封锁线，到泰山地区，林乎加同志在那里当地委书记。当时，山东各根据地之间虽被敌人分割封锁，但互相建立了秘密交通线，在伪军中也有一些秘密关系，可以较安全地通过。在泰安住了几天，由地委安全保卫人员鲁抱奇同志护送我们过了津浦路到肥城。鲁抱奇同志回归途中，不幸牺牲了。他是个好同志，工作很认真很负责，我深切怀念他。在济南附近的齐河过黄河，进入河北冀南地区，到了邯郸以东杨勇、苏振华同志驻地。其时，正遇敌人“扫荡”，就住了下来。那里地处河北、河南交界处，极贫穷，多为沙地，粮食很少，多枣树，常以枣代饭。我们住在沙地里的草房子里。敌人“扫荡”结束后，我和王彬同志（他也回延安）一起到了邯郸的东北角，这里的伪军同我军有秘密关系。我们在伪军司令部吃了晚饭，然后，由伪军护送过平汉路，敌占区与我根据地之间有铁丝网，剪开就过去了。在太行山根据地住了一段时间，我见到了刘伯承、邓小平、罗瑞卿、滕代远、李达等同志。邓小平同志当时是北

方局代理书记，我向他汇报了山东的情况。离太行时，我同朱虚之同志（军委三局搞无线电的，浙江人）一起走，经榆次，到游击区。一路上都有交通护送。穿过游击区，到山西、陕西交界地区，白坚同志在那里任地委书记，李夫克任司令员。在陕西佳县以北过黄河，然后南下，到绥德抗大总校招待所。我在那里等吴仲廉同志到后，一起回延安。这时已是1943年的冬天了。

阔别延安5年余，这里与敌后相比，又是一番景象。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几年的建设，陕甘宁边区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过去的一年里，边区军民为了克服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经济封锁，响应党中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了大生产运动，边区大地一片欣欣向荣。我一踏入边区，就被这种气氛所感染，心情十分振奋。

我到小鞭沟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住下后，即向中组部报到。中组部干部科科长王鹤寿同志接待了我，他让我先到刘少奇那里去一下，少奇同志见到我，互相问候后，让我赶快去中央党校参加学习，我向少奇同志转达了罗荣桓同志托我带来的关于加强新四军政治工作意见的口信，少奇同志认真地记了下来。

我和吴仲廉同志住进党校后，一天，毛主席听说我回延安来了，就到党校副校长彭真同志处叫我去见面。几年不见主席了，虽然他很忙，肩上担子很重，生活也很艰苦，但由于我们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渡过了最困难的阶段，得到了迅速发展壮大；由于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心情很好，谈笑风生，身体比1938年我离开延安时也更健壮了。毛主席关切地询问了山东敌后及我回延安沿途所见的情况，特别问了这些地区的群众生活，我简要地作了汇报。关

于沿途所见情况，我说，一路走马观花，没有深入了解，只看到一些表面现象，鲁西北、冀鲁豫、太行等地群众生活都比较苦，最苦的是太行山区，老百姓面黄肌瘦，衣衫破烂。在晋西北只住了一夜，匆匆忙忙，谈不出什么。毛主席说，我们的干部，每到一个地方，要察言观色。察言观色，就是看老百姓吃得怎么样，穿得怎么样，脸色怎么样，情绪怎么样，通过这些现象的观察，就了解到了群众生活的基本情况。当然，这还是不够的，但了解群众的第一步，应当是察言观色。最后，毛主席又问我各地的生产怎么样？要我写一个关于生产的材料。我因为一路上没有留心生产的问题，所以没有完成任务。从毛主席的谈话中，我看出，他当时是把组织生产，解决群众和军队最基本的生活问题，克服根据地经济困难，作为头等大事来考虑的。毛主席是十分重视调查研究的，他除了通过正式渠道，从文件、报告、电报中了解情况外，经常找各地回延安的同志谈，通过各种方式作调查，掌握更多的材料。这种深入调查研究的作风和方法是我们永远学习和继承的。

“察言观色”四个字，毛主席赋予了它深刻的含义，我铭刻在心，始终没有忘记。它教我观察问题从个别到普遍，从特殊到一般，从表象入手，进行深入地分析研究，从中找出普遍的本质性的东西；它还教我关心群众，热爱群众，把人民的冷暖甘苦时刻记在心里，当好人民的公仆。

学习《两条路线》

1943年秋，打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以后，中共中央

决定，从10月10日开始，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问题。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最后一个阶段，即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

延安整风运动是从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党的路线问题开始的，中间经过全党范围的普遍的整风，在广大干部中扫除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恶劣影响，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然后又把整风运动转到党的高级干部路线学习上来。这一阶段的任务，是在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根本方向的基础上，对于党的历史上的重大错误进行彻底清算，并作出正确结论。

为了更好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分清路线是非，中央书记处将党从成立到1943年这22年间的重要历史文献137篇编辑成《两条路线》一书，作为学习的主要文件。学习的过程，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首先学习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以后又学习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最后又回到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上来。这种把当前的现实问题和党的历史问题密切结合起来，从现实问题出发，经过历史问题的学习，总结了经验，分清了是非，再回到现实问题上来，从而更好地解决现实问题的辩证方法，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我入党校后，即参加了党的两条路线历史的学习。《两条路线》中的137篇历史文献中，有些是正确的，符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有些是不正确的，违背客观实际的。我们学习的方法，是将自学和讨论结合起来，一篇一篇地学习鉴别，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况，自己分析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再通过讨论，互相启发，统一思想，共同提高认

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分析方法，是我们分析问题的锐利思想武器。通过认真学习和热烈的讨论，特别是许多事情都是我们亲身经历过来的，因此，何者正确，何者错误，也就不难分清了。有些“左”、右倾错误的历史文件，堆砌了不少马列主义的词句和响亮的革命口号，貌似正确，但究竟是否正确，我们判断它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给中国革命和党的事业带来什么后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回头去看，什么“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什么“御敌于国门之外”，什么“苏维埃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什么“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什么“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等等，其要害就一目了然了。这样，对党内历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有了清晰的认识。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发生过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断送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又发生了几次“左”的错误，尤其是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从1931年起，统治全党达4年之久，给革命带来极为惨痛的损失。抗战初期，王明回国，在统一战线中推行右倾投降主义，鼓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和独立自主地位。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统一战线中的投降主义，但在会后，1940年3月，王明还在延安发行了他的“左”倾路线纲领性的著作《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顽固地标榜他“一贯正确”。在深刻认识和彻底清算党的历史上“左”、右倾错误的同时，我们思想上也进一步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路线。

为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党中央组织高级干部，对党的

全部历史，特别是1931年初到1934年底这一时期中央的政治路线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还组织了曾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中工作的同志，召开了各地区、各部队的党史座谈会。我也参加了一些座谈会。有一次接到通知，到杨家岭参加红军政治工作座谈会，会议由周恩来同志主持，我提出，红三军团的主要负责同志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等都不在延安，而一些历史问题，中央又未作出正式的结论，我们这些在下面作具体工作的同志又不了解全面情况，谈不出什么结果，建议座谈会暂缓召开，周副主席采纳了这个意见。我认为凡是红军主力部队，政治工作都是做得好的，但又有各自的特点，红一军团善于做经常性的政治工作，红三军团则善于做突击性的政治工作，突出表现在战前动员、战斗鼓动以及各级政治、军事干部的模范作用上。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保证了部队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战，攻必克，守必固，打不烂，拖不垮，胜不骄，败不馁。这些正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是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和政治优势。

1944年5月21日，在延安召开了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主要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我们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准备参加党的“七大”的一些代表列席了全会，会议进行了11个月，中间多次召开大会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和路线政策问题。最后，于1945年4月20日，会议通过了任弼时同志主持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于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杰出成就作了肯定，阐述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对于党在历史上的若干问题，特别是对1931—1934年底的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

误作了详细的结论。《决议》是全党智慧的产物，它不仅总结了过去，而且对于我们党今后的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六届七中全会为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作了极重要的准备。

在学习党的两条路线历史的同时，还参加了对整风运动中受审查干部的甄别工作。当时，党校一部有一至八支部和一临时支部，临时支部是党校待甄别的干部70多人编成的，原来拟让我担任临时支部的书记。我考虑，待甄别的同志多是从国统区来的，或是在国统区做过党的地下工作的，我不熟悉，不了解国统区的工作情况，不适宜担任这个工作，即向组织上提出了上述意见，于是分配我到一部七支部学习。七支部的书记是赵林同志，古大存同志是一部主任。

甄别干部的工作是同对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资格审查结合进行的。我参加了山东代表的资格审查。经过审查，组织上对我在各个革命时期的工作作了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为我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受“左”倾路线打击受处分一事作了纠正。

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山东根据地来的代表，组成了山东代表团，林彪为代表团团长，康生、朱瑞、陈光和我为副团长。

“七大”后，中央准备从中央党校选200名干部，留在延安，学习理论，研究中国革命问题。毛主席问我愿不愿意留下？我说，不知我够不够资格？毛主席说，愿意留，就够资格。我打算留下，继续学习革命理论。正在这时，抗战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日寇无条件投降，急需大批干部分赴各个战场，因而，学习理论的计划设想未能实现。我离开党校，离开延安，开始了新的战斗。

创建辽东根据地

挺进东北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前仆后继，流血牺牲，艰苦奋斗八年，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为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尸骨成山，血流成河，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从甲午海战到义和团运动，这些斗争都以失败而告终。《南京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诸多不平等条约，一页页记载着中国人民的血泪与耻辱。唯有抗日战争，才以中国人民的完全胜利而载入我们民族反侵略斗争的史册。

胜利的喜讯使延安沸腾起来，队队秧歌，阵阵锣鼓，火把提灯，欢庆队伍夜以继日，整个延安沉浸在抗日胜利的欢乐之中。

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东北，是促使日本投降的决定性因素。百万苏联红军从海陆两路进入我东北地区，迅速击溃了日本关东军，迫使日本政府于8月10日发出乞降照会。当

日，朱德总司令即发布命令，限令日本侵略军及伪军向人民军队缴械投降。次日，连续发布六道命令，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一切抗日武装队伍迅速前进，收缴敌伪武装，接收日本投降，收复敌伪所占地区；并命令我原在山东、晋绥、晋察冀和冀热辽解放区抗击日军的武装队伍迅速向热河、察哈尔和东北地区进发，配合苏军作战，准备接受日、“满”敌伪军投降。

躲在峨嵋山上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却下山来“摘桃子”，抢夺胜利果实。蒋介石于8月11日急急忙忙发布三道命令，要国民党军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要我八路军“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要伪军“负责维持治安”；要日军对我军的收缴“作有效之防卫”，对我军收复的失地“应由日军将其收复”。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收编了50多万伪军，并命令各地伪军，非经他许可，“不得接受任何部队改编”。这样，很快完成了蒋、日、伪的合流，并开始对我解放区进行骚扰和侵占。

对于蒋介石的错误命令，我党我军进行了坚决抵制，8月13日，朱德总司令复电蒋介石，严正指出，这个命令“违背中华民族的利益”。同日，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讲演中，深刻地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的政治形势，揭露了蒋介石篡夺抗战胜利果实、打内战的反动本质，并且指出：我们必须以极大的努力来保卫人民应得的权利，我们的态度是坚决反对内战，并要尽一切努力制止内战。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蒋介石如果一定要将内战强加给人民，我们则用武器和战斗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毛主席

席反复强调，“人民得到的权利，决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

正是中国革命面临着这一新转折的关键时刻，中央决定在延安参加“七大”的各根据地同志迅速返赴各个战场，开辟新的工作。8月24日，我们二十几人一起乘坐一架美国运输机离开延安，同行的有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薄一波、滕代远、陈赓、肖劲光、张际春、傅秋涛、李天佑、邓华、陈锡联、陈再道、宋时轮、杨得志、聂鹤亭、邓克明、王近山等同志，毛主席很关心这次飞行的安全，让叶剑英亲自进行检查，要每人带好降落伞上飞机，并由黄华担任翻译。

飞机由延安东关机场起飞，顺利地飞到太行山区八路军总部驻地，降落在晋东南黎城县的长凝临时机场，我们在八路军总部住了大约一个星期。当时，在华北一带，日伪军尚未放下武器，并拒不执行向我八路军缴械的命令。为此，中央曾拟集中兵力，解放太原。但那时部队大多以营连为单位分散在各地，一时很难集中，因而作罢。我们回山东的和新四军的一行人又继续上路东行。

到河南濮阳，过县城30里的地方，接到中央电报，要我们回山东的一行人迅即转向去东北。我们即停下来商量，走哪条路线？我们已得知山东派钱钧同志带一个营在肥城接我们，如果我们到了山东再转去东北，路途更远一些，不如即直接由这里经河北还方便些。于是，我们同陈毅等新四军的同志们分手，又转回濮阳。

在我同陈毅同志同行的路上，他曾提出要同他一起去新四军工作，我请他去与林彪谈，不知他们谈过没有，对此，我个人是不好表示意见的。因为，当时中央决定我同林

彪、肖劲光、邓华、李天佑、聂鹤亭等回山东。

我们原拟回山东的一行人即由濮阳转道北上，径赴东北。在行进的路上有一件令人感动的事。我们路过冀南解放区南宫县境时，当地同志听到我们路过的消息，连夜赶修公路，准备迎接大军过境。其实，那时我们既无车也无炮，只有一支小部队护送。过南宫白洋淀地区，曹里怀同志带着一个团迎接并护送我们到了霸县，与陶铸等一批去东北工作的同志会合。我们过京津铁路后，在冀东三河县住了几天。冀东是东北的门户，是国民党从陆路进东北的主要通道，中央曾拟成立冀热辽军区，由林彪任司令员，李富春任政治委员，以赤峰作后方，划分冀东作战区。在三河时，林彪等人曾去附近一带看地形，我和邓华同志也去调查、了解冀东地区的民兵状况，准备迎击国民党军队的进犯。届时，我们又接到中央电报，命令我们继续北上，离开三河，走了两天，到山海关，这时已是10月了，东北局派火车来接我们。

火车隆隆地行进在东北辽阔的大地上。我坐在车厢里，朝窗外极目凝望，稀疏的树木，空旷的田野，显得十分凋零，经年的战乱和侵略者的掠夺，使被誉为宝地的关东，满目疮痍，破烂不堪。想着即将到来的工作和战斗，我耳边响起毛主席在党的“七大”上关于东北问题的讲话，他精辟地阐述了东北的重要战略地位，提出要把东北建成中国革命的巩固根据地，并且特别指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基础。他还说，现在我们的基础是不巩固的，我们的根据地，现在在经济上还是手工业的，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没有打成一片。毛主席这些话，充分说明了加强东北工作极重要的意义。为了实现这一重大的

战略意图，党中央、毛主席及时作出了全党力争东北、把东北建成巩固的战略基地的重大决策，从各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部队进入东北。（后来我才知道共抽调2万多干部。10余万部队进入东北。）中央要我去东北工作，我是很高兴的。东北确实是一块理想的建立根据地的好地方，土地肥沃，矿藏丰富，有高山密林，有大江大河，更有较好的工业基础；它背靠苏联、蒙古和朝鲜，回旋余地比较大。想到这里，我对东北的前途，对中国革命的未来，对我即将迎来的工作，充满了信心！

火车在锦州停下，李运昌同志的司令部设在这里，他向林彪汇报了情况。我们继续向沈阳前进。当时，沈阳由苏军占领，火车不能开进，我们便在离沈阳不远的的一个车站停下来，换乘大车进城，向东北局报到。

接收伪满政权

在沈阳停了几天，林枫同志通知我，东北局决定我到安东省工作，任中共安东省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书记是肖华同志，副书记还有林一山同志。省工委驻安市（现丹东市），管辖区域几经变化，大体上是现辽宁省的东部，包括抚顺、本溪以东以南的辽东半岛地区，和现吉林省的抚松、临江、通化以南地区。当时，安奉路（即丹东至沈阳的铁路）还通车，林枫同志同我谈后不几日，我即同罗其南、杨昆岚等同志一起乘火车到了安市。其时，肖华、林一山同志早已到了这里，我们一起住在鸭绿江造纸厂里，省工委机关也设在这里。这个纸厂原是张学良建的，以后由日伪经

管。该厂规模很大，机器设备很不错，主要生产高档纸张，如卷烟盘纸、钞票纸等。我们接收后，很快恢复了生产，并成为安东省的主要财政来源之一，辽东地区军队和地方干部十几万人的供给主要是靠安东的几个大厂子，所谓“穿的是纺织厂的布，用的是造纸厂的钱”。这些都是后话了。

我是11月初到安东的。安东地区的政治情况复杂，社会秩序混乱，伪警武装尚未解除，夜晚时闻枪声，人民生活不安定。我军在9—10月间已陆续由海陆两路分批进入安东地区。安东地区同东北其他地区一样，在苏联红军的军事管制之下，苏联红军给予我们很多支援，但是由于受雅尔塔协定和同国民党政府签定的中苏协定的约束，地方政权未能全部让我们接管。

这时，国民党军队还没来得及侵入东北地区，国民党的伪安东省主席高惜冰等“接收大员”到了长春，未敢来安东，但国民党特务分子挂出了“县党部”的牌子进行活动。敌伪分子在蒋介石国民党“曲线救国”的命令下，以“负责维持地方治安”的名义，成立了“维持会”，原日伪安东省省长曹承宗摇身一变当上了安东省地方维持会会长。安东地区各城乡和各行业也都组织了“维持会”。日满时期的伪警察也改头换面，黄军服染成青军衣，还是那些人，仍保持原来的建制和武装，又成了“维持会”的警察。国民党特务、汉奸和地方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以“维持会”的名义和形式继续实行反动统治，欺压人民，并且明里暗地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妄图等待国民党政府的接收。

安东地区的农村、山上还有多股武装土匪，这些人主要是伪满的警察、特务、地主武装等等反动分子，还有一些日本散兵游勇、开拓团、浪人等军国主义分子。这些股匪大多

数接受了国民党的委任，实际上是一些政治土匪，杀人放火，奸淫虏掠，暗杀我工作人员和革命群众，组织暴动，无所不为。

安东地区的人民群众长期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压迫，对日寇和伪满汉奸有深刻的仇恨。我党在安东地区的工人群众中早有一定的影响，在20年代就建立了组织，开展了一些活动；“九·一八”后，抗日联军在长白山一带顽强地进行了抗日斗争；安东地区与胶东半岛隔海相望，山东、华北老解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都对它有一定影响。这一切决定了安东人民有较高的民族觉悟。但是他们又受到日满反动宣传和奴化教育的较大影响，对祖国的认识很抽象，不知道蒋介石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把国民党政府、中央军认作是“正统”，加之汉奸、特务、警察的威胁、欺骗，以至有相当部分群众对我党我军还缺乏全面认识。

上述就是我刚到安东时的基本政治情况。事情很明显，我们要想在这里站住脚，建立革命的根据地，首要任务就是要彻底摧毁敌伪残余势力，建立人民的革命政权。我由沈阳动身时，东北局的领导同志曾一再叮嘱，要我到安东后，尽快解除敌伪警察武装，把枪杆子牢牢掌握在人民手里，才能有利地控制局势，建立人民的革命秩序，推动各项工作。我到安东后，即传达了 this 指示。在我到安市前几天发生的“三股流”事件促进了我们接收安东的地方政权和解除警察武装的工作。当时，在安东郊区有敌伪残余势力组成的武装土匪千余人，其中有200名溃散的日本关东军，他们与国民党的地下人员勾结在一起，打着“中央先遣军”的旗号，欺骗、蒙蔽安市原“国高”的一部分学生，利用学生单纯的

反日爱国热情，组成“爱国先锋团”，并且造谣说进入安东的八路军是“土匪”，要学生们拿起枪来，迎接“中央军”。在国民党特务的煽惑下，学生们被骗上了安市市西山叫“三股流”的地方，与残余的日军、土匪混杂在一起。10月24—25日，我军歼灭了三股流一带的土匪武装，解救回被蒙蔽的青年学生，并且获得了维持会、警察和国民党特务勾结日、匪军图谋叛乱、危害人民的大量人证物证。我们向苏军司令部详细介绍了战斗经过和缴获的人证物证情况，从而使苏军对他们的罪行有了较清楚的认识。我们派吕其恩同志与苏军联系，由我军与苏联红军一起缴了伪警察的枪枝。接着我们建立了人民警察武装，成立了安市市保安司令部，由吕其恩同志任司令。

在消灭三股流武装土匪的前后，在整个安东地区，我主力部队以团营连为单位，分散于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与地方武装相配合，展开了对日伪残余、汉奸、土匪的全面进剿。先歼灭了盘踞在海城、岫岩、大孤山、瓦房店一带的1500余名土匪，然后集中兵力围歼纠集在千山一带的大股土匪。这股土匪以国民党特务邓国庆为首，包括1000余名日寇和2000多名伪满国兵、警察、宪兵，编为3个团，企图凭借千山险要地形及日式武装与我军对抗，等待国民党收编。11月28日，我全部肃清了千山及其附近地区的股匪。与此同时，本溪、新宾等地的土匪也被我肃清了。1946年2月3日，通化地区国民党特务孙耕晓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藤田策动日寇5000余人暴动，当日即被我军镇压。总计从1945年10月起，经过3个月的剿匪，共歼灭日伪残余、土匪15000余人，解放了安东地区的所有城镇。少数零星土匪逃窜到辽河以西的辽台盘地区，投靠了占领锦州的国民党军队。

剿匪的胜利，为建立地方政权和加速接收、建设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1945年11月初，安东省和安东市先后建立了民主政府，省政府主席高崇民，副主席刘澜波；安东市市长吕其恩，副市长张雪轩。民主政府公布《安民告示》，阐明了我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奋斗的政治主张，以及对工商、文教等各行各业和对伪职人员的方针、政策，安定了人心。随之，又派出一批干部，分赴各县、市工作。到1945年底，安东、通化地区所属全部县市，普遍建立起民主政权，社会秩序安定。安东人民在安东省委和各级民主政府的领导下，向着“和平、民主、团结、建设”的道路迈进！

反奸清算

1945年冬是东北地区政治军事形势激烈变化的时期。东北广大地区的人民正在欢庆解放，并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开始走上光明生活大道的时候，国民党蒋介石却要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强占东北，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帮助下，向我东北地区大举进军。10月11日，美舰21艘载运国民党军队在秦皇岛登陆。11月16日，在美国飞机的掩护下，国民党军队攻占山海关。11月26日，国民党军队占领锦州，并继续北犯。12月22日，美海军直接把杜聿明部运往东北。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又利用中苏协定，要苏军让其接收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及东北各地政权。一时间，东北地区乌云滚滚，刚从日满反动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东北人民，又重陷于蒋帮奴役蹂躏的深渊之中。

鉴于此种形势，我们独占东北已无可能，严峻的斗争不可避免。对我党在东北的工作方针和战略部署，党中央在1945年11月、12月多次作出指示：要从东北的大城市中撤出，去占领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并且指出，我们在东北要取得对国民党斗争的胜利，主要决定于东北人民的支持和我党我军与东北人民的密切联系，要好好进行发展群众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帮助群众反对汉奸、特务，开展减租运动，只要我们能够争取广大农村及许多中小城市，紧靠着人民，我们就能取得胜利。

中央的指示，使我和省委的同志对当前政治军事斗争形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前一段的实际工作中，我们也体会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建立巩固根据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我们回顾前一段工作，由于我军抢在国民党前面迅速进入安东地区，占了先机之利，在政治、军事上都占了优势。在刚进入安东地区的头一、二个月里，工作重点侧重在剿匪、扩大武装、搜集与分配物资等方面，这是必要的，使群众政治上翻身，经济上得到部分利益。各地的人民政府虽然已经建立起来，对维护社会治安和扩大我党政治影响等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广大群众尚未充分发动，对敌伪残余势力尚未给予毁灭性的打击，国民党军队又大举进犯，群众的思想顾虑很多。情况很清楚，我们要在安东地区创建根据地，就必须深入发动群众，把广大群众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为此，在1945年冬，在各地建立民主政权的同时，我们突出抓了发动群众的工作，从城市到农村广泛开展了反奸清算斗争的群众运动。1945年12月1日，安东省工委发出了《关于目前开展群众运动的指示》，指出：“目前的中心工作，应明确规定，以放手发动群众，大胆与普遍领

导群众起来斗争，大量组织群众，其他改造伪政权、扩军、搜集敌伪物资等工作都应有机地配合这一工作。只有群众发动起来了，我们才真正有了力量，有了干部，才能更迅速地扩大武装，搜集更多的物资，彻底摧毁伪组织，肃清一切反动分子、警察、土匪、特务分子，才能更进一步扩大民主，巩固政权，这样我们才是真正有了一切。”《指示》还提出，当前的斗争任务和斗争对象，应是“通过人民的民族觉悟去解决以民族形式出现的阶级斗争”，以反奸、清算、减租、增资为中心，反对日寇汉奸、特务、走狗、卖国贼的残余势力，从斗争中建立与组织各级工会、农会；并且响亮地提出了“申十四年冤，报十四年仇”的口号。同时，省委还提出，要在群众斗争中注意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从此，一场大规模的群众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首先逮捕处决了伪安东省省长曹承宗和伪安东省次长渡边兰治。曹承宗是一个死心塌地忠实于日寇屠杀蹂躏东北人民的战争罪犯，“九·一八”前就当汉奸，任日寇东北交涉署科长，“九·一八”事变后，当上了伪满洲地政总局局长，1941年任伪安东省省长。他在任地政局长期间，卖力地替日寇军阀霸占我东北的土地、房屋，使无数人民流离失所，亡命他乡；任安东省长后，更榨尽了安东人民的血汗；日寇投降后，又当“维持会”会长，号召安东人民勿对敌人清算血债和报仇申冤，鼓吹“大国民风度”，“力持镇静”等等，阻止人民的解放斗争，继续效忠日寇。渡边是日寇屠杀蹂躏我东北人民最凶恶的罪犯之一，被其鞭打、捕杀的人民群众实难以数计，还大量侵占人民田地，仅凤凰城一带即被其侵占近千亩良田。安东群众对他们莫不切齿痛恨。民主政府刚成立，人民便纷纷控告该两罪犯。安东省民主政府根

据群众的控告，经过审讯，于1945年12月12日判处两犯死刑。

镇压了曹承宗、渡边，在安东全省引起极大反响，日寇、汉奸加在人民头上的精神枷锁被彻底砸烂了，被奴役压迫14年的民族仇恨如火山爆发，势不可挡，人民控诉日伪汉奸、特务的群众运动汹涌澎湃地开展起来。从12月16日开始的安奉铁路员工反对李剥皮、郑剥皮的斗争，把反奸清算运动推向高潮。李剥皮、郑剥皮是日寇豢养的血债累累的两条汉奸走狗，李剥皮名李毓明，是安奉路警护团团团长；郑剥皮名郑重芳，是警护团的日本特务。警护团是满洲铁路警护部领导的护路武装，归日本关东军大本营管辖。李剥皮、郑剥皮依仗其警护团的职权和日寇反动势力，无恶不作。根据群众控告和调查不完全统计，被其杀害的铁路员工有16名，残伤的近800人，至于对铁路职工、乘客以及沿线市民、农民敲诈勒索，强抢硬夺，随意毒打、捆绑、关押、滥施刑法等等，无辜受害的更是无法计数。安东解放以后，他们拒绝我军事代表进驻，在我们实行军管、停止了警护团的一切工作和活动后，还在暗地里散播谣言，恐吓群众，并将800多条枪支隐藏起来，准备暴动。安奉路广大职工对李剥皮、郑剥皮恨之入骨，强烈要求法办李剥皮、郑剥皮，为被害群众报仇雪恨。在安东省工委领导下，由省总工会田力夫等组织工作队赴安奉路各站、段，深入到职工和市民群众中进行组织发动工作。同时，公安部门逮捕了李剥皮、郑剥皮，从而解除了群众怕斗不倒、怕报复等顾虑。在省工会的组织下，召开了被难家属座谈会，以及各种形式的控诉会，号召大家起来申冤报仇，与剥皮算帐；同时，把群众揭发控诉李剥皮、郑剥皮罪行材料利用报纸、电台扩大宣传，很快掀起了诉苦

控诉高潮。20多天里，在安奉路沿线各站共开了30多次控诉斗争会。1946年1月11日召开了公审李毓明和郑重芳大会，参加大会的有铁路职工、市民、农民以及省市各机关、厂矿企业、群众团体代表等共20000余人。大会首先由受难人和被害人家属、亲友控诉，继而又举行了被害群众的追悼大会。当控诉到受难受害者被李剥皮、郑剥皮迫害得家破人亡等惨景时，参加大会的群众都声泪俱下，义愤填膺，一致请求民主政府为人民作主，严惩罪犯。安东省民主政府宣布接受群众的申诉，立即处决李毓明和郑重芳。这时，群众欢跃高呼：安奉路的天真正亮了！工人们解放了！中国共产党万岁！民主政府万岁！

安奉路反对李剥皮、郑剥皮的胜利，在安东地区发生了巨大影响，反奸清算斗争的革命风暴吹遍了安东省城乡。截止1946年3月不完全统计，安东地区共举行了反奸清算斗争1040余次，参加斗争的有93万余人，审判处决了战犯、汉奸、特务72人。反奸清算及时地打击了敌伪残余势力的反动嚣张气焰，有力地镇压了国民党地下组织的反革命猖狂活动，推动了扩军、生产、支前等各项工作，群众政治觉悟大大提高，斗争积极性大大高涨，共产党、民主政府在人民群众中赢得了巨大的威望，为建立巩固的辽东根据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45年12月，我和肖华同志到了本溪。东北局已从沈阳撤到这里。东北局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由于国民党军的大举进犯，战争已不可避免，严重的长期的斗争已摆在我们面前，南满和北满之间将会出现分割局面。为了加强辽东根据地的建设和统一作战指挥，更好地坚持辽东的斗争，1月10日，东北局决定将辽东、安东两省工委合并，组建辽东省

委，管辖安东、辽宁两省分委；并成立辽东军区，辖第三、第四纵队和辽宁、安东两省军区；辽宁省军区辖杨靖宇支队（后改为李红光支队，指战员绝大部分是朝鲜族人），安东省军区辖一警卫团。肖华任辽东省委第一书记兼辽东军区第一政委，程世才任军区司令员，我任省委第二书记、军区第二政委，罗舜初任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曾克林、吴克华任副司令员，莫文骅、唐凯任副政委兼政治部正、副主任，李力果任省委秘书长。6月，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辽东省委决定成立了辽南省分委、辽南行署、辽南军区（辖辽南独立师）。这就更有利于深入发动群众，积极进行扩军备战，准备迎接艰巨的长期的斗争。

深入农村

1945年12月28日，中央发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重要指示，对东北的工作方针和军事斗争作出了更加明确、更加具体的部署，对东北形势的胜利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道路。“指示”明确提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到距离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把工作重心坚决放在群众工作上，发动群众进行反奸、清算、减租、增资运动，给东北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这样群众才会拥护我们。“指示”特别强调，在东北工作的干部和部队，要人人下决心，进行最艰苦的工作，迅速发动群众，动员一切力量，从事建立根据地的伟大斗争。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我们从1945年冬开始，在城市进行反奸清算斗争的同时，深入安

东广大农村，蓬勃开展了以反汉奸、反特务、反贪污和减租减息为中心的群众运动。

在安东农村，日寇侵入后，积极扶持农村的封建地主势力，使土地占有更为集中，农民所受的剥削更为残酷；日寇又实行开拓政策，以日本“满洲拓殖会社”和伪满“开拓总局”的名义组织的各种开拓团，掠夺了大量良田好地，变成所谓“开拓地”、“满拓地”，许多日本人也趁机霸占土地据为己有，使大批农民丧失了土地，沦为佃户或雇农。这些土地又租给中国人或朝鲜人耕种，从而出现了不少经营地主。日寇的这种农村政策，促使土地占有高度集中，无地农民大量增加。安东省统计，占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有土地70%以上，而50%的人却没有土地。东北农村雇工多，这也是与关内各地不同的特点之一。再一个特点是，敌伪对人民的基本生活资料实行配给制度，配给店控制了农村生活命脉。县村屯政权、警察、特务、协和会、兴农合作社以及配给店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日寇在农村的统治基础。地主大多数都与伪吏、警察、特务有联系，或者二位一体，地主本身就是日寇的汉奸、走狗。在东北人民中广泛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关东军、宪兵队，特务、警察、协和会”，东北人民最怕这些人，对他们也最为痛恨。

群众一经发动，仇恨的烈火很自然地首先集中在作恶多端的伪乡屯长、配给店掌柜等汉奸、特务身上，清算他们霸占田地财产，借“劳工”、“出荷”、配给中贪污、克扣钱粮油盐，以及欺压乡民、残害百姓等罪行，政治帐、经济帐结合起来，掀起了一阵阵斗争高潮。如凤凰城大堡区农民向汉奸姜永全算帐，姜当了14年伪村长，一贯欺压鱼肉乡民，是日满的一条忠实走狗，敌人要100个劳工，他送去120个，

要1000石出荷粮，他送去1200石，日满奖他为“模范村村长”，“功劳奖状”挂满了伪村公所。14年来，他的地由26亩变成600亩。日寇投降后，他还说敌人是“假投降”，买了礼物送给溃逃下来的日本兵。过去老百姓见了他连话都不敢说，现在吐出了14年怨愤，迫使他向群众低下了头，退出了侵吞强占的田地财物。本溪县，1946年1月10日—2月10日，一个月中发动40次群众斗争，有1.1万农民得到了清算果实，并通过斗争有39个村建立了农会。据1946年3月安东省7个县不完全统计，共清算出粮食4258万余斤，款1475万余元，土地16000余亩。被汉奸、特务、恶霸剥夺走的血汗财产，在共产党、民主政府的领导下，又回到了人民自己手里。

清算斗争的初步胜利，鼓舞了广大农民的斗志，并在斗争中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不少地方成立了农会。组织起来的农民群众，政治觉悟逐步提高，他们迫切要求减轻封建地租剥削。安东农村的地租一般在50%以上，有的地方高达70%，农民终年劳苦，不得温饱。有的地方，在向汉奸、特务算帐的时候，就有农民到地主家要求减租，当时地主很顽固，不仅不应允，还把农民骂了出去。我们坚决支持农民的正义要求，及时引导群众进一步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在农民运动的强大威力下，至1946年3月底4月初，安东省大部分农村实行了“二五”减租。据不完全统计，安东、桓仁、赛马、宽甸4个县，在减租减息运动中，有13000多户佃农参加了斗争，地主退还租粮54万石，押金180万元。不少地方还没收了敌伪掠夺的“开拓地”、“满拓地”和日寇、大汉奸的土地，分配给了贫雇农耕种。

正在运动深入发展的时刻，1946年5月，中央发出了

《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必须明确认识解决土地问题是全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和领导目前的群众运动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指示》还指出，要坚决拥护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并且明确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一系列政策原则。7月7日，东北局通过了陈云同志起草的《东北形势和任务》的决议，指出：必须坚持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正确方针，准备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把创造根据地作为第一位的工作。决议号召：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去，发动农民群众，迅速普遍执行“五四指示”，并且强调要造成一个面向农村，深入农民的热潮。这一决议使我们对创建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意义更加深了理解，并使我回忆起从井冈山根据地时的打土豪、分田地以至长期以来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只有解决土地问题，帮助农民从根本上翻身，农民才会坚定地跟我们走，农村革命根据地才能建立、巩固和发展，革命战争才能获得雄厚的物质基础和人力资源。相反，如果没有农民的支持，我们就注定要失败，也就不可能在东北建立根据地。根据“五四指示”和“七七决议”精神，我们迅即派出5000余名干部下乡，发动群众，在辽东全省广大农村普遍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在运动中，各地都集中向汉奸、特务、豪绅、恶霸进行了坚决斗争，使他们完全孤立，没收了他们的土地；对于中小地主，一般都是经过群众，采取调解仲裁的办法，使他们拿出土地；对富农的土地则一般没有动。到9月底，安

东、辽宁（现辽宁中北部地区）两省不完全统计，共分配土地370万亩，无地少地的贫雇农普遍分到了土地，在山区，一般每人分到1—3亩耕地，平川一般每人可分得4亩。几十万分得了土地的贫雇农欢天喜地，在政治上经济上真正得到了翻身。

坚持辽东

1946年上半年，东北的战局打打停停，变化多端。国民党为了扩大内战，欺骗人民，于1月10日与我军达成停战协议，但声称不包括东北在内，军事执行小组的美方代表也不制止国民党破坏停战令，形成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在这期间，国民党除原在东北的十三军、五十二军外，又将其两大主力新一军、新六军和七十一军相继调入东北。3月12日，国民党五十二军从苏军手中以接收的方式进占沈阳，随即配合新一军、新六军，以沈阳为中心，向沈阳以南、以东、以北展开进攻，先后占领辽阳、抚顺、铁岭。尽管国共双方于3月27日达成了关于派遣三人执行小组来东北进行调处的决议，但国民党军向我军进攻的势头有增无减。从4月开始，敌军北攻四平，南打本溪，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军予敌军以沉重打击后，主动撤离了这些城市。

1946年7月，东北国民党主力增加到7个军25万人，加特种兵和地方军，总兵力达40万人。国民党军虽然已经占领了东北中心战略要地，但要继续向北满进攻，深感南满我军对他的威胁，后顾之忧甚大。因而确定了“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作战方针，企图首先消灭南满我军，尔后集中兵力

向北进攻。1946年10月，国民党集中8个师，10万多人，分三路向我辽东根据地全面进攻，战火再次燃烧起来。

10月下旬，敌军很快就要进到安东，24日，我召集在安东的党政军负责人开会，布置加速撤退工作。26日，我们主动撤离安东。安东市的1000多名工人、青年学生也随我们撤出，这些人后来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离开安东时，我们张贴了“安民告示”，告诉群众：我们还是要回来的。

我带着辽东军区的后方机关往临江撤退。曾克林、吴克华、莫文骅、唐凯等同志也和我在一起。过了暖河，离宽甸不远的地方，接到四纵队报告，说在赛马新开岭地区（今属凤城）与敌五十二军二十五师接上了火。我们分析了情况，敌军孤军深入，兵力对比，我四纵队占优势，地形也对我有利，同意四纵队集中兵力下决心消灭这股敌人。敌二十五师是抗日战争时国民党远征军的主力之一，全副美械装备，战斗力较强，他们固守阵地，我屡攻不下，战斗打得很激烈。当时，四纵只有两个师（十一、十二师）和另外一个团参加战斗，正当双方对峙不下，我援军四纵队副司令员韩先楚率第十师赶到，立即投入战斗，给敌军致命一击。敌8000余人全部被歼，敌师长李正谊、副师长段培德被俘。新开岭战役开创了东北我军在解放战争中歼灭敌人一个整师的先例，极大地鼓舞了我军士气，打击了敌军的嚣张气焰。党中央高度评价了这次战役。

10月底，为了加强辽东地区党的领导，东北局派陈云、肖劲光同志到辽东。10月31日，中央决定成立新的辽东分局、辽东军区。陈云、肖劲光、肖华和我为分局委员，陈云同志任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肖劲光同志任分局副书记兼军区司令员，肖华同志任分局副书记兼军区副司令员，我任分

局组织部部长兼社会部部长。

当时，辽东的形势是险恶的。大部分地区已被敌占领，我根据地只剩下长白山麓的临江、濛江（现名靖宇）、长白、抚松4县狭窄地区，长白山和两条大通沟占据了大部分土地，交通不便，人烟稀少，整个地区只有20多万人。时值隆冬季节，辽东分局、军区、辽宁省委和安东省委机关的一部分，以及三纵、四纵主力部队，都聚集在这一带，粮食困难，兵员无着，一切人员的衣食住藏都成了大问题。加之敌4个师兵力正猛扑过来，情况异常危急。

要不要坚持辽东？能不能坚持辽东？在党内是有争论的。有的同志主张放弃辽东北上；有的同志主张坚持辽东；也有的同志主张大部分撤到北满，留少数部队坚持辽东；也有的同志主张先在辽东打一仗看看，打不赢就北上，打得赢就留下不走。我是主张坚持辽东斗争的。我认为，敌人的计划就是要把我第三、四纵队消灭在辽东或赶走，以解除北进的后顾之忧。如果我们撤走，就正中敌人下怀；而坚持辽东，就拖住了敌人。我军保持北满、辽东两个拳头，总比只剩下一个拳头要好，敌人不但不能消灭我们，我们还能有力地打击敌人。因此，一定要留下来坚持斗争。至于能不能坚持住，我认为还是有条件的。陈云、肖劲光同志到辽东来，加强了党的统一领导，加上我三纵、四纵从兵力到装备都要优于红军初建时期的一、三军团，战斗力是相当强的。我辽东与北满互相配合，互相支援，一定能够粉碎蒋军的进攻，最终取得胜利。总之，我们必须坚持辽东的斗争，也是能够坚持的。

在临江的一天晚上，我和吴克华等几个同志到陈云同志房子里去。陈云同志征求我们对走与留的意见。我毫无保留

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的意见也很明确，他和肖劲光同志来辽东就是为了坚持，而不是带兵北上的。陈云同志从不同的角度，既从我方又从敌方，提出了一些问题，我们一个一个地分析讨论。我们围着炭火，谈了将近一个通宵，完全忘记了窗外的寒风和大雪。

陈云同志考虑问题的全面、周到、缜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还想起一件事，1948年辽东分局撤销时，我在哈尔滨处理善后工作，一天我到陈云同志家作客，在座的还有毛主席的儿子毛岸青。陈云同志对毛岸青说：我从你老子那里学到了两个方法，一是对比，二是反复。他解释说：对比就是上下、左右、正反各方面加以比较，进行研究。我们分析情况，处理问题，要提出几个方案，进行对比，看哪个更有利一些，这样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看问题，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还要听取不同意见，如果没有不同意见，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吸收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陈云同志的这些话，我一直记忆犹新。从这里可以看到，陈云同志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方法和工作方法是理解得很深很透的，并在实践中自觉地运用，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根据分局的决定，在同陈云同志通宵谈话的第二天，我即去了朝鲜，主持辽东的后方工作，整顿和统一协调辽东驻在朝鲜的后勤部门及各方面的工作，统一与朝鲜方面的联系。朝鲜劳动党、政府和朝鲜人民对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是热情支持的，给予了我们很多帮助，朝鲜沿江一带成为我辽东的可靠后方。在朝鲜工作的半年，我深深地体会到朝鲜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与我去朝鲜的同一天，陈云同志也离开临江，赶到七道江，参加了在那里召开的辽东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即著名的“七道江会议”。肖劲光同志已先期到了那里。在会上，对坚持还是放弃辽东，争论很激烈。陈云同志认真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他精辟地分析了敌我态势，权衡“去”与“留”的利弊，说服了主张走的同志，统一了干部的思想。最后他表态：“我们不走了，都留在南满，一个也不走！留下来打，要在长白山上插红旗，摇旗呐喊！”一言九鼎，落槌定音。七道江会议确定了坚持长白山根据地和敌后三大块（即辽南、辽宁、安东）游击区斗争的方针。

从1946年冬到1947年春，在陈云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我辽东地区全体军民万众一心，团结奋斗，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英勇顽强地坚持了辽东的斗争。经过3个多月连续作战，四保临江，在北满部队三下江南的配合下，打退了敌人向长白山根据地的进攻，歼敌数万人，彻底粉碎了敌人“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巩固和扩大了辽东根据地，迫使东北敌军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而我军则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辽东根据地进一步扩大了。

放手土地改革

1947年6月，我军第二次解放了通化、安东，辽宁、辽南、安东三大块解放区连成一片，除本溪、鞍山、抚顺三城市仍被敌人占领外，辽东广大地区又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我也从朝鲜回到通化。

在敌人占领的半年中，辽东大地被反革命的白色恐怖笼

罩着，到处充满了暴行和血腥。地主阶级依仗着国民党反动势力，卷土重来，向广大群众展开了疯狂的反攻倒算，50%的区级干部被杀害。他们残杀我农会干部和积极分子，从农民手中夺回被分掉的土地、房屋、粮食和财产，带领国民党军队到处烧杀抢掠，抓丁抓夫，派粮派款，弄得民不聊生，鸡犬不宁。他们还建立了反革命政权和反动武装，妄图长久地统治下去。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阶级的所作所为从反面教育了群众，使他们认清了国民党的真面目，少数曾经对国民党抱有“正统”幻想的群众，在事实面前发出了“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的感叹。辽东广大人民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终于期待到了第二次解放，跳出了苦海。

面临如此有利的军事、政治形势，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更大胆迅速地发动群众打倒地主阶级，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巩固和发展根据地，支援战争，争取全东北的早日解放。1947年6月3日，东北局发出了《关于新收复区工作的指示》，强调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坚定不移地在政治上经济上清算蒋伪汉奸恶霸地主的罪恶，让群众出冤气，吐苦水，长自己的志气，灭反动派的威风；要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迅速解决土地问题，使千百万农民从汉奸恶霸地主手中夺回土地，彻底摧毁封建势力。辽东分局也就收复区土改问题给各省委、各工作团写了一封信，总结了1946年土改的经验教训，指出，打倒地主阶级、消灭封建制度的关键，是要掀起群众阶级斗争的怒潮，并且明确提出，汉奸恶霸大地主是斗争的主要对象，对中小地主也必须经过农民的清算斗争，达到土地归还农民的目的。与此同时，我们组织了2000余名干部连同北满来的4个工作团一起下乡，发动群众，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

土地改革的关键在于发动群众。只有将农民群众的阶级仇恨充分激发出来，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形成了群众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才能达到打倒地主阶级、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目的。在这方面，各地都有许多成功的经验。本溪、柳河等县首先召开了全县农民代表大会，在会上斗争了几个影响较大的地主，点火轰开了局面，再派干部到各乡村鼓劲吹风，撑腰壮胆，帮助群众，指导斗争，整个县很快就发动起来了。还有的县举办土改训练班，大规模地培训骨干，提高政治觉悟，鼓励斗争情绪，交待政策，然后再到全县各地去开展运动。

1947年10月、11月，根据辽东分局的决定，我从通化出发，经桓仁、宽甸到安东检查土改工作。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着重讲了放手发动群众的问题。我说，要达到土地改革的目的，就必须发动贫雇农阶级去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地主封建势力不是闺房绣花，而是大风暴式的群众运动，象洪水般地直冲。如无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就无法完成土地改革，也就不能消灭敌人。要相信广大的贫雇农阶级，要大胆放手，把组织贫雇农、树立贫雇农优势放在首位。因为贫雇农翻身问题是土地改革的根本问题。贫雇农是土地改革的主力军，是我们党在农村中的依靠力量。我还说，在发动贫雇农的过程中，必须将中农团结起来。辽东的中农约占人口的20%，在斗争地主、打倒封建这个大方向上，它同贫雇农是一致的，是贫雇农可靠的同盟军。但是，在运动开始时，不宜把树立贫雇农阶级优势同团结中农相提并论，不宜把主力军和同盟军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因为在贫雇农还没有发动组织起来时，也无法团结中农，所以一定要先形成贫雇农领导核心，树立其优势，同时，教育贫雇农，要坚决地紧密

团结中农，特别是不要伤害中农和侵犯他们的利益。

在土改期间，我给各省委和地、县的同志写了一些信，了解各地的土改斗争情况以及出现的问题，总结经验教训，转达分局对一些政策问题的指示，有时是陈云同志和我联名给有关同志写信，对一些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现查找到1947年9月27日，陈云同志和我写给刘澜波并请他转告本溪县委书记汪之力同志的一封信，信中肯定了本溪县委在土改轰开局面的初期，鼓劲吹风，撑腰壮胆，先行动斗争坏蛋，树立起以贫雇农为骨干核心领导的做法。在团结中农的问题上，我们说，应当“先建立以贫雇农为骨干核心领导的农会后，再团结中农参加农会，因中农初期表现了很大的动摇妥协性，事实也已证明只有真正的贫雇农为骨干核心领导树立优势之后，中农才能转向贫雇农的。保护中农是我党在农村反封建斗争中的基本政策之一。团结中农，进行彻底消灭封建势力才会有力量，反封建势力的农村统一战线才会形成。”这种通信指导的方式，对于推动土改运动的健康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动，群众普遍行动起来了。不少地方的实践证明，贫雇农愈是发动得充分，力量愈是强大，中农就愈向贫雇农靠拢，团结中农的问题也解决得较好。贫雇农和中农团结一致，在党的领导下，以贫雇农团、农会等组织形式，向地主阶级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在国民党占领的半年中，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反攻倒算，在世世代代的旧恨上又加上新仇，广大农民新帐老帐一起算，出冤气，吐苦水，政治斗争和清算同时进行，地主昔日的威风一扫而尽，地主阶级剥削搜刮所得的浮财又回到农民手中。广大农民在斗争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尝到了甜头，锻炼了队伍，增强了在党的

领导下同封建势力斗争到底的信心和决心。在此基础上，各地都适时地将诉苦清算斗争转入解决土地、牲口、房屋等最根本、最迫切的问题上来。

平分土地的基础是划清阶级。我们仍然是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让群众自己动手动脑，不搞包办代替。在农民内部一般是采用“一户一议、自报公议、三榜定案”的方法。如本人不同意，还准许向上级报告。批复后再评。对于划分地主、富农，则是在贫雇农团或代表大会上讨论评定，经上级审查，再由村农民大会（包括中农）讨论通过后确定。在划分阶级的标准上，我们强调必须按照中央1947年10月10日公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的规定，即看生产资料占有与否、占有多少，而决不能搞第二个标准。对于干过坏事的和有过这样那样毛病的中农和贫雇农，在政治上可以批评教育，但在划分阶级和分配土地上不能另眼相待，不能提高阶级成分，绝对不能把他们推到敌人的阵营去。划分阶级后，开始平分土地，没收了地主的土地、牲口、农具、房屋及其他财产，并征收了富农土地和财产的多余部分，按人口分配给农民。在这个基础上也分配给地主与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给予生活出路，让其自食其力，在群众的监督下，通过劳动改造自己。

在划分阶级和平分土地的过程中，由于形势决定必须加快步伐，扩大开展运动的范围，而且干部在数量和质量上也不相适应，加之我们对若干问题在政策的指导上也不够及时，不够明确，因而在运动迅猛展开、群众情绪普遍高涨时，有些地方工作粗糙，侵犯了中农和城市工商业者的一些利益，甚至有些地方发生了乱打、乱杀的严重现象。这些偏差在东北局和辽东分局的正确领导下及时地得到了纠正。

1948年1月，辽东大部分地区已按人口平分了土地，土地改革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的伟大胜利，彻底摧毁了封建势力，改变了不合理的土地所有制关系，使受苦受难的农民第一次在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上站了起来，做了主人。

“耕者有其田”这个劳动人民世代梦寐以求的愿望，无数革命的志士仁人前仆后继终身为之奋斗的理想，终于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了。历史又展开了新的一页。

迎接全东北的解放

1948年5月，随着形势的发展，东北局撤销了辽东分局，我调任安东省委书记，并兼安东军区政治委员。安东省省长是刘澜波同志，军区司令员是程世才同志。原辽东分局的工作人员分为三部分，搞财经工作的一部分同志随陈云同志去东北局；搞后勤工作的一部分同志随我到安东；还有社会部的同志，准备以后参加接管沈阳工作的，也同我一起到了安东。

当时的形势是，国民党军队仍然占据着沈阳、长春、锦州等几个孤立的都市，我东北根据地已连成了一片，并空前地扩大了。为了彻底解放东北全境，解放全中国，我们必须尽快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生产建设工作上来，发展生产、支援前线。这既是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经过土地改革，获得了土地的农民的迫切要求。

土地改革这一生产关系的大变革，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打碎了封建枷锁，摆脱了剥削奴役的劳动者，焕发了极大的生产热情。他们响应党的号召，将土改中

发挥出来的积极性，转到生产上来。他们知道，现在的劳动，不再是为了土豪劣绅、恶霸地主的利益，而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政权，自己的天下。1948年的生产条件是相当困难的。由于前一年的天灾，特别是蒋军在占领安东期间的搜刮破坏，耽误了农时，影响了播种，使大片土地荒芜，造成了严重的粮荒；1948年，灾情又进一步发展。我到安东时，灾民达到近60万。7月19日我给东北局写了一封信，汇报了灾情，要求给予支持。面对这样严峻的局面，省委制定了依靠群众生产自救的方针，我们除了发放贷粮、贷款，帮助群众渡荒和播种外，还推广了孤山县和宽甸县的经验，组织群众，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副业生产。省委和省政府领导亦下到基层，帮助各地组织生产救灾，发动群众出主意，想办法，使生产渡荒成为群众性的自救运动。各级党组织和群众迅速动员起来，依靠自己的力量，创造出了各种办法，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全省大部分地区的灾荒渐趋缓和，并且掀起了生产高潮。这一年，在保证原有土地全部播种的基础上，还开垦荒地四五十万亩，粮食总产达到80万吨，比1947年增产8万吨，不仅胜利地渡过了灾荒，而且支援了前线。据当时统计，1948年安东全省交公粮131140吨，足够供应50万部队一年的军粮。

在生产救灾的同时，我们按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在已完成土改的地区进行复查纠偏，主要是纠正打击面过宽的偏差，调整土地、牲口，调整土改中偏差所导致的一部分贫雇农和中农的紧张关系。在纠偏中，我们仍然强调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向群众检查我们工作中的失误，交待政策，打通群众的思想，让群众有组织地、自觉地纠正偏差。贫雇农通过学习土地法大纲和中央的有关指示，提高了认识，自觉行

动起来，改正错划的成份，将赶出农会的中农请回来，多分的土地、牲口退给中农，或者抽肥补瘦，不叫中农吃亏。在农村纠偏的同时，城市也对打击工商业的错误进行了纠正，补偿了被错斗错分的工商业，鼓励他们发展经济，繁荣市场。我们还结合纠偏，普遍对党组织进行了一次整顿，批评了一部分党员身上暴露出来的无组织、无纪律、平均主义、个人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通过学习党的“七大”文件和毛泽东著作，提高了党员的思想水平、政策水平。由于形势好转，东北全境即将解放，我们公开了党组织，大量吸收工人、农民中的先进分子入党。据1949年1月统计，安东全省共有党员15240人，党支部1020个。

革命战争改变了农村，改变了农民，农民也以极大热情支持着革命战争。获得了土地的农民懂得，是共产党、解放军帮助他们翻身解放，只有壮大人民解放军，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东北、全中国，才能保住翻身的成果，受苦人才有好日子过。因此，在土改中和土改后，翻身农民参军参战的热潮一浪高一浪。许多老人送子参军，年轻媳妇送郎当兵，兄弟几个一起到部队，有的一次不合格就两次三次地报名。1947年，本溪土改后，计划1200名青年参军，但仅田师付一个区就动员了1300多人。赛马在土改中，5天内就有3600余人参军。新宾全县119000人，一个月中参军5525人，占总人口的4.6%强，个别乡村参军人数占总人口的10.3%。安东省1947—1948年两年扩兵109000人，连同1946年的32000余人，共达141700余人。整个辽东地区1945年10月—1948年12月，参军人数总计达到33万余人。此外，还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人组成的担架队、运输队直接支援前线。在后方，人们也是含辛茹苦，节衣缩食，发展生产，千方百计满足战争的需要。城市的工

厂，虽然遭到过蒋军的严重破坏，但工人们却在极短的时间内奇迹般地恢复了生产，为前线提供了大量的物资。在支援辽沈决战和第四野战军入关作战中，安东的工农业生产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安东人民为了解放战争的胜利竭尽全力，作出了贡献。

辽东根据地，经过短短的3年时间，就胜利地建成并且得到了巩固，这应该归功于毛泽东同志、党中央和东北局的正确领导，归功于辽东的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及广大干部、党员的团结奋斗，归功于辽东人民的艰苦奋斗，努力工作。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朝鲜人民所给予的大力支持。

在创建辽东根据地的斗争中，无数优秀干部、战士和革命群众流血牺牲，贡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烈士们的功绩在辽东大地上竖起了一座座永垂不朽的丰碑，人们将永远景仰和怀念他们，并踏着他们的足迹前进。

1949年5月，中央调我入关工作，我离开了战斗三年多的辽东大地。此时，经过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国民党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上被消灭，大半个中国获得了解放。4月，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并向长江以南推进。中国革命势如破竹，摧枯拉朽，迅猛发展，统治中国22年的蒋家王朝土崩瓦解，奄奄一息，行将灭亡。全中国的解放指日可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我离开东北，与三年前进东北时，心情大不一样。是啊！革命将要在全国完全胜利了，终于盼到了这一天。

沐浴着和煦的春风，迎着新中国灿烂的朝阳，我满怀喜悦，满怀希望，满怀信心，踏上了南下的征程，去迎接新的更加艰巨的战斗。

脚下的路还很长，我将一步一步地走下去。

封面
目录
正文